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

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张振亭

内容提要

1978 年以来的 30 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大的 30 年。对业已做过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得失，“以史为鉴”，有利于我们对其过去有个清晰的认识，有利于现在的研究者找到新的切入点，有利于新闻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壮大。

本书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既描述学术研究的构成及其发展历程，又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变化两个维度述说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历史。

本书在整体上采取“总—分—总”的体例，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探究新闻传播学术总体及各构成要素的变化，即首先概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轨迹，然后分述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面向的变化，最后总结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书把其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发展”。

研究主体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和主导性因素。笔者借用知识社会的有关理论，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变化背后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

为了精细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动态变化，笔者对三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进行了抽样内容分析，以寻找各个分支研究领域（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其他）中比较集中的话题、问题，然后结合有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评述。

在“研究方法论”一章，笔者梳理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代表性论述，并以部分新闻传播博士论文为例，管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把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考察，揭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具体应用。

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效果的主要体现。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基础，学科理论体系越完善，越能发挥出学科能量。研究者的论述、新方法的引进、新理论的提出，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阐释，又促进了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

从纵向看，新闻传播研究进展迅速、成绩巨大。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摘掉了“无学”的帽子，建起了学术研究梯队，初步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跻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拥有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效力得以初步彰显。同时，新闻传播研究不够深入，知识、理论和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提倡应向学术自身回归，尊重其自身逻辑，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注重积累；要遵守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摒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的、直接的、操作性的实用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是具有客观真理性内容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客观真理的属性。...为了获得这种产品蕴含的最大限度和最高水平的客观真理性内容，我们就要高度重视探索这种真理的实践意义，讲学术创新和学术积累，讲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学术规范，讲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等等。因为这些学术行为是发现真理的基本途径，也是开展学术工作的起码的制度要求，否则，我们只能远离真理。

——《学术界》总编 袁玉立

目 录

内容提要	I
------------	---

1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2)
1.2 关键概念界定	(5)
1.3 研究现状	(8)
1.3.1 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	(8)
1.3.2 阶段划分方法	(12)
1.3.3 研究途径	(13)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
1.4.1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14)
1.4.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6)
1.5 选题的意义与主要限制	(18)

2 发展阶段论

2.1 1978-1982: 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21)
2.2 1983-1988: 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27)
2.3 1989-1991: 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33)
2.4 1992-1996: “为学术而学术”	(35)
2.5 1997-至今: 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	(39)

3 研究主体论

3.1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及变化	(50)
3.1.1 考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构成及变化的一种新思路	(50)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1.2 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	(52)
3.1.3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	(53)
3.2 研究主体的互动	(57)
3.2.1 学术论争.....	(57)
3.2.2 学术期刊.....	(59)
3.2.3 学会、团体及学术会议.....	(62)

4 研究内容论

4.1 对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	(65)
4.1.1 类目的建构	(65)
4.1.2 研究资料的获取与研究程序	(68)
4.2 几大分支研究领域分析.....	(70)
4.2.1 新闻理论研究：超越狭隘的事业性论述	(70)
4.2.2 新闻史研究：反思与创新	(73)
4.2.3 新闻业务研究：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	(77)
4.2.4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突破对策性研究	(80)
4.2.5 广播与电视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的切入点	(81)
4.2.6 传播学研究：关注本土情境	(84)
4.2.7 其他研究.....	(87)

5 研究方法论

5.1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含义亟待澄清.....	(89)
5.2 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94)
5.3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	(96)
5.3.1 1978-1982：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96)
5.3.2 1983-1995：新闻调查风起云涌，系统科学全面渗透，传播学作为方法论导入	(98)
5.3.3 1996 年至今：重视并讨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	(104)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 研究效果论

6.1 建构学科体系.....	(120)
6.1.1 从内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21)
6.1.2 从外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29)
6.2 推进新闻改革.....	(133)
6.2.1 1942 和 1956 年两次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	(133)
6.2.2 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三次跨越与新闻传播研究的互动.....	(135)

7 结 语

7.1 主要成就.....	(143)
7.2 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变化的特征.....	(144)
7.3 亟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新闻传播研究如何深入？.....	(145)
主要参考文献	(147)
附录 1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大事记(1978-2007)	(167)
附录 2 历届吴玉章奖获奖成果（新闻传播学）	(186)
附录 3 历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新闻传播学） ..	(187)
附录 4 近 10 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类著作、教材（1997-2006） ..	(188)

1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978 年以来的 30 年是我国社会发展最快的 30 年，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新闻传播事业也不例外：数量、规模、结构、功能、效益上都有了较大改观。事业的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教育和研究的繁荣。对我们业已做过的研究有一个全面、清晰、客观的把握，不仅可以“以史为鉴”，还可以发现存在哪些不足，找到新的研究的切入点，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更可以使知识系统化、方法科学化，为建构一个成熟的学科打下厚实的基础。

正如一篇论文的文献综述是该文研究问题的历史一样，学术史是某门系统知识和方法的历史。因此，学术史是一个领域、一门学科中的基础研究、必备研究。没有学术史作基础，就无法把握现状，也无法面向未来，学科建设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作为一门科学，新闻学起源于 17 世纪末德国的一些大学——一些大学生以报纸为对象写作学位论文。但直到 1845 年，才有了一部新闻学著作——普尔兹著《德国新闻事业史》。^①此时的中国刚好被迫开启尘封已久的大门，外来的思想和学术随之断断续续地引入进来。

1903 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松本君平著《新闻学》一书，新闻学正式传至中国。因此，从源头上来看，中国的新闻学是个舶来品，起步较晚，且屡受政治等外围因素干扰，一直发展缓慢。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学术研究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新闻学研究也开始步入正常化、系统化、学术化和多样化的道路。尽管有曲折，有迂回，但总的目标是朝着增加知识，建构独立学科体系的方向发展的。经过 30 年的积累，我们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不管是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港台地区同一学科（学门）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新闻

^①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5 页。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传播学仍显得非常年轻、稚嫩，仍处于学科建设的“路上”，这一点想必各位同仁也是心知肚明的。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新闻传播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新闻传播学术生产空前繁荣：一般学术论文、硕博论文、专著、教材、集刊、课题、报告纷纷面世；各种学术团体、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各类研讨会、交流会此起彼伏。新闻传播俨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科也仿佛一夜之间从“潜学”成了“显学”。但要站在学术的角度，拷问一下我们到底研究了些什么，这些貌似“研究”的诸多成果究竟使该领域的知识增加了多少，可能一时还无从回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似乎非常热衷于新名词的创造、新概念的引进、新理论的介绍、新“学”的创设，以及论文的发表、课题的申请、专著的出版、教材的编写，却把已往的研究置之脑后，想当然地“创新”、“填补空白”，甚至“出奇制胜”。这不仅对知识的增加无任何助益，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了一种浮华不实的学风，贻害无穷。

社会需求的增加给新闻传播学术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任何盲进除了制造学术泡沫外，对知识的增加无任何益处，甚至相反。针对这一状况，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并进行了一些总结和反思，并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如陈力丹归纳了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五大问题：“浮躁心态影响研究质量”、“边缘研究面铺得过广，学科的本体研究缺乏”、“运用现成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对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共同语言的研究项目开发不够”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论文占据学术期刊较大篇幅带来的新问题”。^①王春泉认为“时髦化与跟风”、“重复讨论浪费资源”、“简单化的非科学实践”是新闻学术研究中的迷思，并认为历史意识的缺乏是导致其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②类似这种“问题与对策”的讨论不少，但大多不够系统、全面；方法上也不够规范，凭直觉和简单观察做出判断的多，基于对学术研究系统分析再下结论的少。这正凸显了当下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

^①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②王春泉：《历史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意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3-68

1.1.2 研究目的

本书旨在系统、全面、客观地梳理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描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及现状，揭示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对其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

“新时期”，首先是一个反映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概念，特指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在文学史等学术史研究中，成为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分期概念。关于其时间上的起点有两种说法，一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即 1976 年；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即 1978 年，从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间，是拨乱反正期。有学术史研究者认为，“新时期学术发展的真正起点是 1978 年”。原因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提倡，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政治基础，学术研究开始从“跟风套话”向实事求是的理论追求转变。学术界开始反对被动跟从政治的“注经”式研究，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的角度、立场，科学的态度、精神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①笔者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学者独立、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内在、根本保证，舍此，只能成为附庸，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学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字面意义而言，所谓“新时期”的“新”，实际上是指中国开始逐步放弃“斗争”这种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的“主旋律”和思维方式，慢慢转向以建设、发展为主题的阶段。这为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在的保障。

本书以 1978 年作为“新时期”的起始点，下限为 2008 年，刚好三十年。文革结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属于拨乱反正期，正规的新闻教育和研究尚未正式启动。新闻传播事业由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开始，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事业得以重新启动。30 年来，新闻传播研究取得的发展是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新时期”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说明，1978 年以来的新闻传播学术可以从“史”的角度来研究。描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揭示其背后的原因，总结取得的成就，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应是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的基本研究内容。

^①余三定：《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26-130

“系统”、“全面”地研究是指不仅研究由学术成果所展现的学术图景（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而且研究处于特定背景和机制下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效果（自身的体系建构以及与外界的互动），即回答“谁，用什么方法，研究什么，有什么效果”等相关联性的问题群。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1）人是学术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研究者是学术研究的直接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位于真空之中，而是处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机制下，而背景、机制恰恰影响、规约着他们的学术视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一句话，研究主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影响着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生产。（2）虽然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以个体为单位开展的，但学术水平的提高却主要取决于学术共同体^①的共同努力。因此，研究主体的构成和变化是影响学术研究的关键因素。从构成上看，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者来自不同机构，如高校（教学兼科研机构）、纯科研机构、新闻传播实务机构、主管宣传的党政机关等。服务的机构不同，会使他们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野，对他们的学术产出有一定影响。从变化上看，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成长与独立，也使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3）学术成员的互动是学术共同体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学术争鸣是学术生产、创新的重要对话机制，而专业学术期刊、学会（或研究会）、学术会议正是他们互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及其运行机制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如学术期刊既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又兼具学术评价功能，对学术发展有导向作用；学术团体、学术活动通过组织化将分散的学人集中起来，是学术建制化的一种机制；政府设立研究课题，通过经费资助同样对学术研究起一种导向、规约作用。（4）研究成果以与社会其他系统互动的方式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这既是研究者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又是研究效果的外在表现。就目前的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往往只关注学术成果，而忽视了这些成果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以至于无法深入学术生产的机制内部探寻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本书有上述设计，既是要与现有研究相区隔，又是探究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机制的一次尝试。

“客观地”研究是指注重援引学术评价标准，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新闻传播学术现状，尤其是那些被表面的喧嚣所遮蔽的问题。学术评价涉及多种因素，要客观地

^① 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也翻译为学术社群）源自“科学共同体”。著名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业务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歧。”科学共同体不但与研究范式相关，还与学术评价密切相关。本书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学术评价机制和主导的研究范式。参见[美]T. S. 库恩著，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做出评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产生不久的研究成果来说更是如此。但没有评价，我们对学科、学术的过去、现在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体认，就无法促使我们不断反思、进步。因此，本书在涉及学术评价部分，尽量避免个人的直观感受，而是把目前学术评价的一些做法引进来，做到让事实说话。其中，在梳理、呈现学术成果时，引入和运用了定量方法，通过对其数量特征的分析，揭示其整体面貌和自身特质、问题。我们往往强调对对象“本质”的分析，但看似非常本质的分析实为基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和评价而已。数量也是事物本质的一种表现，通过对数量的科学处理，一样能反映出其本质。

1.2 关键概念界定

1) 新闻学、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引入之前，我国学界一直使用“新闻学”这一名称，它指向一个学科，又是高等学校的一个专业。1978 年之后，“传播学”被新闻学界系统引入，其概念、理论和方法都令新闻学界有耳目一新之感，并作为一门课程在新闻系开设。1983 年厦门大学广告专业改为传播系，“传播”开始在名义上与高等学校专业教育勾连在一起。

1986 年 8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确定“新闻传播学”应作为此后主攻的方向。此时的“新闻传播学”这个词汇在结构上属于“正偏结构”，含义大概是“研究新闻如何传播的学问”。1995 年，邵培仁著《新闻传播学》出版，一个新概念——“新闻传播学”正式登台，并随着大量同名著作的出版而迅速演化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97 年，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下属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至此，传播学正式取得了与新闻学同等的学科地位。此时的“新闻传播学”，可以理解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官方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1992 年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等）上也用这个称呼。按照这种理解，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不管如何理解，官方正式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传播学在学科建制上已经与新闻学取得了同等地位。

2001 年，教育部批准试办传播学本科专业^①，传播学也像新闻学一样开始对应

^① 属于《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9 年颁布）》中的“目录外专业”，见《2001 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

于高等学校的一个专业，虽然其具体办学方向尚不稳定，多为网络传播方向，也有新闻事业经营管理，但其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专业。

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1978 年以来，我们所谓的新闻学实际上是与传播学形影相随的。对此，似乎没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二者的关系。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曾对此做过阐述^①，内容却都大同小异。首先，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次，新闻学偏向应用研究，传播学偏向理论研究；再次，新闻学以定性、思辨研究为主，传播学以定量、实证研究为主；最后，新闻学的范畴较小，传播学的范畴较大。当然，1990 年代中期曾出现“大众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想法，但时至今日，“取代论”，包括事实上的“取代论”并没有实现，倒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成了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学术界“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这说明大家虽然都在尽力想把它们区分开来，但确非易事；同时，不进行区分也并不影响其“所指”。

笔者认为，除非专门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否则争论是不必要的。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会在研究之前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可越一步的“雷池”，说这是新闻学研究，所有传播学的东西一概视为高压线，不能碰。据笔者观察，争论的背后是学术评价的问题。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往往认为传播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并以此拒绝承认或贬低新闻学研究。这种戴着有色眼镜进行学术评价的方式引起了新闻学者的反批评和极力辩护，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于是此起彼伏，充斥坊间。实际上，它涉及的深层次的问题是科学与人文之争这个古老的问题，“融合”而不是“取代”是其发展趋势。另外，沉下心去开展实实在在的研究比浮在问题的表面空谈、宏论更有意义。

针对上述状况，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作如下限定和说明：

(1) 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或称为“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我国新闻学确立的时间起点为 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构成上则包括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传播学是 1978 年以后从国外引入的一个学科，构成上则主要是传播理论和方法。

(2) 本书所述的新闻传播这个研究领域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学科，只讨论一般层面上 (in general) 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恰如心理学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但普通心理学 (general psychology) 所涉及的是最基本的

^① 详情请参阅董天策：《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历史回顾》，《当代传播》，2008 (1)：43-45。

概念和心理活动最基本的规律一样。

(3) 在具体名称上,除了特指 1994 年以后出现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学”外,本书凡称之为“新闻传播学”或“新闻传播研究”、“新闻传播学术”的,均指向上述特定研究领域。1978 年之前均称之为“新闻学”。对所引用文献、资料中的名称,本书不作改动。

(4) 本书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 研究、学术、学术史

在传统意义上,“学”与“术”各有其意,是并列关系。“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①“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②尽管今天我们仍习惯于把知识分成理论(学)和应用(术)两大部分,但“学术”却多被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来使用。

根据《辞海》的解释,“研究”是“用科学方法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③;学说是“在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学术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问是各种知识的通称;“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④。

11 卷本《中国学术史》主编李学勤在“总序”中写道:“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⑤。“从历史的角度看学术”指明了学术是其所处历史的一部分,要研究学术史必须将之置于丰富的历史中。

《中国学术通史》主编张立文认为,“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⑥。这说明,自从有了“分科之学”,学术便指向某一领域内系统化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学术史》著者之一张国刚认为,“学术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问题、以追

^①梁启超:《学与术》,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3-725 页。

^②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1918 年 10 月 14 日),载于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6-1057 页。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57 页。

^④《辞海》,第 3193-3194 页。

^⑤《总序》,第 1 页,载朱汉民:《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⑥《总序》,第 5-6 页,载《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求认识的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对事物的形式、内容、性质、意义、发展趋向以及事物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思辨并作出解答，有着摆脱利益制约的趋势和不苟同于众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而逐步扩大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学术的应用已不在学术的范围之内”^①。也就是说，虽然谓之“学术”，但学术史考察的重点却是“学”，而不是“术”。

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余三定把它总结为三大类：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二是学科史研究；三是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②笔者以为，积极构建学科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动机，也是最大的成就，因此，本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属于第二类，即学科史研究。

关于学科史研究，刘曙光认为，“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目的是说明某一学科的传承和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③陈平原认为：“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④

由以上解释或论述可见，学术是研究的系统化，学术史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学术。就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看，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它显然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该门类下面又包括各分支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采访学等，各分支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采取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是可行的：它既包括具体知识、问题的研究，又包括“自成系统”的学说和主张，还包括这些知识、问题、学说、主张的系统、体系化。本书侧重于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论述。总之，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就是从新时期这个历史角度研究新闻传播领域里系统化的知识和方法，目的是说明其传承和发展以及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即研究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

^①《导论》，第5、4页，载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

^②余三定：《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26-130。

^③刘曙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云梦学刊》，2005（4）：9-11。

^④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云梦学刊》，2005（4）：8-9。

1.3 研究现状

1.3.1 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

虽然我国关于新闻的专门研究可以追溯至 1834 年《新闻纸略论》一文的发表,但直到 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没有一部系统的新闻学理论著作,没有明确提出新闻学的概念,没有一个新闻教育机构,没有一份专业新闻学术刊物,处于“前新闻学”^①阶段。研究、积累有限,也就谈不上“研究之研究”。

最早进行“研究之研究”的是黄天鹏。他于 1929 年和 1942 年发表了《新闻运动之回顾(代序)》和《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两文,概括了我国早期新闻学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开辟了新闻学术史这一研究领域。^②随着新闻学术的不断积累,此类研究不断增多。涉及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新闻传播通史、当代史著作中对新闻传播研究情况的论述,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3 卷》(1999)、《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等;二是专门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尤其是上世纪发展状况的著述,如戴元光等主编《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001)丛书、赵凯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1949-2005》(2006)、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等;三是回顾新闻传播研究状况的专文,如《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孙旭培,2005)以及近几年颇流行的“年度学术总结”^③等。

第一类研究把学术作为该时期内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来讨论。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按照政治运动分期,分段论述的方法。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3 卷》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闻研究事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获得了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二是研究活动广泛开展,学术讨论空前活跃;三是新闻学著作和专业刊物大幅增长;四是中外新闻学术交流趋于活跃。^④其中尤其强调“方针”和“学

^①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②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2-386 页。

^③2001-2006 年均有“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回顾”。《中国新闻年鉴》几乎每年也载有上年“新闻学研究概况”。2007 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则标志着年度学术报告开始专业化、经常化。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3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2-418 页。

风”，把它作为一个基本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展开论述，而不是注重或突出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本身的逻辑。

第二类中有一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界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对各学科、领域系统回顾、反思的一部分。它研究的跨度为整个 20 世纪，突出纵向的发展变化。最典型是《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丛书。它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七卷，“展示了 100 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发展的基本轮廓”^①，是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各分支学科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在研究方法和体例上，《新闻史学史》采用类似“大师巨擘”（下文将对此解释）的途径；《应用新闻学》采用的是“本体范式”^②，其他均采用分阶段论述的方法。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聚集上海专家学者力量，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爬梳各主要学科的形成及其演进轨迹，旨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这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而编撰的丛书。该丛书编写的框架是：

第一部分系总论，综述各学科一百年间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二部分以二级学科为单位，论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以专题形式，介绍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情况，评述它们的学术意义；第四部分综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建立的主要学术机构、重要学术社团、重要学术刊物及进行的中外学术交流，说明它们对本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五部分为附录，内容是各学科的百年大事记。^③

其中，《新闻学》卷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渐次描述不同阶段的内容和特点。在二级学科划分上，该书把新闻学分为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电子媒介新闻学与媒介技术科学、新闻学边缘学科（媒介经济管理学、新闻教育学、新闻法学与新闻伦理学、出版学与编辑学、广告学、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学（传播学原理、宣传学和舆论学、应用传播学）。在新闻学重大论争部分，概述了围绕“新闻定义”、“新闻商品性”、“新闻与宣传”、“本质真实”、“新闻价

^①《总序》，第 4 页，载于戴元光：《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版。

^②范式（Paradigm），也译为典范，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用于考察科学史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库恩认为，范式一方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一方面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公认的模式或范例，既吸引着一大批研究人员按照该模式从事科学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模式的采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就存在着一些“范式”，如中国新闻史研究长期采用的革命史写作体例等。参见[美]T.S.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7 页。

^③《总序》，第 5 页，载于戴元光：《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版。

2005 年 9 月版。

值”等六次重大论争。

笔者认为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比较新颖。在体例上，采取“总—分”的体例，即：首先在总体上描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的发展，然后分述各分支学科取得的重要成就。总论部分以论为主，分论以呈现史料为主。该书虽然名之曰“新闻学”，实际与本书所界定的“新闻传播”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传播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已。该书对新闻学各学科的界定清晰且几乎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的所有分支。在内容上，除系统梳理新闻学及各学科的发展外，还把重大论争、研究机构、学术社团、著述出版、中外交流包括在内，比较全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惯用的革命范式，史多于论；二是对传播学的发展史研究不够，基本上以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为主；三是虽然涉及了学术论争、学术机构团体、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把它们与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演进有机结合起来，且部分内容有遗漏，如学术论争中漏掉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新闻传播学术规范”等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我国新闻史学界，徐培汀教授在“学说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继《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与裘正义合著，1994）之后，他又于2006年出版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一书，从而把学说史研究推进到2005年。这是迄今为止历史跨度最大的新闻学说史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在体例上也采用“总—分”结构。一至四章分期概述1949-2005年新闻传播研究的脉络；五至十二章以各时期重要的“学说”（著作）为经，以各学科（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边缘新闻学、新闻教育学、传播学）为纬，呈现我国新闻传播学说演进的轨迹。学说史作为学术史的一种形式，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一是代表性问题，即只选择著作能否代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①以及个人的选择和评价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学界同行的意见？二是客观性问题，不管是“学说”的选择还是诠释、评价都完全取决于该书作者的个人主观判断是否有失客观？三是问题意识。作为学术史研究，通过对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梳理，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无疑更利于学界的反省。但通观该书对学说的介绍、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积极的评价，其中不乏“誉美之词”。肯定成绩是必要的，但从这些评价中很难发现被遮蔽的问题，而发现问题似乎更具学术意义。

^①诚然，就目前学术界的现状来看，著作、书、甚至教材的出版都较论文更受重视，因此选择著作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按照国际学术规则，学术论文是同行评价，因为只有同行才能衡量一篇论文或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而出书只是作者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因此，论文比书更受重视。正是基于这一规则，国际上一般通过分析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来反映学术研究状况。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对当代新闻传播学术最系统、也是与本书最为接近的研究是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一书。它通过对“学术环境”和“思路”的考察,揭示我国当代(从1949年至今)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作者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学术环境”和“思路”,但有关于“社会环境变化所构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语境”、“研究活动中思路的演进所涉及的理念、方法、知识等”^①的表述,可以看成是二者的具体所指。从其具体论述来看,影响学术环境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社会、新闻传播实践(包括教育)等;“思路”则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我认为,该研究除了填补学术史研究中当代部分的空缺外,比较有新意的地方是把“思路”作为学术的必要构成来论述,这在以前的研究中几乎都是被一笔带过的。另外,其对三种“学术资源”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文化、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侧重于“学术环境”和“思路”决定了该书在视野上必定是宏观的。但从宏观来看,新闻传播学术似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环境”和“思路”上并无太大差别。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传播学术自身的特质。

第三类是新闻传播研究之研究的专文。它们侧重对概况的描述,时间跨度大小不一,一般也划分时期,但不具体展开。这类文章较多,代表性的有两类:一是一般学术文章,往往年度跨度较大,分期综述各个阶段的特点,如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2005),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上)、(下)》(1999),童兵、林涵《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2001)等。二是对前一年研究情况的总结报告,一般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分而述之,资料丰富,颇具史料价值,如《200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李良荣、张健执笔,2003)。《中国新闻年鉴》从1983年开始就有了这类报告,如戴邦《1983年我国新闻工作研究发展概况》(1984)等,它们累积起来就是相当可观的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料。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述评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主要目的是为本书寻求研究的切入点以及获得研究资料、方法、思路等方面的启发。对于所指出的“问题”,虽然本书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解决之,但确是笔者所竭力避免的。至于结果如何,只能交有旁人评说。

^①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3.2 阶段划分方法

代表性的阶段划分方法有：

《中国新闻传播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1979-1982）主要是清理文革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第二阶段（1983-1989）是研究的繁荣季节；第三阶段（1989-1992）是研究的低谷与反思期；第四阶段（1992 至今）新闻学研究重焕生机。^①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约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前后），“结合新闻业务改革提出新的理论”；第二阶段（约从 1984 年前后到 1992 年前后），新闻理论研究虽然出现过反复，但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为从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学理与学术的高度，研究的课题不但深刻地接触实际，而且开始显现出系统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初步框架”；第三阶段（约从 1992 年到二十世纪末），“大胆而科学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进一步探索”。^②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一文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拨乱反正；1985-1989：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1992 年至今：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③

《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一文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清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第二阶段（1983-1986），引进的传播学开始释放能量；第三阶段（1987-1988），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丰收季节；第四阶段（1989-1991），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低谷期和反思期；第五阶段（1992-1996），新闻与传播研究本土化建设时期。^④

《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期”（1977-1991）和“新闻学研究的多元与繁荣期”（1992 年至今）。

从划分标准上看，政治和社会变革都是主要依据，并兼顾了新闻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综合来看，上述阶段划分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1）虽然新时期时间上的起点是 1978 年底，但新闻传播研究真正开始的时间要推迟到 1983 年。因为直到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才基本结束，很多知识分子才得以重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0 页。

^②赵树国学卷、黄少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版，第 62-68 页。

^③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④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026

返教学和科研岗位；(2) 198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3)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新闻传播研究影响至深；(4) 1992 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迈入第二个繁荣期；(5) 1997 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研究进入第三个大发展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每个作者划分的标准不一致，有时以国家发展为依据，有时以新闻传播研究特征为依据，随意性较大，致使研究结果不甚严谨。本书以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为分期依据，主要表现为其理论体系与方法的更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与新闻传播实践密不可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因此，考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除了分析其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外，还必须分析与之相关的政治、教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者、学术组织等因素的变化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

1.3.3 研究途径

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所采取的途径^①主要有：(1) 分阶段描述。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史常用的研究途径；(2) 内容分析。通过对文献的量化统计分析，以发现学术发展、演进的规律，如《一九九 0 至一九九七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分析》(韩纲，1998)一文等；(3) “大师巨擘”途径。这种研究途径假设新闻传播学术史上存在巨擘级的大师，他们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研究者要分析大师的背景、思想、著述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②当然，由于 30 年的历史跨度较小，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的大师巨擘尚有待时间来检验，但作为一种研究途径仍有可供借用之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即是“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术为根本，重点阐述新闻传播学术思想的演变、学术研究的成就”，^③有点类似大师巨擘的途径。(4) 其他。如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2001)一文是透过“关键词”看新闻理论的变迁。

由此可见，以往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以历史研究和传统思辨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较少，但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上都做了可贵的尝试，这些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① 研究途径 (research approach, 也翻译为“研究进路”, 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研究路线, 是比研究方法更广的一个范畴。郭炜华 (2005) 认为“进路, 既有方法、步骤的意思, 也有从何进入, 如何入手的意思”。我国台湾学者林丽云认为路径犹如登山的路线图, 登山者采取的路线不同, 观山的视野就不同, 看到的景致也不同。参见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 巨流图书公司 2004 年版, 第 21 页。

^② 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 巨流图书公司 2004 年版, 第 23 页。

^③ 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 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3 页。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1)涉及它的相关研究不少,但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缺乏;(2)研究对象集中在研究内容上,对研究方法、研究者、研究机制、研究效果的关注不够;(3)阶段划分的依据不一致,随意性大;(4)在研究途径上,以分阶段描述为主,其他方法也有尝试。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特点和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回答“谁,用什么方法,研究了什么,效果如何”这四个有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的问题,它们分别对应着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效果。

论文分为七章,第二章注重宏观描述,第三~六章侧重微观分析。各章的内容分布如下:

(1) 绪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动机、背景、关键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难点、创新之处。作为重点,本章详细分析了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之研究的现状,包括类型、阶段划分、研究途径等。

(2) 对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的描述。根据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书把其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第二阶段(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第三阶段(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第四阶段(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第五阶段(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

(3) 研究主体论。研究者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的第一环节和主导性因素。本章借用知识社会学的有关概念和理论,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导致变化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

(4) 研究内容论。在第四章,本书首先用内容分析法,抽样分析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动态变化,并找出各个分支领域内比较集中的话题、问题,然后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结合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比较客观、全面、精确地呈现近 30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及发展变化。

(5) 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是学术的内在构成之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是一个整体。方法论是研究者价值观、认识论的外在表现;具体方法是研究者收集和呈现资料的工具,都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为了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有个清晰的认识,本章首先对尚存在不少误解、不解的方法论、研究方法、定量、定性等基本概念作个简要介绍,接着梳理新闻传播学者关于领域内研究方法的论述,然后以部分新闻传播博士论文为例管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对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呈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6) 研究效果论。所谓研究效果,是笔者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总体、主流的一种宏观评判,而不是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综合得到的。它表现为自身的学科理论构建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上,衡量的是研究者研究动机的实现程度。本书认为,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线。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基础,学科理论体系越完善,越能发挥出学科能量。研究者的创造性论述、新方法的引进、新理论的提出,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阐释,又在实践中检验并推动了理论研究。

(7) 结语。首先指出,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初步完成了学科建制;然后分述了总体上的阶段发展特征以及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变化特点,发现向学术本身回归是其总的变化特点;最后总结了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方面所曝露出来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不急躁、不冒进,遵循学术自身规律,回归学术自身,多做扎实的研究是应该提倡的。

另外,本书收集、整理了1978-2007年30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作为大事记,包括重大学术会议、重大人物的活动、重大文件的出台、重要文献的出版发表等。尽管都是资料性材料,但它仍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大事记在内的一些资料放置在本书的附录中。

1.4.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概括为:

(1) 在整体上采取“总—分—总”的架构,以探究新闻传播学术总体及各构成要素的变化为主线,即首先概述近3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然后分别分析研

究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面向的变化,最后总结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 主要的研究方法为历史文献法,即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及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的特征和变化,进而对其现况作出评价。本书所分析的资料主要是各种类型的文献:一是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论文往往是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微观而深刻;动态性强,在某一阶段往往会形成一些研究热点,这些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连贯起来可以反映新闻传播研究 30 年来的变化历程。本书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论文,有效保证了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二是 1978 年以来出版的著述、教材等。这种类型的文献往往追求理论体系,系统性强,^①侧重宏观,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本书利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中国新闻年鉴》(1982-2007)提供的书目为查找来源;三是会议论文集、访谈录、硕博士论文等。

(3) 本书还运用了比较研究、个案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片段,只有把它放到整个历史时空中去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递进的过程。只有在纵向的比较中才能发现其不断推进的过程及特性。因此,本书是把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置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历史脉络中来审视的。本书侧重于从学科的角度审视学术发展史,但学术大厦是一个个具体研究支撑起来的,离开具体个案的分析,往往流于空疏。因此,深入分析一些代表性的个案才能反映其整体的面貌。但本书的着力点并不在一个个案上,那样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研究的层次上,本书更多地属于中观研究,既竭力避免因宏大叙述而带来的个性尽失,又试图规避因囿于一隅而造成的全貌模糊。另外,为了能系统化地呈现研究内容,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代表性期刊上的论文。

(4) 根据以上论述,本书在体例上以 1978 年以来 30 年的历史进程为经(时间轴),以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互相关联的专题为纬(内容轴),在此坐标系中透视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历程。

在纵向上,以新时期为主,但每部分都有与新时期之前相比较。在横向上,分成上述四个部分,主要是受拉斯韦尔(Lasswell,H.D)提出的“5W”传播模式的启发。1948 年,他发表了“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社会传

^①郭星寿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本,第 55 页。

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认为要“说明传播行为有一个简便方法”,那就是回答: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向谁(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传播模式——5个有次序的要素既构成了传播的一种模式,又指明了传播研究的5个领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①作为一种传播模式,它虽然受到各种批评,并不断被补充、修改,但仍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方便的综合性方法。^②不仅如此,它还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不仅在传播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只要翻一翻我国出版的传播学教材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还被用来分析任何传播内容,包括研究论文、著述在内。

学术研究也可以看作一项传播活动:研究者通过一定的载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为学术社群的成员接受,后者通过书评等方式表达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意见。学术研究是一种小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某一研究领域,即特定的“学术圈”,“学术共同体”。而且,学术分化越精细,传播范围往往越小。如新闻传播学术界一般又分为新闻理论界、新闻史学界、新闻应用学界等;新闻史学界又分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等更小的学术圈。在一个学术圈内,各成员之间交流比较充分,共识度高,意义交集较大,信息传播比较顺畅。学术期刊是最常用的学术传播媒介,它们发行量一般较小,虽然是杂志,但算不上大众媒介。在一个学术圈内,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大家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往往是学术期刊的评委,起着“把关人”的作用。他们的学术产品也比较多,其他成员既可以是受众(大多数情况如此),也可以是传播者(偶尔有学术作品发表)。研究者、研究成果、学术刊物和书籍等、学术社群成员、带来的影响分别对应着前述5个“W”,相应的分析则是研究主体论、研究内容论、学术载体论、学术受众论和研究效果论。专门研究学术载体,如学术期刊、书籍、学会会议等,不是本书的重点,而是侧重分析学术期刊作为交流平台所具有的评价、引导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实现状况。学术成果的主要接受者是学术社群,他们对成果的评价是某项成果效果的一种体现。但本书更关注的是学术共同体(如学会、研究会)的联结机制和功能。另外,学术共同体对经典著作、代表性人物的认同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可以纳入到研究效果范围内。因此,本书把学术载体、学术社群融合到研究主体和研究效果中来论述。

将学术活动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和现象进行分析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再将学

^①[美]哈罗德 D·拉斯韦尔著,谢金文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载张国良主编:《20 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9-210 页。

^②[英]拉斯韦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 页。

术作为一个整体来泛泛地论述，或者仅仅论述研究内容这一部分，而是深入学术研究的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上，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

要清晰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概况，必须从纵、横两个维度去开拓。纵向上要把新闻传播研究放在新时期的历史数轴上，考察对其有影响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进而分析研究主体、内容、方法和效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演进规律。横向上要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呈现出整个领域的面貌。因此，为了比较精细地勾画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概况，本书引入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不同领域内研究焦点在横向（构成）与纵向（变化）上的特征。

1.5 选题的意义与主要限制

1) 选题的意义

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来说，学术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者的不断创造、积累，也有赖于他们对过去研究不断地批评和检讨，以为学术社群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重思（rethinking）、反思（reflection），甚至否思（unthinking）是达致学科成熟完善的必经之路，也是学术共同体成熟的标志之一。学术史研究的根本意义似乎无需过多阐述。

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当下语境来说，我们必须对目前新闻传播研究异常喧嚣的景象进行学术上的考量，以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能为表象所遮蔽。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才能真正推进新闻传播研究。尤其是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大量新研究者的进入，急需知道我们到底研究了什么，怎么研究的等“入门常识”。不知道学界研究了什么，怎么研究的，也就无法知道应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正如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所言，“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①

2) 创新之处

关于过去 30 年来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有不少总结、概括，但不够系统、完整和科学。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呈现、梳理和反思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概况，这尚属首次。

^①殷晓蓉：《译者的话》，载于 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在研究框架上，本书把学术研究也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既描述学术研究的构成及发展历程，又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变化两个方面透视新闻传播研究发展状况。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除了研究研究内容、主体和效果外，还用相当的篇幅细致梳理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论述，这是以往其他类似研究所没有的。

3) 研究难点

难点之一是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些研究成果。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因为作者自身是自己研究的对象，再加上很多现实社会中难以避免的“面子”问题，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不过，随着观念的变化，当代人治当代史被认为“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作者就在“现场”，一些史实记忆和对历史场景、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人很难“研究”出来的。^①尽管如此，当代新闻传播史的欠缺及不如人意，恐怕还是因为“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这一传统规则 and 习惯使然，另外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困难。^②

难点之二是资料获取的有限性，如课题和项目的研究报告、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等，搜集起来有一定难度，但主要的、代表性的资料已经具备。

^①韩钢：《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吗？》，北京日报，2006-10-30

^②孙旭培：《序》，载宋守山：《传媒三十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2 发展阶段论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新闻传播学术发展是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要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轨迹,就是要揭示相关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下的新闻传播学术。当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想找出因素之间“因果决定论”式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它们在某一个阶段内是相互联系的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学术研究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自然受国家政治气候,尤其是宣传导向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影响。新闻学尤其如此,“一条明显的线索贯穿在整个新闻学中:新闻学与政治合二为一。”^①另外,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甚至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不同,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密切相关(即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而新闻传播事业又与我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关系密切。因此,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发展是探讨新闻传播学术必须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当今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战场”,新闻教育是新闻传播学术队伍生成和学术传承的基本途径,因此,新闻教育是影响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直接因素之一。

作为整体的研究队伍以及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是学术生产的主体,学术组织、学术刊物是其基本组织和互动方式、机制,因此,研究队伍、学术组织、学术刊物也是揭示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必须要考察的因素。

当然,揭示上述因素变化的目的在于考察新闻传播学术本身的发展,后者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书把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并为以后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队伍、机构、交流平台以及方法论上的准备;第二阶段(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取得初步共识;第三阶段(1989-1991),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新闻传播研究陷入低谷与反思期,学术研究曲折前行;第四阶

^①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新闻学刊》,1988(6): 5-13

段（1992-1996），与上一阶段相比，学界开始放弃对新闻改革的鼓与呼，更多地转向知识本身的探索，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第五阶段（1997-至今），随着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以及研究队伍的扩大，新闻传播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向多元化发展。

2.1 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新闻传播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1976年10月，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其遗留下来的各领域的混乱秩序仍没有得到有效更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新的思想桎梏，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因为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是探寻事物的规律，是求“是”，检验规律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一些抽象的条条框框或教条式的语录。政治和社会步入正常轨道，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在文革期间，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事业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新闻工作的真实性、严肃性荡然无存。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为代表的新闻界积极行动起来，在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修复自身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3月，被称为“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①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新闻界一方面继续深入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一方面开始把中心工作转移到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推出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经济宣传报道，为全社会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相应地，新闻业务也摆脱了以政论、文件为主的局面，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政论纸”开始向“新闻纸”回归。尤其是1980年新闻媒介关于“西水东调”和“渤2”事件的舆论监督，彰显了新闻报道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功效，恢复和提高了新闻界的声誉。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新闻工作者

^①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新闻学论集》，总第18辑

（包括学者），如范长江、邓拓、王中等，相继得到平反。与此同时，不少报纸纷纷恢复出版，如《工人日报》（1978年10月）、《北京晚报》（1980年2月）、《新民晚报》（1982年1月）。全国各类报纸从最少时候的42家（1968年），恢复和发展到382家（1980年数据）；全国性报纸也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安岗，1982）。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市场、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这都表明整个新闻事业随着国家一起开始走出文革的泥潭，逐步恢复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新闻传播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尽管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新闻传播事业自身元气的恢复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其起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新闻教育、科研机构的恢复与建立则为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提供了人才和机构上的保障。

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等高校的新闻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办，北大新闻专业整体并入人大新闻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①、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也开设、开办新闻学课程、专业或学系。除培养本、专科生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从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新闻教学、科研工作^②，成为学术研究的后继力量，学术发展的持续性得到保证。

除高等教育机构外，专门的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学会也纷纷成立。1978年8月，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该所在新闻资料搜集整理、新闻传播研究、组织、交流和人才培养上都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北京广播学院于1980年9月成立了新闻研究所。部分省市也建立了一批新闻研究机构，如吉林省新闻研究所（1979年3月成立）、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1980年2月成立）、甘肃省新闻研究所（1981年12月成立）等。除此之外，媒体内部也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如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部（《新闻战线》杂志于1978年12月复刊）、新华社新闻研究部（1980年成立）、中国青年报社研究部（1981年2月成立）以及天津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设立的研究所、室等。资料显示，至

^① 该校于198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98年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合并。

^② 资料显示，1981-1983年三届毕业的218名新闻学研究生中有55名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占总人数的25%。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50页。

1981 年,我国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 33 个^①,1982 年底和 1983 年底分别为近 40 个和 50 多个^②。

与此同时,研究者的组织——学会和交流园地——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 年 2 月,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1984 年改称首都新闻学会)。它是我国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该学会办有《新闻学会通讯》和《新闻学刊》,设有新闻理论组、新闻法规组等 11 个学术组,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大量新闻调查、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在 1980 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号召力。除北京新闻学会外,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等也恢复或成立了新闻学会。

1980 年 8 月,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恢复活动。此后各地记者协会纷纷恢复活动或成立,它们的业务范围中也涵盖学术研究。

1980 年 12 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会的任务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以及新闻事业史、干部培训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新闻学术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学会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五报会议”。1980 年 5 月 5 日至 12 日,由《陕西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和《甘肃日报》共同筹备发起的新闻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这是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宣部新闻局、各地报刊、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 40 个单位的 8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着重探讨的内容有:报纸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的指导性和真实性;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党委与党报的关系以及新闻自由等。这次大规模的盛会,“不仅烜赫当时,更光照后世”,“昭示着我国新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

新闻学术期刊方面。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于 1978 年 12 月复刊。它一直是全国性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刊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国际新闻界》于 1979 年 5 月复刊,1980 年起改为 16 开本的季刊。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于 1979 年 8 月创办,前 5 辑为不定期出版,

^① 参见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 59 页。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 28 页。

^③ 方汉奇、李鑫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5 页。

1981年起改为季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于1981年创刊。其他新闻传播研究刊物还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北京广播学院主办,1979年9月创办,内刊)、《新闻学习》(湖北日报主办,1980年8月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1981年创办,1984年公开发行)、《新闻战士》(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1982年1月复刊)等。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大多以经验交流、业务探讨、史料整理为主,理论研究较少,但它们的恢复或创办为新闻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由于文革期间新闻教育、研究的中断,导致研究队伍断层,造成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人员以文革前的老一代为主^①,再加上有新闻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以实力最强的几个教学、科研机构为例来看^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有40多名科研人员,整个北京广播学院有专任教师280人,人大新闻系有教职工60多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专任教师51名,合计教职工400多人。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③。除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外,高校新闻学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④。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虽在恢复,但研究仍非常有限,不过恢复和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这是由当时特定的背景所决定的。新闻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新闻界的形象和尊严荡然无存。因此,步入新时期的新闻界在起点上连零点都算不上,实际上是处于负起点上,所以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开始研究。这种状况反而为学界提供了诸多研究课题,也是造成有实务经验的新闻人成为研究主体的原因之一。

除传统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于1983年底开始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新闻与美学、新闻与哲学、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4月,有“传播学集大成者”之称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

^① 198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人大、复旦、暨南大学新闻专业第一线的教师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62页。

^② 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393-395、399页。

^③ 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3),第53页。

^④ 《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30页。

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关于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新华社、《新闻战线》编辑部等代表参加。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目前的研究对象、内容、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我们对传播学应采取的态度：“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会议内容结集成《传播学（简介）》一书，于1983年1月出版。这是我国关于传播学介绍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标志着1978年以来，对我国传统新闻学^①影响最大的一种外来思想、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开始从零星介绍转为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研究。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新闻学，一边在逐步恢复，一边又在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方汉奇、艾丰在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的研究是此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正式出版于1982年，是解放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现象的理论著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第一次系统化表述。该书成为当时大多数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材，并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该书在10多年发行的高峰期，销售20多万册，称之为新时期之初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并不过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该书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新闻有学”。该书不是泛泛、零散的经验总结，而是有一定理论体系的著作。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②新闻事业与党的关系始终是该书关注的焦点，^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以来，系统地建构‘党报’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著作”。^④影响大，争论也大。甘本人也总结过它的不足：一是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二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三是个别论点不一定正确，或不完全正确，

^①本书所谓“传统新闻学”既是时间上的概念——1978年传播学导入之前的新闻学统称传统新闻学，又有特定涵义。张昆（1997：294）认为传统新闻学，“是以报刊等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历史三板块研究的新闻学体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又可以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张昆认为，中国传统新闻学的重大缺陷有：（1）满足于定性研究，忽视了定量分析；（2）满足于对现有新闻体制的论证，放弃了对现有传播体制的剖析和未来新闻传播的科学预测和设计；（3）满足于对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思辨性；（4）满足于孤立地分析新闻现象与新闻规律，忽视了新闻现象同现实背景及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5）满足于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忽视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6）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了对不同媒介的综合研究；（7）满足于传者研究，忽视了受众分析；（8）重视传播内容的研究，忽视了传播过程与效果分析；（9）过分强调新闻的政治性，忽视了新闻传播的其他属性与功能；（10）片面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忽视了新闻机构与党的正常关系的研究。本书所谓“传统新闻学”的涵义即在于此。参见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5页。

^②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③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④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或不必要强调得过分。^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无法抹杀的。

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著)被认为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出版的一部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学术著作”^②。“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③1987年,该书荣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新闻史料的收集和基于史料的判断始终是新闻史研究的主题,也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该书材料丰富、体制恢宏,订正前人研究的谬误达200多处,是一部信史。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得出许多新的见解。

应该说,在我国纷繁芜杂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新闻业务类研究最多,其中又以经验总结为主。这类著述虽然可以称之为“研究”,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又很难冠之以“理论”或“科学”,因为其缺乏必要的抽象和概括。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分析工具,分析新闻采访的规律,把我国新闻业务研究第一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被称为“新闻哲学”。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曾自评该书是“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④由于没有做足够和细致的比较,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是中国和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但其对新闻业务的理论化和抽象程度,以及其在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直到今天仍无法超越。

文革期间,片面的、教条的、语录式的“贴标签”法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还谈不上是研究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作出了一定贡献。1983年10月、12月分别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更是使学界经受了两次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洗礼,有利于早日摒弃教条主义,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恢复和回归仍是初步的。上面提及的三本代表性著作都还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⑤由此

^①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②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862页。

^③甘惜分:《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1):33-34

^④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⑤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也可以看出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异常艰辛和不易。

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学者深感学界普遍不知如何开展新闻学研究的状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研究、科学研究及研究方法问题，做了一些常识的普及工作，以促进、加强新闻学研究。如王中写于 1980 年的《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和《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宁树藩写于 1981 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和方汉奇写于 1982 年的《消除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等。

总之，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进行，新闻事业、新闻教育、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和专业期刊得以恢复。在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领域分别出现了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新闻无学”的论调。传播学也开始从零星介绍到系统研究。这些都为此后新闻传播研究的持续开展做好了准备。新时期之初，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虽然起点低，但在短短 5 年时间内的进步还是巨大的。

2.2 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但由于 1989 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没能持续下去。因此，1984-1988 年是我国全面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大环境，新闻改革只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新闻改革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关于媒介功能定位、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媒介制度等体制层面。改革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即信息量增大，以提供信息为主的媒体增多；相应地，媒介的功能和结构都有了变化；接着，媒介体制^①开始有所松动。1985 年广播电视事业被列入第三产业；同年，《洛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1988 年前后开启了媒介可以办公司的先声。1988 年新闻出版署对 15 个省市的 175 家报社的调查统计显示，已经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社占 54.2%^②。从总体上看，媒体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大发展。最能代表新闻改革成就的新闻法也于 1988 年完成了起草工作。尽管至今仍没出台，但它标志着当时新闻改革的推进程度。

^① 包括经营管理、舆论监督、新闻自由、新闻法等问题。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 4 页。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从报纸的规模看,1983 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共 792 种,1984 年则达 1049 种,1986 年底已达 2151 种,1988 年底这个数字更是达到 2322,6 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 年底全国共设有电视台 52 座,1988 年底达到 422 座,是 1983 年的 8 倍多^①。电视在全国媒介整体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报纸的“新闻+副刊”相比,电视以电视剧为主要产品,大众文化开始在中国进一步发育。电视的发展并渐具影响力在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上得到了呼应。1985 年 4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广播电视专业并开始招生。1986 年 10 月 15 日,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同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开始出版。1987 年 7 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它是全国性广播电视专业较高层次的学术刊物。这都意味着,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而以前都是以报刊为中心的。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 年 5 月 28 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部署加强新闻教育工作。受此政策的直接影响,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于 1983 年增设新闻系或新闻专业。至此,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 21 个。全国高等学校新闻类专业点由 1983 年的 16 个,增加到 1988 年的 74 个^②。1987 年 10 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高校新闻教育改革讨论会上,已经开始呼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切记片面地追求速度、求数量。这从反面说明,本、专科层次的新闻教育在此阶段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规模迅速膨胀。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教育迈入一个新台阶的是博士教育的开始。1984 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获得授予权,并从 1985 年开始招生。首批博士生导师为甘惜分、方汉奇和王中。博士课程的开设,是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和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1988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同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被列为高等教育重点学科点,也是我国首个新闻学重点学科。至此,以人大、复旦为龙头的新闻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教育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师资力量的增加。1989 年 12 月的

^① 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计算得出。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89),第 12 页。

统计数字表明,全国共有新闻类专任教师 880 人,比 1982 年的同一数字增加 400 多人。高职称教师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教授 40 多人,副教授 240 人^①。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 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团体发展到 150 个^②。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相继成立,分散的学术组织得以整合。由复旦和人大自设的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 1986 年先后成立,这标志着高等院校新闻院系在承担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科学研究正逐渐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继 1983 年新华社成立研究所后,人民日报也于 1986 年成立研究所。从 1986 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面的课题^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这是“我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大喜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它再一次向社会宣告,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对繁荣我国新闻学研究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④在 1987 年第一次评定中,《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新闻采访方法论》(艾丰)分获一等奖和优秀奖。跻身社会科学界重大基金资助体系,表明新闻传播研究正在突破新闻学界这个小圈子,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林——最起码在体制上如此。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争论反过来有助于新观念的扩散,进而推动新闻改革。这是该阶段新闻改革与新闻传播研究高度互动的体现。争论的话题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的指导性、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等等。这些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随着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入,争论开始集中爆发。从 1985 年到 1989 年,连续 4 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均开设了“专题讨论综述”栏目。《新闻学刊》也专门设有“争鸣”栏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些问题经过争论初步达成共识,如新闻真实性问题、新闻的指导性与服务性问题等;而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新闻的定义等。对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关注,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由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研究。

什么是新闻?或者说新闻的定义、本质是什么?这与人们的新闻观(对新闻的基本看法)密切相关,又是新闻传播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基本问题。该阶段出现的

^① 《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 14-15 页。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 12 页。

^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于 1983 年,“六五”期间设立的项目中并无新闻学。

^④ 甘惜分:《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1): 33-34。

诸多新闻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事实说，二是报道说，三是信息说。^①它们分别以范长江 1961 年提出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陆定一 1942 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宁树藩 1987 年提出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为依据，或扩展，或补充，或完善。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文革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这是根本问题；二是都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来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而持后一观点的日益增多。这也反映出“阶级斗争”这种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新闻价值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先后”问题，二是主、客观问题。“先后”是指新闻价值到底是作者衡量、选择事实的依据（在新闻作品之前），还是评价新闻作品的标准（在新闻作品之后）。主、客观问题是指新闻价值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1957 年反右派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禁区。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深层次问题。新闻价值是这一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与 1957 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不管持何观点，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②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它表明，我们开始承认新闻学中有一些知识（如规律）是可以超越阶级性的，是普适的。这一认识的转变，为我国新闻学术继承以往的研究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可以继承的研究，不光是无产阶级的，还包括国共两党对立时期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的版图。

新闻的真实性是个恒久话题，争论已久，尤其是在 1985 年，“讨论广泛而深入”。讨论的焦点是所谓“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问题，即如何做到真实，怎样才算做到真

^①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

^②何湘：《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 71 页。

实。真实不真实在新闻操作中本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多方核实），但在新闻传播研中却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原因是真实性这个问题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①这表明“左”倾思想依然紧箍着人们的头脑，简单地排斥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学，用哲学范畴代替新闻学范畴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

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有四种主张：一是包容说，即宣传包括新闻，新闻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二是并列说，认为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三是无差别说；四是交叉说，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②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交叉说逐渐成为共识。这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新闻事业开始初步有了独立性。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如此，其有个基本前提：党性与人民性是可以分开的。而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一体的。这样，问题就必须转移到解释什么是党性、什么是人民性上。于是，问题一下子又转移到意识形态的论述上了。就新闻事业而言，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尤其是报纸监督同级、甚至上级党委的问题。

1985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真实性等问题。新闻界的争论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同时，这篇讲话也为上述争论定了性。总的来看，应树立的新闻观念包括：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树立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的报业观念；破除单一的功能观念，确立多功能观念；破除“舆论一律论”，确立舆论不一律的观念，让新闻媒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出多种声音；破除只传播不反馈的观念，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新闻信息观，加大新闻媒介的信息量；破除“平面”新闻观念，提倡“立体式”报道；破除大造舆论、大打宣传战的观念，确立按新闻规律办事，使新闻报道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③。这些在学界达成共识的观念，实际上是以大众传播的功能、体制、操作方式等为参考标准的，这反映出学界构建大众传播体系的构想，这是与当时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的改革相一致的。后

^①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②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③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12-13页。

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些超前的构想在当时实现起来是不可能的。

通过该阶段（有的争论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的，只是中期达到高潮或初步达成共识）新闻学术争论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是由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特殊年代所决定的。它表明，尽管思想解放已数年，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习惯依然存在；第二，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该阶段的一些争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当今新闻教科书中的必备问题，尽管尚有部分问题没达成共识，但没有这些争论，我们就无法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它们。1991年，几乎每次重大论争都参与了的甘惜分教授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他认为争论澄清了些问题，即使对一些问题无法定论，通过争论也发掘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争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争论锻炼了队伍，人员大增，研究所林立，专著有一百多种，刊物达数十种，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①

在研究方法上，开始逐步摆脱单一的哲学思辨方法，系统论方法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之一。1985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全国掀起一股信息热。由于新闻媒体是信息的基本载体，“信息”一词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之一；扩大信息量，提供信息服务也成为媒体改革的方向之一。我们知道，“信息”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信息科学和系统论方法分别是传播学的学科来源之一和基本研究方法。从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进程来看，传播学此时逐渐发展壮大，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日益深化。1985年，首都新闻学会成立了传播学研究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分别于1984年、1986年成立，传播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1986年8月，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目标。研究成果上，1986年出版了居延安著《信息·沟通·传播》一书；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出版。另外，还有诸多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令新闻学研究耳目一新。信息概念的借鉴与融入、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1988年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3辑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可以看作是新闻学界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学、探究二者关系的一次集中展示。同年，刘卫东著《信息论与新闻》一书出版，标志着系统论方法开始运用到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

^①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中。

也是在 1988 年,“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五十多篇交流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制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等三十门学科。这表明,传统意义上以“报学”为代名词的新闻学,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开始有所更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1978 年以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新闻调查(或曰受众调查)是 1982 年“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新闻调查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角色,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如“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等。如果把这些调查看作量化研究的话,方法是次要的,为新闻改革服务是其主要目的。

新闻改革意味着创新与突破,新情况、新问题带来新观念、新研究,新闻研究又反过来促进新闻改革。由于该阶段新闻改革如火如荼,新闻传播研究自然发展迅速。这种发展直接表现在著作的出版上。1978 至 1988 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 1050 种^①。1988 年是改革开放的第 10 个年头,1989 年则是建国 40 周年。稍后出现了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发展状况的总结文章,如《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何光先)、《10 年新闻理论研究综述》(童兵)、《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丁淦林)、《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 10 年回顾》(陈力丹)等。这些文章普遍认为,改革开放 10 年来新闻学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同时,“任重道远”。

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由首都新闻学会骨干成员如胡绩伟、何光先、戴邦、钱辛波等做出的,主要内容仍是对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的辨析。大多数观点和主张都多多少少涉及新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展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新闻史研究由于与新闻体制改革没有直接的关联,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很多大型研究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撰等)已经启动。

^① 《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 16 页。

2.3 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极少数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反思与清理错误言论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1989 年 11 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机关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重点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讲话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 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对政治方向严重错误、思想倾向不好和过多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大力进行压缩整顿”。1989 年和 1990 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 1496 种、1442 种^①，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政治风波影响也较大。从 1989 年下半年起，个别学术刊物（如《新闻学刊》）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新闻传播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 1990 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主体是各大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如邵华泽、穆青、范敬宜、吴冷西、徐光春、林枫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一些过激的观点以及如何贯彻中央的有关精神，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和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以往关于“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新闻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

由于前期积累的结果，该阶段仍有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新闻理论方面，王益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1989）和江柳著《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1991）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1990）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1990）对

^①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第 2232、2251 页。

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传播学方面，心理学学者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一是力图阐明传播学是一门学科，为这一学科的存在理由做些陈述；二是力图开拓另外一些研究角度”。^①“另外一些研究角度”包括“文化与传播”、“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特点”、“信息传播的内在机制”等，这都是以往传播学著述中所忽略的。

“政治风波”改变了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轨迹，此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 1980 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②新闻传播学界同样如此。陈力丹在一次访谈中透露，1989-1991 年期间，由于搞清查运动，什么正经的研究也无法做，只好参加了多部综合性词典的编写工作，担任新闻学部分的编委或分科主编，先后写了近 2000 条新闻传播方面的词条（包括新闻界人物）。^③回避敏感度较高的地带，“钻进古纸堆”，转向与新闻改革前沿较远的研究领域，成了学界的共同选择，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无奈感。

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 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 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包括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著教材的研究）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如陈力丹、孙旭培、李良荣、童兵、刘建明、郭镇之等，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乏实务从业经历，但更大程度上凭借的是教育和学术资本，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2.4 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反和平演变”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1992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

^①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 页。

^②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5)：133-150。

^③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一目标，整个社会的中心和重心都转移到了市场经济建设上。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政治风波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 年共有 191 家报纸创刊，大约平均每两天出现一家新报纸^①。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 1992 年底为 1666 种，1995 年底重新回到 2000 种以上，达 2089 种。除了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一般省市级报纸都增加到 8 个版面。《广州日报》每周 4 天出 12 版、3 天出 16 版。继晚报、周末版之后，1995 年 1 月，《华西都市报》创刊，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②。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4 年 5 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从政策上对媒体集团问题做出了回应。1996 年 1 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全国组建报业集团的试点单位。一种企业化的管理制度正式引入新闻事业单位。在传播手段上，除了通讯社、电视、广播普遍使用卫星传输之外，199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贸易报·电子版》正式上网发行，网络传播初现端倪。以上各方面的发展说明，信息观念已经落实为新闻传播实践。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除了完成宣传教育中心任务外，开始不断丰富和扩展。

除了媒介结构和规模、经营管理方式、媒介集团化的变化外，市场经济带给新闻传播界的冲击和影响还反映在从业人员的心态变化以及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上。坊间流传的民谣“一等记者卖情报，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奔商潮，四等记者拉广告，五等记者会上泡，六等记者编文抄，七等记者搞投靠，……末等记者写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波是何等猛烈。1993 年，也成了与有偿新闻大决战的一年。^③

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的关系是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有偿新闻、新闻侵权、新闻商品性和职业道德等。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集中在 1993 至 1994 年，1995 年有所减少。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新闻伦理道德研究开始深入化。1996 年 4 月 23 日，中国记协学术部与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闻伦理学纲要》（周鸿书，1995）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研讨会。《新闻伦理

^① 数据来自《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第 2321 页。本段中的数据均来自《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

^② 第一家以“都市报”命名的报纸是《贵州都市报》，创办于 1993 年 8 月；1994 年 1 月，《三秦都市报》诞生，但它们都没有在业界产生多大影响。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 1995 年 1 月创办的《华西都市报》。

^③ 黄珊：《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8-289 页。

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现象、规范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为的著作，填补了新闻伦理学专著方面的空白。当然，除了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外，还包括对新闻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随着媒介结构的变化，党报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所消弱，党报如何发挥应有的功能和影响成了一个问题。1995 年出现了党报研究热。稍后出现的新闻策划之争也是市场经济对新闻传播实践冲击之下在学界的反映。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 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 66 个，^①1997 年则发展到 120 多个^②，五年实现了翻番。第五批（1993）和第六批（1996）合计批准了 12 个新闻学硕士授予点。^③

研究机构也有增加。截止 1996 年底，全国已有 100 多家新闻研究机构^④。1992 年 6 月 11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方汉奇为首任会长。该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新闻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其研究方法和模式比较固定化，新闻史学会成员之间有较高的共识，即对于如何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有大概相同的认识和判断标准，所以它在诸多新闻传播学术组织中成为最具学术共同体的特征的一个组织。1994 年 5 月 25 日，中国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举办的第一次新闻心理学的专题学术会议。1995 年 11 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传媒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越来越专业化是知识不断专门化和学术研究注重精耕细作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现。

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社科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于 1993 年 4 月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继续出版，所载文章也从以史料收集整理为主转变为以发表高层次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为主。1993 年 5 月，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出版。它是我国目前收入条目和文字最多的一部新闻学辞书，学术性非常强，“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为新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⑤。1996 年 3 月，《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出版。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传播专业辞书。

^①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9 页。

^② 《中国新闻年鉴》（2002），第 59 页。

^③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4 页。

^④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 2457 页。

^⑤ 《新闻学大辞典》序，第 2 页。

市场经济对高校教师队伍也有影响。1995年6月19-28日,由国家教委高教司主持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新闻教育研讨会,也是一次涉及21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教学方案定位的会议。会议分析到,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存在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现象。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热、“脑体倒挂”等社会现象在高校教师身上的必然反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下心去扎扎实实教书、研究,要么离开教育、甚至新闻界,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

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闻与政治联系紧密,大多新闻传播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整个八十年代更是如此。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在很大程度上把新闻传播研究者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①,学术生态因此而改变。在此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呈现出的面貌可以这样描绘,一是对相关政策的积极表态和论述,阐释其合理性以及如何实现;二是放弃新闻改革的奔走呼号,转向知识本身的精耕细作,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前者如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指示精神,各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此的研究文章,强调正确引导舆论的意义。从此,关于舆论导向的研究长盛不衰,除了大量表态性、经验性研究外,直到1996、1997年,对此的研究才开始有一定深度^②。后者带来的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另外,一批经过严谨学术训练的新闻学硕士、博士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并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基本地位,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郭镇之、尹韵公、秦绍德、李良荣等。这也使得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入门门槛不断提高,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与业务界的研究不断分化。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1993年出版的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

^①王全林:《“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3月。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由研究者的自觉和国家的引导机制共同造成的。课题、项目的设立即可看作是引导机制之一。

^②《中国新闻年鉴》(1998),第44页。

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前后花了 10 年时间，通读了 50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有关资料，作过 10000 多条名目索引、3000 多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①，把分散的、零星的材料系统梳理、整合起来，并创造性地用“精神交往”这个概念加以统合，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信息传播的诸论点理论化、体系化。这一重大创新性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奇方评价其是研究马克思的新视角，“尚没有人像陈力丹这样全面而有系统地就这两位思想家关于精神交往的学说，从整体上进行阐发”。^②

新闻史研究方面。1992 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社科课题，规划于 1987 年。全书共 3 卷 25 章，约 263 万字，共有 24 个单位的 50 位作者参与了写作。时间跨度为公元前 2 世纪至 20 世纪 80 年代，是目前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个案研究方面，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于 1994 年出版。作者花了四年时间翻阅了新记《大公报》23 年全部报纸，摘录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订正了不少前人研究中史实上的夺失，并且不掩过、不溢美，如实评价其得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该书是诸多大公报研究中的一部力作，“最为翔实，也最见功力”，^③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④。

上述研究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新闻理论方面。1995 年 5 月出版的黄旦著《新闻传播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传播学重构新闻理论的著作。它把传播理论融入到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中，以“新闻的传播”作为逻辑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党报”、“新闻事业”为中心概念的新闻学体系有所突破。“以传播学的框架重构新闻学”的思路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效仿，之后以“新闻传播学”为名的著作又出版了近 10 部。

综上所述，从学术构成要素来看，该阶段的新闻传播研究被迫放弃了 1980 年代集中论述、倡导新闻改革的思路，转向离敏感地带较远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入探究，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性研究为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跃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① 陈力丹：《写在前面》，载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② 转引自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3 页。

^③ 方汉奇：《1949 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④ 参见方汉奇为《新记〈大公报〉史稿》写的《序》。

2.5 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

1997年6月，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新增设了一个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对促进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国家认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新闻传播事业、教育的特点相一致，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一是指研究内容多样化、分散化；二是指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证研究不断增多；三是指研究机构、研究主体的构成也渐趋多样化。

1997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竞争和变革开始加速。传媒构成上，原来是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成为后起之秀，并给报纸、广播和电视带来深远影响。网络媒体的出现被称为是媒介进化史上的新的里程碑。^①不仅如此，网络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其是一种新的媒介，还在于它重构了传播生态（如虚拟化、深度卷入、网络犯罪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信息传播世界。因此，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也必须是多学科、多方位的。

报业方面，报纸种数在1997-2006年间一直保持在2000种左右。2003年7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等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开始对报刊业进行建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整顿。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有所减少，但随着版面的增多，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随着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办，这种继晚报之后的新型市民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大地，三五年间，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②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报业竞争（主要是都市报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从1997年元旦开始，辽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青海、江西、福建、内蒙古、安徽、江苏、陕西、黑龙江、北京和山西等省级电视台的节目陆续上星。1997年8月，国务院批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电视台

^①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春)：21-26

^②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节目均可上星传送。从1998年10月起,宁夏、重庆、上海、甘肃、河北、天津、吉林的电视节目也陆续上星。1999年10月,我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个省份——海南省的电视节目上星。至此,我国所有省级台的节目全部实现了通过卫星播出。电视上星,开始是高原、山区等地方信号传输、提高覆盖率的需要,后来很快演化为一种竞争态势。与都市报的区域化竞争不同,卫星电视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

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1996年,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经过两年的探索,报业集团家数迅速扩大,至2002年底,全国经批准正式组建的报业集团已达39家^①,报业集团的全国性布局基本形成。1999年7月,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入资本市场。相对于报业集团化,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相对滞后,直到2000年11月7日,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才成立。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

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开始凸显。这是在既有传媒体制框架内所呈现出的新的外延性特征,它并没有带来媒介制度的改变,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体制改造”。^②这也是我们慢慢摸索出的新闻体制改革的可行之路。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超常规发展。199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我国实力最强的两个新闻学院拥有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继拥有了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之后,1999年11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正式挂牌成立,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已进入新的更高阶段。此外,新闻学重点学科也有增加。2002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为重点学科,复旦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学科。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为重点学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学科的设立和保持,一是说明新闻传播学科在国家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二是说明,起码在官方看来,新闻传播学科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这无疑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空间。2002年度(第四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首次出现了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的身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的博士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

^①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②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观新闻编辑研究》入选。2003、2006 年又有两篇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①。虽然与其他传统优势学科相比,获奖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还非常小,但它说明新闻传播学科起码经得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检验和审视了。

资料显示,1994 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 66 个。1995-1999 年,5 年增加 58 个,平均每年增加 10 个左右。随着 1999 年全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2000-2002 年,新闻学类专业点增加了 204 个,平均每年增加 68 个。其中仅 2003 年就新增 100 多个。2004 年专业点总数约 470 个。2005 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到 661 个。^②另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 123 个,其中新闻学 60 个、传播学 63 个;博士点 19 个,其中新闻学 10 个、传播学 9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6 个,博士后流动站 3 个。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 10 万人,教师约 1 万人,教授约 1000 人。总体而言,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③2001 和 2002 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继成立新闻传播学院。由于这两所大学特有的影响力,进一步刺激了新闻传播教育持续升温。

新闻传播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1998 年 5 月 4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等目标。2002 年 6 月 28 日,科技部和教育部下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当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作用,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为此,将选择一批研究力量强的高校,进行创新基地建设试点。通过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加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交叉和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它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和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的能力,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科研力量和较高科研水平的研究型大学^④。顾

^① 分别是《新闻事实论》(杨保军)、《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

^② 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问题》,《新闻战线》,2005(7):64-65。

^③ 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新闻记者》,2007(1):62-64。

^④ 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2002]202 号)。

名思义，科学研究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4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出台、目标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浓烈的社会氛围，同时也对学术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并为未来的发展规划好了蓝图。

从组织到业界、再到教育和科研机构，都兴起了研究之风。1997年11月，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时，新闻论文首次列为我国综合性年度新闻评选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项目。新闻界最具号召力的、半官方组织设立学术委员会无疑表明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1998年3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教育科研战线以外的、也是全国新闻实务界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分别于2004、2006和2007年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辟了大众传媒机构从事高层次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领域。这说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如集团化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开发、媒介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其本身变得比较复杂，需要高层次的研究以科学决策。高校方面，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也相继被批准为重点研究基地（俗称“小基地”）。从名称上我们不难看出，四个研究基地在研究内容上虽各有偏重，但从其具体成果看仍是比较多元的。2006年3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该基地既是一个跨学科、跨部门、国际性的研究实体，也是一个与相关学术机构资源共享、与相关政府部门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也获准设立国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俗称“大基地”）。“大基地”这种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除上述体制化研究机构外，原有民间学会、研究会、学术会议（如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继续存在并定期举行学术活动，一些新的民间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规格、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有：中国都市报研究会（1998）、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2002）、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

播学分会”)(2006);较有影响的、定期举办的学术会议有:“全国传媒伦理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9年11月^①)、“中国传播论坛”(2001,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2001年12月)、“中国传播学论坛”(2001年12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3年10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2004年5月)。

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学理论、方法进一步融汇到传统新闻学中。一是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如徐小鸽著《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6)、李广增著《新闻传播学》(1997)、童兵著《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2001)、李元授著《新闻传播学》(2001)、蔡铭泽著《新闻传播学》(2003)等;二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三是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使其地位不断上升,只要谈论新闻学就无法撇开传播学,以至于出现“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与传播学”等暧昧有加的名称,二者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这些名称见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在学界更是可以畅通无阻。这充分表明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除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纪念研讨会(如2001年6月17日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讨会”)、一般研究性文章和教材的出版和修订外(如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辟专章论述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一项规模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于2004年开始实施。是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决定重新编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2004年12月,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等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的编写问题。目前系列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另外,在“八五”和“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课题规划中,该方面的研究占据非常重的分量。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得到了及时总结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① 此时间为第一届会议时间。下同。

有：康荫、杜丽华著《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概论》（1999）、李雪著《邓小平新闻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2003）、陈富清著《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2003）、雷跃捷主编《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2005）等。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以及丁柏铨等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2006）。此领域的大量研究，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另外，由于思想的解放，学界不再仅仅把它们作为抽象的条条框框，而是按照学术的基本规则（如实事求是、客观评价等）来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理论专著。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地论述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并且对党的新闻思想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作了总体的概括和评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该书注重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地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注意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些关键时期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的真实情况，对其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概括和评价^①，体现了客观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为中国当代新闻史的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话语方式。

这些论著强调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延续，更强调论述的是他们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因此，虽多为历史研究，但仍不失对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情境的现实关怀。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这将引导着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

该阶段出版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专门史研究。2004年1月，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著作，填补了一个空白。以往的新闻史几乎都属于报刊史的范畴，这部专门史的出版标志着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5年3月，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出版。它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多学科视角的、立体的扫描，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并且对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进行了重新评价。地方新闻史研究开始繁荣，如《香港报业纵横（当代香港报业史）》（陈昌凤，1997）、《太原新闻史》（《太原新闻史》编委会，2000）、《东北新闻史》（黑龙江日报

^① 参见方汉奇为该书写的《序》，第2-3页。

社新闻志编辑室, 2001)、《山西新闻史: 新闻传播与山西社会发展》(王醒, 2001)、《福州新闻史略》(潘群主编, 2005)等。除新闻传播事业史这个中心外, 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外围”史研究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如胡太春著《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8)、戴元光等主编七卷本“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001)、李建新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2004)、杨海军著《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2005)、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1949-2005》(2006)等。从目前研究形态来看, 虽然多为专门史研究, 但仍属通史的范畴。在新闻史的叙述形式上, 也作了新的尝试, 如 2000 年 9 月出版的方汉奇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不仅把时间延续至 1997 年, 更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编年史著作, 填补了编年史出版的空白。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图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图史》也分别于 2002、2006 年出版。

传播学研究方面, 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①外, 在地意识^②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持续深入。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是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一书。四年之后, 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全三册)”出版。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作验证, 以期检验本土情境是否适用, 试图对原有理论提出修改或完善。代表性的研究是张国良教授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 如龙耘著《中国大众传媒涵化功能研究》(2003)、丁未著《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2003)、王玲宁著《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王昊著《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2005)等。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 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 除上述两类本土化研究外, 创造性的研究仍然较少, 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 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 当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为热闹、最热门的领域。1996 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重点资助项目, 表明国家对网络传播研究的重视。网络传播研究, 初始多为介绍、描述和前瞻性研究, 随后陷入无法深入的尴尬境地, 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开始下降。^③经过 2000 年的转折, 网络传播研究不再

^① 如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常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黄旦主编的“传播·文化译丛”等, 不仅数量大, 且涵盖美国、欧洲传播学研究经典著作, 不再以美国为主, 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传播流派得以引入国内。

^② 区别于按照西方已有的框架、理论和方法的验证性研究, 而是关注自我, 甚至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③ 赵莉:《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国际新闻界》,2006(11):54-58。

限于“媒体”这一单一范畴，开始关注网络对社会的影响，视野打开了，研究随之深入。2000年6月，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召开。中国记协向全国新闻媒体发出创办“中国传媒网络论坛”的建议。2002年7月，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成果《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出版，被称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网络新闻传播最全面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①。2004年5月，“第一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召开。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网络传播专题进行全方位、深入地交流，它的成立标志着学界开始对此开展制度化的研究。2005年7月，系统总结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专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出版，并获第五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标志着网络传播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版图中开始占据一定地位。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1998年第3、4期《新闻大学》连载了时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学界几个来回的争论。争论的内容除了观点、主张之争外，还触及研究规范、方法问题。孙旭培、刘建明、张允若、姚福申在争论文章中都提及学术研究中的概念、逻辑、规范、方法等问题。由于固守传统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早期硕士、博士课程中没有相关课程）、研究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研究内容倾向于实用性对策式研究等原因，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一直比较随意，有论点无论证，或者仅仅限于举例论证，很多都是一些感想、随感或体会，造成学术研究长期无法深入，少有理论、规律的提出。关于研究方法和规范从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之后，一直有零星的论述，如孙振斌《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1983）、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1994）、《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1996）等，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8年的这场论争无疑是一次研究方法的启蒙与普及。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规范“从边缘话题到主流话语”起于1991年11月《学人》的创刊。^②之前经济学界、音乐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率先开展过讨论，之后则波及各个学科。学术规范讨论蔚然而成“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③相比较而言，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是比较滞后的。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也与传播学的影响日益深入、研究的不断积累等有关。

^①方汉奇的鉴定意见。参见屠忠俊、吴廷俊：《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页。

^②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③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8 年论争之后，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4 年 6 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表明国家开始重视学术规范，并将其制度化。2005 年夏天，首届“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举办，针对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进行研究方法培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新闻大学》在 2007 年开展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该刊编辑在第 1 期《编者按》里写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展迅猛，成就卓著，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仁们无不为此而感到欣喜和自豪。然而，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而言之，尤其在其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①。

该笔谈共刊载了新闻史学界 10 多位著名学者的笔谈文章，再次把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以上是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考察，并以此宏观地、粗线条地勾勒出其整体状况。由于构成学术的各个要素，如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统一的口令“齐步走”，发展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关系或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分而述之，以期更精细地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状况给出如下判断：

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 30 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从国家建制来看，1980 年代初新闻学还戴着“无学”的帽子，1990 被划入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1997 年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科体系中独立的一员。从新闻传播教育来看，1978 年开始硕士教育，1984 年开始博士生培养，1999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新闻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增长迅速、规模庞大。从研究机构来看，1978 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1985 年复旦大学成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

^① 《新闻大学》，2007 年第 1 期，第 28 页。

研究中心被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 年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新闻传播研究有了组织和机构的保证。从研究基金来看，1988 年成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虽然此专门基金会后来被取消，但从“七五”开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就设有新闻传播类项目。从学科代表人物来看，王中、甘惜分、方汉奇等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认可度较高的代表性人物。从代表性著作来看，涌现出《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采访方法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精神交往论》、《新记〈大公报〉史稿》、《华夏传播论》等一批力作。从新闻传播理论体系来看，从以党报刊为中心的党报新闻学到以新闻事业为中心的现代新闻学^①，再到以人类新闻、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为中心的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扩展而不断丰富。相应地，新闻学与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学科相融合形成的分支、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学科视野不断扩大，体系不断完善。在研究方法上，从比较随意的研究，到倡导学术规范；从以思辨为主，到定性定量结合，研究越来越科学化。从国际交流来看，从偶尔邀请国外专家到华讲学，到两岸三地共同研讨、合作，再到联合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外文原著的译介、学术访问和大量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的加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

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伊始，新闻传播研究开始摆脱教条化、语录式研究，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在 1980 年代整个社会改革的大潮中，新闻改革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心——从业务、经营管理改革，到舆论监督、新闻体制改造。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传播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学。1992 年以后，市场经济给新闻事业以巨大冲击和影响，新闻伦理道德、新闻商品性成了热门话题。1990 年代后期，网络传播改变了传媒格局，网络传播研究成为一道学术景观。

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研究主体上，新时期之初的研究者大多有业务经验。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经过学院学术训练的硕士、

^① 吴廷俊（2002b）认为，现代新闻学的含义包括：（1）媒介功能理论：走出“喉舌论”的局限，确立“信息服务”论；（2）运作机制原理：变单一“行政运作”为“专业运作”与“市场运作”相结合；（3）发展动力理论：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4）新闻控制理论：从纪律控制转向法律控制；（5）研究方法：从单一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并举。本书即是在这一层面使用“现代新闻学”这一概念。但从今天新闻学发展的状况来看，尚不具备现代新闻学的形态，只是实现了部分的转变。

博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并逐渐成为学术骨干。与此相应，实务界与学术界的研究不断分化。今天我们所谓的新闻传播学术，更大程度上指向新闻传播学院的知识生产。研究内容上，随着多学科的融合、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业务、历史研究开始朝多元化发展，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现象学等学科与新闻传播学开始有所交叉，新的研究点和领域不断出现，新闻传播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如新闻、新闻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研究层次上，描述性研究较多，教材所占比例很大，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3 研究主体论

研究者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的第一环节和主导因素，由他们决定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就单个学者来看，他是一个行动的个体，尤其是在倡导学术独立、自由的今天。尽管也有大师巨擘的出现，做出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并以此影响某个研究领域、学科甚至整个学术思想界，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他们凭借着某种资本进入某个研究场域，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博取自己在该场域中的结构性地位。因此，研究者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这给我们研究研究者提供了两种视角：一是基于社会的宏观考察，一是基于个体的微观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变化有着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特质，作为一个群体，新闻传播研究者必定有其作为一个群的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因素而缺少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相反，笔者认为研究者的自主与独立是学术繁荣、进步的前提。本章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导致变化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

3.1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及变化

3.1.1 考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构成及变化的一种新思路

目前关于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构成及变化的研究大概有这样几个视角^①：一是职业背景，分为实务界人士（实务派）、管理与决策人士、学界人士（学院派）；二是地域关系，分为“京派”（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海派”（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三是代际变迁，分为老、中、青和在校学生四代；四是研究者的专业知识背景。从这些视角观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的确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差别，如实务派、学院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论述风格上有较大差异；老、中、青三代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确有不同等。但这些分析途径及结果似乎都流于表面，没有

^① 参见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周俊执笔《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以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者为观察单元》（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

触及影响学术生产的关键因素。

在知识社会学界，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资本”、“场域”等概念广泛用来分析知识生产者的结构及变化。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①他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置于客观结构的背景之下，这些客观结构就是所谓的场域，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不同的行动者（agent）凭借特定的“资本”进入某一场域，并形成一种关系网络。每个场域有各自特有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场域塑造着进入其中的行动者的实践。“资本（capital）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质，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②它使行动者获得因为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经历）和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

对笔者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林丽云著《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2004）一书。林丽云在“政治经济学”和“学术范式转型”两种学术史研究途径的基础上，借用上述概念为台湾传播史研究另辟一条称为“生产场域与实践”的蹊径。受此启发，本书把新闻传播学术看作一个场域，研究者就是其中的行动者，他们凭借不同的资本进入该场域，并通过博得相应资本，形成某种关系网络，从事着新闻传播学术生产。资本类型被划分为政治资本（党、政部门的经历）、新闻实务资本（新闻传播实务界的资历）、教育资本（新闻传播或相关学位的获得）、学术资本（学术作品的出版及影响力）和社会资本（民间社会团体背景及资历）五种。场域被分成政治场域、新闻传播实务场域和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就一般逻辑而言，政治场域与政治资本、新闻传播实务场域与实务资本、新闻传播学术场域与教育资本、学术资本是相对应的。政治场域通过对实务和学术场域设限和施压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实务场域更多地强调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以创造经济效益，学术场域更多地强调学术自由、自主、独立判断和思考，通过学术研究寻求规律并影响新闻传播法规、政策的制定。

^①[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4页。

^②[法]布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3.1.2 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

1919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新闻学处于“前新闻学”阶段，新闻学术场域尚不独立存在。研究者几乎全部出自实务场域和社会场域，如梁启超等，他们通过对报刊功能及重要性的论述，倡导兴办新闻事业，达到救国、改良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实务资本和社会资本，试图通过办报达到博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新闻教育的兴起、专著出版、研究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新闻学术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它以求真，即探究新闻传播活动（初始以报刊为中心）的特点、规律为基本活动内容。考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会发现他们同时拥有教育资本和实务资本。如徐宝璜（1894~1930）毕业于北京大学，又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他曾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邵飘萍（1886~1926）1906 年秋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8 年 10 月创办《京报》；戈公振（1890~1935）虽然未曾入高等学院，但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任教，在《时报》前后工作十五年。另外，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各势力集团无暇顾及教育与学术。^①虽然各政治势力时有迫害新闻记者、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件发生，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新闻界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政治场域对新闻实务和学术场域的干预较少，教育、学术场域的逻辑得以张扬，为新闻学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三民主义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这一意识形态成为国民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政治场域对新闻实务、教育、学术场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除了对新闻界实行“党化”政策外，国民党中央还派出大量官员出任高校领导职务。在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大学，历任领导都在国民党内有较高职务。^②新闻教育和学术由于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关系，更是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格外关注。曾任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天放、马星野、潘公展、詹文浒分别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社长等要职，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虽然他们也拥有教育资本（程、马、詹均有海外留学背景，程、詹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和实务资本（就国民党派报纸而言，政治资本与实务是高

^①陈力丹：《20 世纪世界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20-27

^②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8 页。

度合一的),但政治资本是他们进入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新青年》从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起蜕变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①两极对立的政治局势开始初显。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两极对立正式形成,直到1949年国民党播迁台岛、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也非常注重通过对新闻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服务。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宣言》中说:“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②张友渔、胡乔木、陆定一等人的论述加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和《解放日报》1942、1943年系列社论,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及革命导师的办报经验为内核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论调。这些论述者显然也主要是以其丰盈的政治资本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形势,统一思想和行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当务之急。斗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得以延续。再加上全面学习苏联,导致新闻业务、教育和学术都陷入“五性两论”^③教条化的泥潭。新闻事业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新闻学研究无不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期间虽有短暂的、部分性地调整,但总体来看变化不大,并一直保持至文革结束,甚至到今天还不难发现其残留。目前仍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舞台上的老一辈学者就是在这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如王中、甘惜分、方汉奇、何微等。这一阶段,除了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的一些苏联的教科书外,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新闻学研究都是革命导师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个别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学者都遭到批判。这说明,新闻实务场域、教育和学术场域事实上已被政治场域的逻辑所支配。于是,“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新闻史几乎等同于片面的“革命史”、思想史或者无产阶级报刊史,外国新闻史则以批判资产阶级报刊及其思想为主要内容;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课程如广告、经营等一律删除。^④不过,这一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行动者大多成为我国新时期第一代新闻学者,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尤其是他们培养的硕士、博士,是现今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力干将,他们的一些观点得到

^①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②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③即片面强调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和“阶级斗争工具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

^④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了继承和发展。

3.1.3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

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深受文革之害的新闻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善了新闻界的整体形象,提高了自身地位。^①教育和科研事业开始步入正规,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认可,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中心,还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②。新闻实务、教育和学术场域开始恢复和重建自己的逻辑法则。

依此来观察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主体^③,其变化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9),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研究者为主,这些研究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新闻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姑且称为第一研究重镇),如安岗、戴邦、钱辛波、何光先、甘惜分、王中、胡绩伟、艾丰、何微等。形成这样一个研究群体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新闻传播研究的“国家队”——社科院新闻所的组建是以人民日报为依托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主任;创办社科院新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该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由安岗、温济泽、翟向东、李普、罗列、戴邦、谭立、谢冰岩、赵一鹤组成。除赵一鹤、谢冰岩外,其他均直接与人民日报有渊源,且都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他们的研究与新闻实务联系较紧,侧重研究的“实用性”。第二,刚刚恢复的高校新闻教育单位缺乏师资力量,除了文革之前仍健在的一部分教师外,要在短时间内补充师资,比较方便和直接的做法是:从新闻实务界抽调,这是主要的;或者从中文系或其他相关专业(如历史学)调转一部分师资。由此导致新闻学研究的文学研究化,如采写编评的技巧、新闻作品分析等,而缺乏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视角的关注。从培养目标来看,也是以为新闻界培养实用人才为主。“教学需要”是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力,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教材。第三,从上到下都有改革新闻业务的要求,这给实用性研究提供了外在需求。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② 邓小平:《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由于新闻史属于历史研究,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且与新闻传播实务的联系不像新闻理论、新闻业务那样紧密,所以本部分的分析基本上以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者为主。

第二阶段（1992-1997），1989年的政治风波促使1980年代“五四”式启蒙知识分子发生裂变，学术资本成了在知识界立足并拥有影响力的重要资本。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有：第一，1980年代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暂缓，新闻体制改革相应被终止。以首都新闻学会为核心的改革派受到批评，并随着“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等方针、政策的出台，新闻界自我作为的空间减小；第二，新闻教育已初具规模，除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大和复旦外，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等新闻系开始崛起，成为第二研究重镇。第三，我国自己培养的新闻学硕士、博士陆续毕业，并很快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后起之秀，学术意识开始张扬。我国早期自己培养的且留在新闻教育、研究机构的博士，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郭镇之、尹韵公等，大多数并无业务经验，但都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并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下，学术意识开始张扬。如果说上一阶段实现了“新闻有学”的目标，但那毕竟是外在的；该阶段则更多地是注重内部建构，以扎扎实实的研究来表明“新闻确实有学”。《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学大辞典》、《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等一批沉甸甸的研究成果就是有力的明证。与此同时，实务界的研究并没有减少，研究风格、思路和方法也并无多大变化，只是与以高校为主的学院派研究渐行渐远。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新闻传播学科地位的提升，高层次新闻教育规模的扩大，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学术研究主体的结构开始多样化，但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行政化色彩较重。此阶段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新一批新闻学院崛起，如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三研究重镇），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但从整体上看，复旦、人大依然保持龙头地位，其他虽有差异，但并不明显。研究队伍扩大，研究热点随之分散，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所谓学派。

二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有海外访学经历，如张国良、胡正荣、黄旦、蔡雯、殷晓蓉等。一批经过海外学术训练的研究队伍加入（如崔保国、陈卫星、郭庆光、李双龙、杨伯淑等），学界与海外同行接触更加紧密，陈韬文、冯建三、洪浚浩、李金铨、潘忠党、赵心树、赵月枝、郑贞铭、祝建华、卓南生等海外华人新闻传播学者与大陆学界保持经常往来，或在国内发表著述，或举办讲习班，或项目合作，或担当客座研究员，甚至直接加盟。这样一个群体的参与对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尤其

是对年轻研究者影响深远，如研究视野、学术态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等。^①

三是在高等教育渐趋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包括新闻传播学术在内的学术行政化也不可避免。“学而优则仕”，科研、教学、行政“三肩挑”成了常态，学术职务、行政职务常常交织在一起，学术、政治资本互为目的，尤其是职称评定中量化考核（论文数量、发表期刊的级别、课题经费及级别、著述出版的出版社级别等）的导向，导致课题、项目、成果虽多，但增量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有限，倒是简单的重复性研究不少。

四是从2002年开始出现的由传媒或政府相关机关领导人士出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职务的现象。虽然他们不乏新闻传播教育资历，但“高管”、“高官”是他们进入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瞭望东方周刊》把此类现象作为高级官员退休以后开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选择”来解读——以前除了进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②这些资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和人脉资源，可能会在学院整体发展方向，尤其是与政府、实务界的关系处理中彰显自己的能量，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产品，如在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等，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尚有待观察，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象征。笔者以为，这一带有“返祖”性质的现象说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对政治场域依然保有依附性，或者说拥有政治资本进入学术场域几乎是畅通无阻的。

总的来看，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的最关键的资本。据陈昌凤估计，目前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是8.5%。^③比例虽然不高，但如今新进高校教师几乎都要求取得博士学位。另外，在校教师职称晋级一般也需要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博士学位。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07教师职务评定文件中规定：应聘教授岗位，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原则上须具有博士学位或本专业最高学位，1959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学位；应聘副教授岗位，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原则上须具有硕士学位，197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和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学为主型教师原则上须具有博

^①金兼斌：《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学者研究状态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76-80。

^②张悦：《赵启正改任背后的官员退休通道》，《瞭望东方周刊》，总第106期，2005-11-24。

^③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士学位或本专业最高学位。^①这些都充分表明，新闻传播学术的内涵已脱离单纯的经验范畴，开始迈入专业化的门槛。与此相应，新闻传播研究也开始追求学理化，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教育资历和学术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产品。这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场域总的变化和趋势。

3.2 研究主体的互动

尽管个体有可能在某一知识门类发展过程中做出里程碑式的研究，进而影响其发展，但学术的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诸多研究者一起努力的结果。根据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解释^②可以发现，“内部交流比较充分”是其成员达成共识，形成“比较一致看法”的前提。因此，考察研究主体间的互动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可行视角。学会是研究者的组织，发挥着联络、交流的作用。学术期刊既是论文发表的载体，又是一种主要的学术交流形式。本节主要考察 1978 年以来学术论争以及学会、学术期刊这两种互动方式、机制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

3.2.1 学术论争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学术争鸣，在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80 年代，以观念之争为主，内容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这些争论以思想的空前解放和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动为社会大背景，以新闻传播从业务到体制的改革实践为动力，以影响和推进新闻改革为基本归宿。第二个阶段是 1993 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引发的论争，内容涉及新闻商品性、新闻策划等。第三个阶段是传播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之后所引发的论争，起始于 1990 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今天。论争的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传播学本土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规范与方法等。第一、二个阶段内的学术论争本书已在上一章做过述评，下面将对第三阶段内出现的学术论争作一分析。

1978 年以来，虽然“新闻无学论”已基本销声匿迹，但新闻学（此处的“新闻学”

^① 见《中国人民大学 2007 年教师职务评聘工作意见》，http://rsc.ruc.edu.cn/Rscnew/zc2007/2007js_tongzhi.doc。

^② 参见本书第 3 页注①。

区别于“传播学”)自身理论的孱弱仍让大多新闻学者有一种内在的焦虑与不安,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中取得合法性地位成为新闻学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于是,当具有浓厚学理色彩的传播学引入国内,并以“科学”(注重数据、得出普适性的结论,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里程碑式的研究或学说)姿态不断侵入传统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传播学的引入对以党报为核心的传统新闻学提出了不小挑战,扩大了传统新闻学的研究范畴,提升了其理论性,促使其向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现代新闻学转变。

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之争相似,传播学本土化之争实际上是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华人传播学者对大中华区传播研究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出路的探索。港台华人传播学者谙熟美国传播研究的内在肌理,在做了大量验证性研究之后,发现只是为别人提出的现有结论做注脚,失去了对在地情境的应有关怀。于是,“传播学的中国化”或“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成为集体呼声。因此,这次论争可以看作中国传播学者在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面前的焦虑、反思与自主性努力。

1998年《新闻大学》第3、4期发表了喻权域《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几个来回的讨论,给当时沉闷的新闻传播学术界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一名研究生对此感慨到,当时新闻学术研究的气氛不浓厚,处于“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的境况,“一篇论文发表就发表了,一般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更不要说什么争鸣商榷”。^①撇开争论的内容本身不谈,这场争论的起源、过程以及最后的“不了了之”都涉及学术规范、态度问题,如党的宣传纪律与学术自由争鸣、史料考证与论断、论文写作的规范与逻辑等。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争论竟引发一场小风波^②,使得争论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当然,一次讨论解决不了学术规范问题,但它的确给学界一个警醒,特别是那种“跑野马式”的研究此后少多了。它还传递出学界独立性增强的信号,那种凭借非学术资本而随意发表意见的时代是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如果说上述这场争论还只能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研究规范,那么2007年由《新闻大学》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就是直指研究方法问题了。该笔谈的全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在我

^①孙学宝:《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一文的质疑》,《新闻大学》,1999(夏):92-93

^②参见姚福申(时任《新闻大学》主编)的回忆录《世事茫茫难自料——跌宕一生的回忆与反思》之《回眸〈新闻大学〉风波》一文,载于http://blog.china50plus.com/club/html/?info_id=4686&parentid=15。

国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成就最突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进展迅猛,成就卓著,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在其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①。该议题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参与。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张昆、方汉奇、吴廷俊、程曼丽、宁树藩等我国著名新闻史研究者先后发表文章,展开讨论。“探讨学术、发展学术的积极性”之高令编辑内心非常兴奋,并感叹“这是新闻学术发展的一个讯号”^②。

回顾 1978 年以来的这些学术论争,会发现早期是由于新闻传播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政策框架而引发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学术争鸣以及最后共识的达成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论述。后期更多是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学术界自律、反思带来的。不管哪种类型的论争,都在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甘惜分认为,1978 年以来新闻论争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澄清了些问题”、“初步打开了国际新闻文化交流,使我们了解当代世界的新闻思潮的动向”、“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和“推动了新闻改革”,总之,“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③

不管是相较于其他学科,还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界,这种“有益于新闻科学发展”的学术论争在我国当下新闻传播学界却是十分匮乏的。时任《现代传播》副主编的朱光烈先生在 1995 年曾谈到:“几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煽风点火,想发动争鸣和批评,但响应者寥寥,收效甚微,此情此景常常引为我们的遗憾”。他认为,争鸣和批评的意义“在于它所营造出来的学术空气和学术风格,所体现出来的多种研究方法,所开拓出来的追求真理的开阔视野和较为全面、深刻的成果”^④。1998 年第 3 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在一篇商榷文章前的“编者按”里写道:“较之文学批评近几年的火爆,新闻学领域的学术批评可以说是睽违已久;常见文学界中人抱怨文学批评状况的种种不尽人意,但在新闻学领域,恐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几年学术批评有无的问题”^⑤。学术争论之少可见一斑。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的结果,2000-2006 年《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界》、《当代传播》刊载的“商榷”文章分别有 3、0、4、1、5、2 篇。

^① 该组笔谈的《编者按》,见《新闻大学》2007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② 《重新思考》,《新闻大学》2007 年第 3 期《卷首语》。

^③ 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0-321 页。

^④ 《批评,从我开始》,载《现代传播》1995 年第 4 期,第 100-101 页。

^⑤ 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47 页。

3.2.2 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是学术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学术发展的一面镜子，二者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双面的，既可以互相促进，也可能互相损害。当下非学术、伪学术、平庸学术都与学术期刊发展密切相关^①。因此，回顾、分析和反思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及现状。

新闻专业期刊是指探讨新闻传播理论、实践、业务与新闻传播科技的定期出版物。按照其发表的内容和读者的构成，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学术期刊，由高校新闻院系或研究机构主办，以发表研究性论文、学术书评为主，理论性强，刊期一般比较长，如双月刊、季刊等，主要面向研究人员和硕博士生；二是业务交流和探讨类刊物，以发表关于新闻传播业务问题的研究为主（也有学术文章），实用性强，多为月刊，以新闻传播从业人员为主要阅读对象；三是大型综合性资料刊物，多为年鉴，如《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四是“以书代刊”类定期出版物，也倾向于发表理论研究成果，周期往往也较长，多为半年或一年一期。下面主要分析学术期刊。

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大概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4），学术刊物学术性不强，以业务研究为主。学术刊物是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一起起步的。1979年《国际新闻界》、《新闻研究资料》、《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先后复刊、创刊。1980年、1981年，《新闻学论集》、《新闻大学》分别创刊。斯时它们均以发表新闻业务研究、新闻史料评述为主，也刊载有学术论文。该阶段的新闻学术刊物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园地，促进了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第二阶段（1994-1998），开始转向以发表理论研究成果为主。1993年底，社科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转为以发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学术期刊。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更名为《现代传播》，明确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播文化研究刊物。

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学术刊物增多，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匿名评审制普遍建立。1998年，《现代传播》将办刊方向从一般社会文化视角凝聚为传媒学术视角，

^①叶继元：《从学术期刊的发展看当代学术的发展》，《云梦学刊》，2006(4)：25-27。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目前盛行的、量化取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如重数量、重刊物级别（大多是由主办单位的级别而定）、规划的学术等。但学术期刊仍可以在学术规范中有所为。

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媒学术刊物。创刊于 1985 年的《新疆新闻界》于 1999 年更名为《当代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理论专业学术期刊。《新闻大学》自 1999 年起，按国际学术刊物惯例，率先实行论文稿件的匿名评审制，使文稿的选择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国际新闻界》也于 2006 年转身为综合性学术月刊。

据“新时期新闻专业期刊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在有公开刊号的 67 种新闻传播期刊中（截止到 2004 年 7 月，“纯学术探讨类”6 种；媒体及其研究机构主办的有 33 种，学会、协会团体主办的有 26 种，教学与科研院所主办的有 11 种，政府机构主办的 12 种，出版社主办的有 2 种，公司主办的有 1 种。^①根据段京肃等人的研究，新闻传播类（不包括编辑出版类）期刊 2000-2004 年间影响因子处于前列的有《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②这四份期刊均由新闻传播教育、科研机构主办，创办时间早，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首先，作为一个载体，记录了新时期我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历史；其次，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互动的平台，提供了一个交流、争论的园地；最后，作为一种学术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尤其是 1994 年以后，学术期刊不断规范，这是学术共同体不断成长、逐渐成熟的迹象之一。

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还可以在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上有更大作为。首先，“纯学术探讨类”期刊必须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匿名审稿制，以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作者名气大小、职位高低、人际关系好坏、主编喜恶等非学术因素，作为采用与否的唯一依据，杜绝权钱寻租现象，以提高期刊的信誉度、权威性和认可度^③。由于纯学术期刊大多由高校新闻院系和科研单位主办，本单位文章采用率过高，不利于学术界的整体发展。美国新闻传播类权威学术期刊大多由专业协会主办^④，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

^①新时期新闻专业期刊研究课题组：《新闻专业期刊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62-66

^②段京肃、任亚肃：《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 CSSCI 的分析》，《现代传播》，2006（5）：36-44

^③目前各高校对所谓权威、核心期刊的认定不太一致。《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2004）》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为 B 类（A 类为《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全文）》），见 <http://rsc.ruc.edu.cn/BVNews/Download.asp>；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内期刊指导目录》中 A 类（类似于权威期刊）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现代传播》，见 <http://www.gs.fudan.edu.cn/degreework/yjsqkml.xls>；华中科技大学《文科类及管理学科权威期刊目录》中新闻传播类权威期刊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见 <http://gs.hust.edu.cn/Degree/menu.htm>。

^④如美国新闻传播学界被称为第一等级（first-tier）的三大学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 of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学刊》）分别由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Broadcast Educator Association（广播电视教育学会）和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国际传播学会）编辑出版（李喜根，2006）。

闻史学会等学会、研究会主办部分学术刊物。其次,增加专题研究,变被动发表为主动引导,发挥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牵引作用。有学者认为,“学术刊物的意义不仅在于成果的展现,而且在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引导”,^①说的就是学术刊物的学术牵引功能。主题(专题)研究就是学术期刊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的常见做法,也是国际学术期刊的通行编辑方法。这一点,我国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编辑、发行的《新闻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榜样。其每期都有一个主题,几篇文章围绕主题展开,篇幅较大,论述充分、透彻。目前大陆大多数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是被动地视稿件情况设立栏目或某一期的主题,仅仅充当论文发表的载体而已。突出主题研究,就是要争取每期围绕着一个问题或现象,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度探索。要注意把下一期要探讨的话题提前告知,以充分争取稿源。再次,增加学术书评文章。目前新闻传播书籍出版非常活跃,其价值、意义、学术含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书评流于在学术外围打转转的吹捧。“没有了学术评论,一份刊物就少了生命力,而事实上写好学术评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甚至比写学术论文都更加困难。”^②最后,多安排深度和严肃的争鸣、商榷类文章。学术只有在不断争鸣、探索中才能不断进步。我国新闻学界有学术争鸣的优良传统。中国新闻学会和社科院新闻学研究所主办、1985年创刊的《新闻学刊》(1989年下半年停刊)设有“学术探讨与争鸣”专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办、创刊于1987年的学术刊物就命名为《新闻学探讨与争鸣》(后改为《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学术争鸣还可以活跃学术气氛,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有利于塑造新闻传播新进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和操守。期刊主管部门也应秉持“学术无禁区”原则,为学术争鸣提供一个自由、宽容的环境。

3.2.3 学会、团体及学术会议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据李秀云统计,1918-1949年间,中国先后出现了16个新闻学术团体。^③就学术影响而言,除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会(1929年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8年成立)、中

^①朱光烈:《学术刊物的意义》,载于《新年伊始话本刊》,《国际新闻界》,1997(1): 5-8。

^②邓正来:《以学术为本,办出学术期刊的品位》,《学习与探索》,2006(5): 234-236。

^③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国新闻学会（1941年成立）。这些新闻学术团体通过学术会议、出版刊物等专业化学术活动，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9-1976年间成立的新闻学会和团体较少。其中，195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58年江西省新闻学会、安徽省新闻学会成立，1959年河北省新闻学会成立。但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政治运动不断，实际上没有开展多少活动，遑论新闻学研究了。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学会、团体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9），以北京新闻学会（后改为首都新闻学会）为核心，以各地新闻学会及联合会为主要构成。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于1980年2月，1984年改称首都新闻学会，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1991年6月停止活动。该学会办有《新闻学会通讯》和《新闻学刊》，设有新闻理论组、新闻法规组等11个学术组，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大量新闻调查、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在1980年代我国新闻学界具有重要影响。鉴于各地新闻学会陆续成立，1980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会的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以及新闻事业史、干部培训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新闻学术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学会每年将举行学术年会、全国好新闻评选和优秀学术论著评选。现在来看，“评选”而不是学术研究是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1984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第一届理事会（1978年11月2日召开）决定在条件成熟时创办一个刊物，以推动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繁荣。^①第四届理事会（1995年11月18日召开）决定在此后的活动中增强学术内容。1989年1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成立，旨在开发新闻文化的科学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定期学术会议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首次会议于1982年11月召开，至今已举办九届。除首都新闻会外，上述团体以研讨新闻传播实务、发挥组织作用为主，学术性不强。

第二个阶段（1990年至今），学术性团体不断成立，学术活动持续化、固定化。1989年4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1992年6月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它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国家一级学术性团体，主管部门为教育部。史学会是由研究新闻传播历史和现状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它的宗旨和任务是联络全国新闻传播史专家、学者，推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成立十几年来,学会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组织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①2002年6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在上海成立。2005年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成立,也简称为“中国传播学会”。此外,大型、连续的学术会议还有“新闻心理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学会、团体和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术互动平台,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现。尤其是学术会议,与会者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争鸣,有利于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专业学术学会、团体经费严重短缺,得不到政府、企业必要的赞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压缩会期,致使发言时间非常有限,交流不充分,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其次,论文评审不严格,凡是投稿的几乎都能被采用,只要交了会务费就能与会、发表论文,有违学术会议的根本宗旨,沦为“公关会”、“答谢会”。最后,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

本章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分析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1978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经验范畴,开始迈入专业化的学术门槛,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教育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产品。因此,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最关键的资本,但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对政治场域依然保有依附性。

1980年代新闻传播学术论争是由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政策框架而引发的,1990年代中后期更多地是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学术界自律、反思导致的。作为一种互动机制,基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学术争鸣近几年呈式微态势。

1994年之前,新闻传播学术刊物学术性不强,以业务研究为主。此后开始转向以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为主。1999年之后,学术刊物逐渐增多,更加注重学术规范,

^①刘书峰:《新闻史学研究:突破口在哪里——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新闻写作》,2005(10):10-11。

匿名评审制普遍建立。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还可以在促进学术发展上有更大作为。

198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团体以北京新闻学会为核心。1990年以来，学术性团体相继成立，学术活动持续化、固定化。但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可以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面有更大作为。

4 研究内容论

要描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内容，唯一的选择是面向研究成果本身。研究成果一般以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著作主要包括专著、教材等；论文则包括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就一手文献的传播范围和易得性来看，书籍（尤其是专著、著述）和期刊是两种最主要的载体。专著、著述讲究体系性、完整性，比较宏观，是较长时期内研究的结果；学术论文则讲究论题小而深刻，比较微观，动态性强，能“反映出研究工作的最新动态和最新进展或成果”。^①为了比较精细地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概况，本书引入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不同分支研究领域在横向（构成）与纵向（变化）上的特征，以发现“问题”^②。然后，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主线，跳出分析的论文本身，梳理、分析各类研究成果，以透视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内容。

4.1 对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

4.1.1 类目的建构

内容分析的关键是建构一个周延、明确并且适合于研究问题的类目。^③类目（category）是对内容进行分类的体系。一个好的类目体系应该是互斥的、穷尽的和可靠的。互斥性原则要求每个分析单元能够且只能归为某一类别；穷尽性原则要求每个分析单元都可以归为某一个类别；可靠性原则要不同的编码员针对每一个分析单元归属的类别具有很高的一致性。^④

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都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会把研究聚焦在某一点上，而不是面面俱到。当然，论证和解决问题可以是多视角、多面向的。因此，一篇文章应

^①郭星寿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0 页。

^②此处的“问题”是指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即“学科、学人、学界存在的需要解决的矛盾及其深刻原因”（袁玉立，2006），这正是本书所努力追求的，但在本章只是寻找研究内容方面的“热点”或“有价值的问题”。

^③王石番：《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91 年版，第 171 页。

^④[美]罗杰 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1 页。

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焦点 (Research focus)^①, 它是作者在论文中“试图说明或解释的大众传播现象中的某一部分”,^②即研究的侧重点。由于新闻传播学术积累不够, 早期的一些研究不够规范, 随感而发类文章较多, 这给类目建构和编码都带来了极大困难。不过, 总的来看, 绝大多数文章还是有个侧重点, 类目建构还是可以进行下去。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关于研究焦点的类目建构主要以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科分类方式为依据。关于新闻传播学科体系,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2 年颁布 (1993 年 7 月 1 日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标准号: GB/T 13745-1992) 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 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六个二级学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 新闻传播学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下属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中, 则把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和编辑出版学设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类的四个专业。

按照学科体系建构类目是此类研究的常见做法。沈莉把《新闻大学 (1981-1996)》上“新闻学理论研究”文章的“研究主题”分为经典文献研究、新闻理论研究、传播学研究、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广播电视研究。^③韩纲把来自四所院校学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向”分为新闻理论、传播学、新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新闻业务、广播电视 (事业)、国际新闻、新闻事业史、新闻工作者、广告/公关、新技术与新媒介、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教育。^④《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1949-2005》、《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以及历年《中国新闻年鉴》上关于上年新闻学研究概况的分析、2000 年以来颇为盛行的关于上一年新闻传播研究概况的总结文章几乎都是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可见, 这种分类方法还是比较适合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这种分类方法涵盖了新闻传播的各个领域, 比较适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过, 这种分类方法较多地关注新闻学, 而对传播学的分类却比较粗略。这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是相吻合的。1990 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主要是对国外

^①常称之为“研究主题”、“研究主旨”(Research scheme)、“研究方向”。据词典解释, 主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 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因此, 就学术论文而言, 用研究焦点一词比较贴切。

^②Cooper. Roger, Potter. W. James, Dupagne. Michel (1994). A status report on methods used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Journalism Educator. Columbia: Winter 1994. Vol. 48. Iss. 4; pg. 54.

^③沈莉:《新闻大学上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1981-1996)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梳理和评估》,《新闻大学》, 1997(春): 5-15

^④韩纲:《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七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分析》,《新闻大学》, 1998(秋): 21-26。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理论作一些介绍和简单的评述；从 1990 年代中期才开始重视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探讨以及对基本理论进行再讨论。^①

参照上述文献中的分类方法，结合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本书提出如下大致的类目体系：

表 4.1 类目体系

研究主题	包括的研究领域
新闻理论	新闻学科与新闻学研究方法；新闻本体研究；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研究；西方新闻理论；新闻法规、伦理和政策；舆论研究；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研究；新闻心理研究；其他。
新闻史	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史；新闻思想史；其他。
新闻业务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策划；对新闻产品的分析、解读；新闻报道。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	发行；管理；媒介集团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济研究；其他。
广播与电视	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播音、主持、创作等）；其他。
传播学	中外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科技；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传播学科与研究方法；网络传播研究；其他
其他	包括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广告学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出版研究；新闻史料；其他。

其中：（1）新闻本体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是新闻”，包括新闻定义、新闻与宣传、新闻属性、新闻价值、新闻规律等，像指导性、真实性、党性明显属于实践论的范畴，^②但我们往往把它们放在同一层面上来讨论，有些认识本身就把它混淆在一起了。本书虽然用新闻本体研究作为这一类研究的名称，但并非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区别。（2）舆论监督研究划入舆论研究的范围内。（3）新闻史研究主要指近现代报刊史，之前的历史划入“中外传播史”中，广播电视史划入“广播与电视”中。（4）“新闻业务”类不包括广播电视业务。（5）对一些不容易区分的文章，都划入到相应类的“其他”中，没有比较集中的主题的文章则划入到“其他”类的“其他”中。

需要说明的是：（1）一般来说，称得上“研究”的文章都有理论性。因此，业务性研究并非没有理论性，或者理论性低于理论研究。本书所谓的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区分的，而是看一篇文章的研究焦点属于新闻传播诸多领域中的哪个领域。（2）所谓分类，其实是后来的研究者（也是旁观者）为了认识问

^①郑西帆：《转型时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4 月。

^②姚福申：《关于新闻本体的探索》，《新闻大学》，1998（夏）：5-9。

题的方便而把研究对象人为地加以区分的一种简化的认识方法。研究者在进行某项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时候不可能事先设定该文属于哪个研究领域,然后不越雷池半步地展开论述。相反,问题的解决需要按照一定的思路和方法,多角度、多面向地展开论证。一般来说,越是这样的研究其研究焦点就越清晰。所以,任何所谓正确的类目体系都是一定概率基础上的概念(即不同编码员之间的相互同意度),这也要求在归类时应以研究焦点即研究的侧重点作为划分依据。但也不排除一篇论文有两个甚至更多侧重点的可能。新闻传播学界早期的不少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时只能以编码员的主观判断为依据了。这也是影响研究信度的因素之一。

4.1.2 研究资料的获取与研究程序

根据第三章关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的论述,本书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①三种期刊作为文章来源^②。下面首先对上述三份期刊作一简单介绍,然后阐述这样选择的理由,最后说明样本获取的方法与研究程序。

《新传》的前身是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后者于1979年8月创办,前5辑不定期出版,1981年起改为季刊,出版至1993年底,以新闻史资料述评和研究为主。1994年出版季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为综合性学术刊物。《新大》1981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早期是不定期出版物,现为综合性学术季刊。《现传》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创刊。1991年与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合并,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早期主要面向学院和广播电视界的一些专业教学、科研和节目制作人员;从1994年起,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播文化刊物;1998年以来,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媒学术刊物。

从时间跨度上看,三种期刊创办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基本与本书要研究的“新时期”一致。从内容上看,三种期刊早期分别以新闻史、新闻理论、广播电视研究为主,后来基本上都转变为综合性学术期刊,这种转变与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外延及其演化进程是一致的。从刊物属性上看,三种期刊均为学术性期刊,文章的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不断增强,基本上能代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平。当然,

^①这三份期刊后文还将多次提到,为节约字数,分别简写为《新传》、《新大》、《现传》。

^②《国际新闻界》2006年之前以介绍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动态及研究成果为主,2006年起转变为“大传播”研究的学术期刊,所以本研究不把它作为研究材料来源。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刊载学术文章的刊物不仅仅是这三种，如学报^①、其他业务性和学术刊物^②、曾经创办过的新闻学术刊物^③等都发表过新闻传播学术论文，有的还具相当分量。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只有这三种刊物适合本书的研究对象。另外，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有限的，很难去“卷地毯式”地去搜集资料，也没有必要。

本书采取目的抽样法，从创刊开始算起截止到 2005 年，每种期刊每年抽取一期。创刊年都抽取第一期，第二年的抽取第二期，依此类推。如果遇到某期为专刊、专刊，则在本年度范围内抽取下一期或上一期。每年的期号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准。抽取的样本分布如下：

表 4.2 样本来源及分布

刊物	总体 ^④	样本分布	文章篇数	样本占总体的比例
《新传》	2147	1979（1）、1980（2）、1981（3）、1982（4）、1983（5）、1984（1）、1985（2）、1986（3）、1987（4）、1988（1）、1989（2）、1990（3）、1991（3）、1992（4）、1993（1）、1994（2）、1995（3）、1996（4）、1997（1）、1998（2）、1999（3）、2000（4）、2001（1）、2002（2）、2003（3）、2004（4）、2005（1）	491	22.87%
《新大》 ^⑤	2474	1981（1）、1982（2）、1983（1）、1984（2）、1985（9）、1986（13）、1987（总第 14 期）、1988（4）、1989（1）、1990 年（总第 24 期）、1991 年（总第 29 期）、1992 年（总第 34 期）、1993（2）、1994（3）、1995（4）、1996（1）、1997（2）、1998（3）、1999（4）、2000（1）、2001（2）、2002（3）、2003（4）、2004（1）、2005（2）	606	24.49%
《现传》	3845	1979（1）、1980（3）、1981（3）、1982（4）、1983（1）、1984（2）、1985（3）、1986（4）、1987（1）、1988（2）、1989（2）、1990（4）、1991（1）、1992（2）、1993（3）、1994（4）、1995（5）、1996（6）、1997（1）、1998（2）、1999（3）、2000（4）、2001（5）、2002（6）、2003（1）、2004（2）、2005（3）	542	14.10%
总计	8380	共 79 期	1639	19.36%

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为整篇文章，抽取的样本量为 1639，占总体的 19.36% 以上。相关研究表明，对连续定期出版物按月份分层，抽取 12 期报纸或杂志（周刊）的样本是最有效率的方法，12 期以上的样本得到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提高其结论的精确

^①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等。

^②如《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代传播》、《新闻界》等。

^③如《新闻学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等。

^④总体数量来自中国期刊网，包括在期刊上登载的所有文章，如消息、会议综述、书评等，但分析时只统计研究性文章。

^⑤期刊网上缺少 1987 年、1990、1991 和 1992 年，本书分别补充上去的为总第 14 期（1987）、总第 24 期（1990 年）、总第 29 期（1991 年）、总第 34 期（1992 年）。

性。^①类比此原则，本研究抽取的样本是有效度保证的。

接下来要进行试分析，以检验类目的可操作性，看是否可以大规模编码。按照 10% 的比例从样本中抽取出 164 篇文章作为子样本，让两个编码员独立编码，计算 Holsti 信度^②，结果为 0.92，超过 0.90 的经验值，说明可以进行大规模编码。^③

4.2 几大分支研究领域分析

分开来看，《新传》以新闻史研究为主（占 62.73%），其次是新闻理论研究（14.87%）和传播学研究（13.24%）。1994 年以后，刊物改为现名，开始以新闻理论和传播学研究为主要内容。《新大》以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为主，分别占 29.04% 和 28.05%。

《现传》以广播电视研究为主（占 61.44%），其次是传播学研究和新闻理论研究，分别占 14.21%、8.30%。在广播电视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业务、理论和广播电视事业研究，三者分别占 54.95%、22.22%、16.82%。合起来看，广播电视研究（25.44%）、新闻史研究（23.25%）较多，新闻理论研究（17.94%）、新闻业务研究（12.51%）、传播学研究（11.47%）次之，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研究最少，只占 4.39%。如果把广播与电视领域内的理论和业务研究分别计入总体上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传播学领域内容的理论和中外传播史分别计入总体上新闻理论和新闻史，那么理论、历史和业务研究的比例是：444：408：428。

表 4.3 各分支研究领域的论文篇数及比例

研究 领域 期 刊 篇 数 比 例		新闻理 论	新闻 史	新闻 业务	新闻事业 经营管理	广播与 电视	传播学	其他	合计
新闻与传播研究	篇数	73	308	13	5	20	65	7	491
	所占比例（%）	14.87	62.73	2.65	1.02	4.07	13.24	1.42	100
新闻大学	篇数	176	70	170	26	64	46	54	606
	所占比例（%）	29.04	11.55	28.05	4.29	10.56	7.59	8.91	100
现代传播	篇数	45	3	22	41	333	77	21	542
	所占比例（%）	8.30	0.56	4.06	7.56	61.44	14.21	3.88	100
三刊合计	篇数	294	381	205	72	417	188	82	1639
	所占比例（%）	17.94	23.25	12.51	4.39	25.44	11.47	5.01	100

^①[美]罗杰 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8 页。

^②信度=2M/（N1+N2）。其中，M 是编码过程中两个编码员意见一致的数量，N1 和 N2 是两个编码员各自进行的编码决策的总量。参见 Holsti. O.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③[美]罗杰 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8-170 页。

4.2.1 新闻理论研究：超越狭隘的事业性论述

本书所指的新闻理论研究，包括新闻学科与新闻学研究方法（11.56%）、新闻本体研究（13.61%）、革命导师、党的领袖与著名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10.20%）、西方新闻理论（7.14%）、新闻法规、伦理和政策研究（11.22%）、舆论研究（包括舆论监督研究）（4.76%）、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研究（35.37%）、新闻心理研究（3.40%）和其他（2.72%）。

从构成上看，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是新闻理论研究中的重头戏。从变化上看，对革命导师、党的领袖和著名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从199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在30篇此类研究文章中，1979-1996年间有25篇，占83.33%。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胡锦涛的新闻思想都有研究，更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挖掘新材料或对已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解读。舆论研究集中于1986-2000年间，期间的文章数占总数的90%以上。对新闻学科与新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在1984-1989和1993年以后两个阶段较多，两个阶段发表的文章数分别占该类文章总数的29.41%和64.71%。

就本书所分析的对象来看，作为新闻理论研究重镇的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研究集中在“性质、属性、功能”研究三方面。这与黄旦关于20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新闻机构为研究对象”的判断是一致的。^①沈莉认为“新闻事业”本位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历程中的一个阶段（约1983-1994），该体系以“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为基本理论框架。^②历时性上看，该思路的研究一直到今天仍热情不减。

事业，一是指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性活动；二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区别于企业的组织机构^③。前者是一种社会分工的概念，后者是指其性质。我国新闻传播语境下的新闻事业，有新闻活动的意含，但更特指区别于企业的一种组织、机构及其体制、功能和机制。1942年新闻改革之后，“新闻事业”还特指“党的新闻事业”。“组织”架构下的新闻事业与“社会分工”视野下的新闻事业在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为论

^①黄旦：《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现代传播》，1994（4）：50-53。

^②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5月。

^③《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1042页。

述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另外,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在野党到和平建设年代的执政党,具体情境的变化也会对同一性质的新闻事业在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有不同的要求,这也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当然,新闻是一种活动、现象,也是一种事业,三者是有关联的。当个别性的新闻活动越来越多,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的系统化就成为新闻事业。作为研究新闻的学问,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也相应地涵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和新闻事业。但它们仍有区别,尤其是作为一种研究面向时。新闻活动更微观具体,新闻事业则更宏观抽象;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凸显的是其客观的、自然的一面,新闻事业则强化了其主观的、人为的、阶级性的一面。研究前者需要实证,研究后者离不开思辨。

毫无疑问,我们对作为活动和现象的研究远远不够^①,这主要与我们对新闻事业的定位有关:我们历来把新闻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新闻组织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丰富多彩的新闻活动被视为一种“狭隘的事业性存在”。^②按照一般的逻辑判断,从事业的角度研究新闻学,自然首先应该探讨其性质、功能和任务,其次是如何办好这项事业,有没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律性的东西,党性、人民性、指导性、服务性、群众性等就必然成为“三位一体”(性质、功能、规律)式的研究结果。其实,这种事业观不仅仅体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在新闻史研究中,大多新闻史著作、教材命名为“事业史”就是极好的明证。好在已经开始向“新闻传播史”转向,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③等,哪怕只是名字上的,它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那么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不妨来看两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978年以来新闻界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会出现某些热点问题或现象,如周末版热、焦点访谈现象、新闻炒作现象、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等。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现象,是指某一家媒体的某一创新性举措引起诸多媒体的竞相效仿,一时成为新闻传播界的一道景观。这种新闻传播实践过程中、在一定背景和时段内出现的由“星星之火”到“燎

^①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检索1979-2005年间“篇名”为“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的文章,发现三者的比例是:564:44:35,由此可见一斑。

^②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页。

^③ 是199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的修订版。

原之势”引起了学界的集中关注，自然演化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胡黎明著《“焦点现象”研究》（2004）是此类研究的典型。1994 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评论性电视新闻栏目——《焦点访谈》，很快风行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纷纷效仿，几乎都创办了类似栏目，成为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焦点现象”研究》阐述了“焦点现象”的基本特征，考察了其成因，分析了传媒“包青天”情结及角色扮演的误区，探讨了传媒功能的实现和效果以及媒介权利与社会责任。该研究以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现象为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浓厚，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现象本身，而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宏观社会学视野来观照它，有助于我们对此类现象的深刻理解。总之，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特性、意义以及发展趋势是该类研究的基本模式，实践性、问题意识非常强。

“传送和接受新闻信息是新闻活动的核心。”^①据此，笔者认为，新闻活动研究可分为广义上的新闻传播活动研究和狭义上的某一人物的新闻活动研究。前者注重过程和效果，后者侧重历史和意义。从本书分析的结果看，学界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尤其是革命导师和著名人物的新闻活动。对新闻活动本身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保军著《新闻活动论》（2006）一书。它是作者“从新闻活动视角对新闻基础理论问题的一次‘新的描述’”。^②笔者认为，该书最具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从哲学上探讨新闻活动构成：主体、对象和中介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传播活动中的“5W”要素及构成。另外，从 1995 年黄旦著《新闻传播学》出版以来的近 10 本“新闻传播学”类著作，都可以视为从活动视角研究新闻的成果。

由此可见，狭隘的事业性研究视角无法对作为社会分工的新闻传播做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而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视野更开放，更注重事实（而不是概念）本身，更需要实证研究。这也许是今后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向之一。

4.2.2 新闻史研究：反思与创新

从国别上看，中国新闻史研究占绝大多数（占 88.98%），外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较少，二者都占 4.99%；在历时性上，1990 年以后，期刊上所载新闻史研究文章逐渐减少；在研究方法上，以对事实的考证、订误、辨析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然

^①杨保军：《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②杨保军：《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前言》，第 1 页。

后给出判断式的历史研究为主。文章数量的减少可能意味着新闻史研究已相当成熟，介入的门槛随之提高。

新闻史研究^①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中开展最早、成绩最突出的一块。不管是通史、断代史、个案史，还是地方史、专门史的研究，均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足以引以为豪的成果单。据方汉奇先生粗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间（1978-2006）累计出版了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文集和教材238部，累计发表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5911篇。^②其中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最突出、呼声最大是如何突出新闻史的主体意识，即突破将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③而迷失了自我的现有研究范式。实际上，这种反思和检讨自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就没有停止过。^④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努力纠正这种“不正常现象”，^⑤然而直到今天它仍是主导范式。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少学者尝试着解开这一谜题。1950年代初期翻译的苏共报刊史^⑥以及模仿苏共报刊史编写于1956年初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和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这一范式的代表，^⑦遂固化为一种模式，成为一种传统。此后，“我们的报刊史教材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模式编写的”。^⑧1981年，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出版。由于思想解放不够，“报刊史的特点还不够突出”。^⑨由于该著作的影响力，事实上强化了上述那种模式。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力争“突出新闻事业史的特点”，对于历史上的报刊，“不仅介绍它们报道了什么宣传了什么，也介绍它们怎样报道怎样宣传”；对于新闻史人物，着重介绍他们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活动；“不把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写成单纯的政治事件”^⑩。尽管有上述改进，但该著作在总体上仍沿袭了上述那种写作模式。同样，因为该著作的影响力，上述模式继续得到固

^①主要指中国新闻史，本书后面的讨论也主要限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围内。

^②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1）：39-40。

^③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④宁树藩：《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强化“本体意识”的历史回顾》，《新闻大学》，2007（4）：1-3。

^⑤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⑥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载于《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⑧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载于《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

^⑩方汉奇：《序言》，载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1页。

化、强化,甚至更加成熟。由此可见,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模式存在弊端,但突破起来何尝容易。

丁淦林认为,“从总体上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沿着大纲草稿所认定的道路前行的,只不过有了很大的修正和延伸”,但“在基调和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纲草稿的引导作用始终存在,这也是取得今天成就的主要原因”。^①这无疑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这种范式既造就了新时期新闻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羁绊。

其实,这正是库恩所发现的“范式—科学革命”规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体现。一定时间内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引起更多成员的模仿,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范式。“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②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个别不同于这种范式的研究被视为例外,而当越来越多的例外出现时,可能意味着旧范式的失效,科学革命就发生了。目前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普遍不满与尝试性探索,可能意味着新范式的出现。为此,不少研究者开出了“处方”,包括思想上的解放、视野上的开拓、方法上的改进和新学科的介绍。

宁树藩认为新闻史研究者不仅要有新闻学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有其他学科的知识,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对相邻学科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及时了解并加以吸收。同时,在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时,“要善于将其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的内容融合起来,真正变成新闻学自己的东西,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两张皮”。^③

杨朋提倡研究大众传播史。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④

^①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②[美]T.S.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④杨朋:《创立大众传播史——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课题》,《现代传播》,2001(1):46-51。

孟庆鸿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引进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撰写新闻史时，不妨立足高远，站在世界新闻史的高度俯瞰中国新闻业的源流与发展；跳出单一的政治思维模式，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研究新闻史。^①

尹韵公认为揭示新的传播活动或传播技术是怎样推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应当是我们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从传播史的角度来发现和揭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源泉，是历史赋予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应当为社会作出的学术贡献。^②

张昆提出横向发展的研究维度。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闻系统中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新闻系统跨地域的互动关系。树立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观，有利于研究者确立完整的、立体的新闻历史观，有利于揭示世界新闻历史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确立国家、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坐标。^③

丁淦林认为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要更完整、全面，不仅要研究进步的传媒，还要研究反动的、保守的、中间的、甚至是政治上不明朗的传媒，这才是完整的中国新闻史。“即使是研究党报史，也不能没有全国观念、全局观念。”不仅应研究它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更应全面研究我国新闻传播业及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应把中国新闻事业史扩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在理论观念、内容选择、结构安排等各方面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出现新的格局、新的面貌。^④他认为过去对定量分析重视不够，也缺少比较研究。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⑤

方汉奇认为要在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其次，要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完成从单一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要多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⑥

吴廷俊将媒介生态作为一个视角引入新闻史研究，提出一种名之为“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范式”：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动态平

^①孟庆鸿：《也谈中国当代新闻史中的晚报著述及缺憾》，《新闻记者》，2002(1)：54-57。

^②尹韵公：《用进步精神和发展眼光看待新闻传播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5-8。

^③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73-79。

^④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⑤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33-140。

^⑥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衡的发展史。这种新范式，“既非超越、亦非取代前面说的这两种传统范式^①，它只是为了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闻史言说方式，在和谐的语境中，多元的言说方式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可能地把握到历史的本真”。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新闻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政治报刊、政治报人一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主角，恰恰是中国新闻事业适应特殊生存环境生态适应的结果。这提醒我们，创新研究方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问题”本身，并不是为了方法自身。

李彬认为新闻史研究应采用“社会史范式”和“叙事学方法”。前者体现为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②

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新闻史学界已经开始从个体呼吁发展到集体焦虑再到个别尝试的阶段，如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2001）、李彬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2005）等。前者在体例上突破了以政治运动分期排列事实的传统体例，在视角上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视角，且具有世界眼光，突出人的观念和新闻内部结构和自身发展规律在新闻观念演进中的地位。后者尝试着把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应用到新闻传播史研究中。

另外，近现代史、文化学界的一些研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思路倒给我们不少启发，如阎小波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研究》（1993）、左成慈著《台湾报禁解除后余纪忠先生办报思想与实践研究》（2001）、王林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2004）、洪九来著《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2006）、王儒年著《欲望的相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2007）、方平著《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2007）等。这些研究几乎都可以划入李彬（2005）所谓的“现代化范式”。丁淦林在“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上提出反对新闻传播研究中“交叉过去”的研究。^③黄旦认为这种研究是从各自的学科和立场出发，要解决自己本学科的问题，报刊只是被选择的一种路径和对象，与其他档案资料没有任何区别。^④本书认为这些研究有启发意义，并非提倡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去从事这种研究，也研究不好，但在拓宽学术视野上仍不失借鉴意义。如这几年学界热炒公共领域的概念，用这一概念或理

^① 两种传统范式是指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和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所形成的、影响至今的“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前者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后者以“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参见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3）：5-12。

^②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1）：39-42。

^③ 张振亭：《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需要改革》[EB/OL]，人民网，2005-07-13。

^④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1）：51-55。

论去反观和解释报刊史的却没有，倒是《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一书令我们耳目一新。《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研究》把我们再熟悉不过的“5W”传播模式应用到报刊史研究中，对“时务报之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①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其深度和广度已超过了我们新闻史学者对该报的相关研究”。^②

4.2.3 新闻业务研究：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

横向上看，关于新闻业务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新闻报道（27.32%）、新闻编辑（17.07%）、对新闻产品的分析解读（14.63%）和新闻采访（14.15%）研究。纵向上看，对新闻产品的分析解读、新闻报道研究没有大的变化，对新闻采访、写作、评论、摄影的研究从1991年以来急剧减少。

新闻报道是“新闻机构对新近发生、发现及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的统称”，^③它既可以指所报道的新闻内容属于哪个领域（如军事报道、科技报道等），又可以指新闻产品的形式（如解释性报道、深度报道等），还可以指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工作，包容性强，涉及面广。另外，影响甚广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④这一新闻定义也是导致“新闻报道”多义性的重要原因。如此，关于新闻报道的研究在新闻业务研究中占据那么大的比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从一开始的“赏析式”研究，逐渐过渡到探究“新闻背后的意义”式研究，从“技巧性、操作性”研究开始转向解读、批判式研究。与此相应，研究方法也开始从文学作品分析式的修辞研究方法，转向内容分析法、符号学方法和文化学方法。这反映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旨趣的变化。从学术专业化和学科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讲，这种转向标志着新闻传播学理论性的增强。1991年以后有关新闻采访、写作、评论、摄影研究的逐年减少也印证了上述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新闻传播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分析的论文大多出自高校新闻院系教师和研究人员之手，规模庞大的新闻从业者关于新闻业务的研究大多仍是“开处方”式的技巧性、操作性研究。

那么业务研究有没有可能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我们似乎不需要思考就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并举出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例证。于是，问题的关键就

^①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1）：51-55。

^②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③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④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于《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落在如何提升新闻业务研究水平上了，对此，一些学者有过论述和建议。其中，李斯颐和刘海贵的观点值得注意。

李斯颐在《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关系刍议》^①一文中结合通行于各国的《研究R&D推荐规范》和我国1990年由原国家科委据此公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科研活动分类案例集》区分了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的关系。“R&D”^②将人文社科类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基础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纯学术”研究，一般不考虑现实的、直接的具体应用目标；二是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延伸，仍属于理论范畴；三是试验发展，也称“开发”，即“利用从研究或实际经验获得的知识”，对具体对象进行“实质性的改进”。新闻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实验开发的关系如下：

表 4.4 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的区别

理论研究			业务研究		
研究分类	案例举例	可否应用	研究分类	案例举例	可否应用
(一) 基础研究	新闻学 新闻史	否	(二) 应用研究	新闻事业与现代化、新闻法研究(沿革、结构、立法比较等)	可
			(三) 实验开发	采访、受传者调查等	可

在此基础上，李认为新闻传播学界常说的理论研究相当于“R&D”中的第一类，业务研究应相当于第二、三类。但我们往往“把第二类应用研究与第一类基础研究归并在一起，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却使业务研究这个概念只包含了第三类，无疑使之缩小了外延”^③。就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业务研究的水平，李斯颐认为理论研究是业务研究的基础，二者不是对立的，更不应该相互轻视；业务研究“应当更加及时充分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但目前相对薄弱的理论研究给业务研究的支持“有待提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水平上不去，也别指望有多高水平的业务研究；提高新闻理论的科学化程度是提高新闻业务研究水平的不二法门。

刘海贵认为当前新闻业务研究方向应当是，“反思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业务研究的体系划分、内容设置、研究方法，从大新闻业务观的角度出发，结合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新闻报道的主要过程，理论研究紧密联系新闻实际，建立新闻传播业务研究的构想与框架”，研究应当是“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静态与

^①李斯颐：《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关系刍议》，《新闻记者》，1998(10)：24-26。

^②“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简称，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所进行的系统性、创造性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③笔者非常同意李斯颐的上述划分方法，经过实证分析，也发现学界的确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缩小了业务研究的外延。但在确定类目时，仍“将错就错”地采用惯常的做法。业务研究主要指第三类“实验开发”，如对新闻采访、写作的研究等，主要是出于便于理解和交流的考虑。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如此，在本书统计的结果中，业务研究仍与理论研究旗鼓相当（比例为：428：444）。如果考虑整个研究的状况，则业务研究远远多于理论研究。

动态相结合”。其中加强新闻业务的“综合性研究”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种转向，一是改变新闻业务的划分体系，“宜粗不宜细”，二是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①

“大新闻业务观”可以看成是这种“综合性”研究的体现。这种业务观由复旦大学叶春华教授首倡。其“大新闻业务观”主要含义是：“在新闻业务教学与科研领域内，从单科型研究(以编辑为主，次及写作等)，逐渐向复合型研究(采写编评并举，综合研究)方向发展；1988年后，又向提高型研究(以‘新闻分析学’为主)方向发展”。^②

把这种转向看作是实现提高新闻业务研究水平的还有陈作平等。他认为完全按照实践的操作环节来划分新闻业务，虽然每个环节都十分具体、实在，但决定了“研究内容的技巧性、操作性强而抽象程度不足”。^③而“综合性研究”可以“增强新闻工作者系统的新闻观念，进而提高他们对新闻报道的驾驭能力”。陈认为综合研究也是广泛借鉴哲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但他提醒我们不能去机械地套用，要“保持新闻学科的独立性”。^④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另外，从陈著《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2000)的体系和内容来看，有用综合性更强的“新闻报道”这一概念取代原来采访、写作、编辑等分散的、与具体操作环节相对应的概念的趋势。

这些来自学界关于新闻业务研究的认识是与新时期以来新闻业务的改革同步的。媒介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大众传媒突破原来记者、编辑隔离的组织方式，打通各个部门，建立“大编辑部”运作方式，对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和优化整合。一些电视栏目还实行主持人负责制，直至频道制。这些做法模糊了原来采访、编辑条块分割的界限，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相应需求。

陈作平等所努力建构的新闻报道认识论的着眼点在认识论层面，“主要关注记者认识新闻事物的一般规律”，但落脚点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想把握记者认识新闻事物的方法”，^⑤这与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的思路是一致的。看来，要提高新闻业务水平研究，必须摆脱“经验+事例”的做法，从新闻活动的视角切入，对其中蕴涵的事实、矛盾和规律进行哲学上的观照。

^①刘建伟：《新闻业务研究的方向及方法》亟待校正，载于满运来主编：《传媒会论文集》，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414页。

^②张骏德：《叶春华教授和他的“大新闻业务观”》，《新闻记者》，1995(6)：12-13。

^③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④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⑤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4.2.4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突破对策性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经营与管理与媒介产业、媒介经济两方面，分别占 56.94% 和 29.17%。另外，对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论文 1988 年才开始出现，媒介经济、产业的研究文章则出现于 1997 年。这是新闻传播学术与实践发展互动的结果。1988 年，“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设有“报业经营管理”子课题。^①1990 年 12 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报社“可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活动”，掀起了报社办实体的高潮。尽管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但由于其直接关乎自身经济利益，经营管理成了大众传媒不得不认真考虑和慎重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新闻经营管理研究有了现实的需求。1996 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媒介产业、经济概念从理论变为现实，直接刺激了此类研究的繁荣。

除了一般原理研究（主要是媒介经营、管理、产业、经济教材）外，目前关于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上著名报刊、报人的经营管理观，如对新记《大公报》、《申报》、邹韬奋、戈公振经营管理经验、思想的研究，以及胡太春著《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9），吴信训、金冠军著《中国传媒经济研究（1949-2004）》（2004）等。这类研究注重历史考证和经验总结，以期“以史为鉴”；二是对目前媒介经营管理现状和对策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媒介管理人员或有经验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注重问题的分析以及国外经验和模式的借鉴，如曹鹏著《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1999）、陆地著《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1999）、唐绪军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2002）等。

与新闻业务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相关的一个“古老”话题是：研究者的从业经验与其研究的实用性。早期的新闻业务研究多是“对策性”研究，如采访提问的技巧、版面的优化、主持人的手势等等。如果研究者本人缺乏足够的经验，此类研究的目的（指导具体实践）很难达到，研究价值不大。但长期以来，不少并无从业经验的学者乐此不疲，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学术资源，还给持“新闻无学论”者以把柄，不利于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相较于业务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想象毫无管理经验的人能写出能具体指导媒介管理人员如何如何的对策性文章。针对近年来媒介经济研究热，“好像新闻理论要研究的就只剩下了经营管理、

^①屠忠俊：《报业经营管理》，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前言。

媒介产业”的现象，黄旦认为“这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并不利，可以说是一种‘陷阱’”，“对策性研究太多，理论性研究却不足”。^①

不提倡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对策性”研究，并不是反对学者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关注。生动的新闻传播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来源，我们需要的是从实践中寻找问题，然后给予理论观照的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包含“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部分知识类型。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历来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大多带有非常强的实用意味，甚至“有用没有用”成了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重要标准，几近演化为一种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从根本上制约了学统的形成与完善，从而始新闻学始终局促于浅科学或前科学的层面上”。^②这种把研究的意义与实践操作直接对等起来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有所式微，但又出现了一种盲目套用概念和理论、毫无问题意识的研究，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这关乎研究方法的问题，本书将在下一章申论之。

4.2.5 广播与电视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的切入点

从构成上看，广播与电视研究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理论和广播电视事业研究，分别占 53.48%、19.66% 和 17.99%；研究广播电视制度的文章最少，只有 4 篇，仅占 2.64%。从变化上看，广播电视史研究在 1993 年之后近乎绝迹，在全部 22 篇文章中，1993 年之前的文章数为 18 篇，占 81.82%；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一直在此类研究中占据绝对主力；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事业研究在历时上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把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与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数加起来，业务类研究文章占总研究的比例将达到 26.11%，足见业务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分量。广播电视业务研究除了与报纸相同的采、写、编、评研究外，还包括主持、播音、摄制、创作等。此外，对节目、栏目的解读、评析也占有相当比例。在研究主体上，采写编评等的研究大多为媒体从业人员或有相关经验的教师、科研人员，解读、评析类的研究大多为无相关经验者，但他们更偏向于从文化学视角展开研究，

^①黄旦：《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载于王永亮等编：《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5-254 页。

^②李彬：《学统与学院派》，《现代传播》，1995(1)：3-10。

而这正是本书要认真探讨的。

文化研究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三大研究路径之一，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中源远流长。其中，代表性人物R.威廉姆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了文化研究的标志。^①“大众文化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的。”^②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自然成了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现代大众传媒无论就其介质形态，还是就其相当一部分的传播内容而言，都是大众文化的重要体现”。^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以上海为中心的、局部的、短暂的大众文化繁荣，^④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报刊（尤其是“小报”）的繁荣。但大众文化真正成气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晚报、都市报、通俗杂志、电视、网络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是与大众文化相伴相生的。由于纸质媒体、电影、网络等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能把大众文化普及和推广至全国的，只有电视。从最不发达的偏远山区到最发达的沿海都市，从豪华别墅、公寓到简陋民宅、工棚，都可以通过方寸荧屏感受大众文化的脉动。因此，要探讨中国大众文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电视无疑是最好的接入点。

1991-1997年间，朱光烈在任《现代传播》副主编期间，设置“广播电视文化”、“传播文化”栏目，刊物甚至定位于“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刊物”，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文化命题，^⑤直接推动了新闻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从此媒介文化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景观。从研究主体来看，新闻传播学界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平分秋色。前者如郭镇之、胡正荣、秦志希、陆晔、时统宇、陈卫星、张咏华、陈力丹等，后者如王岳川、汤一介、陈刚等。海外学者潘忠党、孙振斌也参与了探讨。从研究内容来看，一是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和讨论，二是对一些影响较大的电视节目如《北京人在纽约》、《爱你没商量》、《编辑部的故事》、音乐电视、《大长今》等的文化解读和批判。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大众文化摆脱了单纯的引进和模仿期，本土大众文化开始成长。几乎与此同时，包括电视在内的“传媒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领域的文化冲突、文化较量和文化争夺越来越激烈”，再加上西方“文化研究和

^①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②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

^③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④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⑤胡智锋：《〈现代传播〉20年的道路》，《现代传播》，1999(5)：9-12。

媒介研究的思想和学术立场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①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开始出现。

实际上，把新闻传播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在 1991 年之前就已有之。1988 年刘智就提出新闻文化的概念，1989 年出版《新闻文化论》，此后还出版了《新闻文化与符号》（1999）、《新闻文化学》（2001）。1990 年钟梦白在《新闻研究资料》上发表了《论媒介文化》一文。此外，还有方延明著《新闻文化导论》（1993）、《新闻文化外延论》（1997）等。可见，新闻传播与文化研究已初步完成学科建构。19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都市报、生活消费时尚类杂志的盛行和电视频道的增多、网络娱乐的悄然兴起，我国大众传媒越来越呈现出“文化工业”的形态，“媒介—文化—社会”框架下的研究会持续走热，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学者提出了研究视野和知识结构的挑战。

当然，在诸多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最夺目的还是一系列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黄旦主编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等都或多或少包括媒介文化研究类著作。

简单梳理此类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1）大多研究成果乃译自西方（主要是欧洲）；（2）新闻传播学界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哲学、文化学界。这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媒介文化研究有无本土化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文化研究有无类似新闻史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2000 年第 6 期《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织了《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的专题讨论，《摘要》里写道：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在处理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实践的关系时，依然存在机械照搬西方理论以宰割中国经验事实的倾向；没有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现实语境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准确把握本土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应于本土的研究范式时，存在着严重缺陷。^②

其中，参与讨论笔谈的尹鸿认为大陆的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具有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成果极其罕见”。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于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合法性、正当性往往受到质

^①尹鸿：《媒介文化研究：意义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6)：152-154。

^②《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第 141 页。

疑”。^①

在研究思路，陶东风提醒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在跨语境移用时必须进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避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错位”，“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②这同样值得新闻传播学者深思^③。

对于第二个问题还可以接着问下去。如果存在的话，新闻传播学者会不会陷入双重依附化的尴尬境地？当然，这样的担心和疑问本身可能有学科狭隘性嫌疑。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讨论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是不是就成了一个伪问题？由此可见，答案还是非常肯定的，只是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没有像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刻意追求本学科的主体性意识那么自觉、积极、主动和强烈。这主要是因为这类研究目前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才刚刚开始。但就发展趋势来看，媒介文化研究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毕竟我们坐拥“地利”。也正因为如此，若能在此时养成主体意识，势必为高品质的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一个良好根基。

4.2.6 传播学研究：关注本土情境

在本章所分析的论文中，传播理论、网络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与研究方法处于前三位，分别占 36.17%、25.53% 和 15.96%。从传播层次上看，上述研究几乎都属于大众传播层次的研究，人际传播（1.06%）、组织传播（1.60%）研究非常少。从历时上看，1982-1989 年传播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少（此期的文章数是总数的 9.43%），且呈零星分散状态。1989 和 1990 年两年中，传播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 1991 年开始，传播学研究开始多起来，且保持连续化，尤其是 1997 年之后，随着网络传播成为研究热点，传播学研究被推向 1978 年以来的最高潮——1997-2005 年 10 年间的论文篇数占总篇数的 60.11%。学术外因素的影响是传播学在我国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1983 和 1989 年传播学都因其被视为“否定阶级性”而使研究被迫中断。1997 年，

^①尹鸿：《媒介文化研究：意义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6）：152-154。

^②陶东风：《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6）：144-147。

^③行文至此，想起李良荣对新闻传播学界把中国大众传媒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理论“拼凑到一起”进行研究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个“空问题”。参见《李良荣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关于新闻学的科学研究》[EB/OL]，载于 http://bbs.mediachina.net/index_bbs_show.php?b_id=4&s_id=275853&page=1。是否如此尚可讨论，但他的这种批评促使我们在引用和借鉴“外来”概念、理论论述“本土”问题时必须弄清其语境，谨慎有加。

传播学被擢升为二级学科,才获得制度上的合法性,此后跃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的基本活动,其外延较大,传播研究的视域自然也是广阔的。但从我国传播研究的构成上看,对西方大众传播理论(尤以美国经验研究为主)的引介仍是主流,尤其是在早期。这与我们引进传播学改造新闻学的目的有关,但也导致了我们所引进的和研究的传播学几乎都囿于大众传播,尤其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框架和范围内,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传播哲学、传播与科技、普及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女性研究、媒介素养等分支研究领域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表现在实践上,传播学研究一直与中国现实脱节,缺乏本土关怀。

与此相关、一个一直存在争论的话题是传播学的本土化(有的称为中国化)问题^①。本土化思潮既与全球化浪潮下本土文化回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大背景有关,也与传播学引入时的曲折历程以及个别学者(如余也鲁、徐佳士)的积极推动有关,^②还与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西方强势霸权情境下的自我焦虑有关。^③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传”的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如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④等。其中以《华夏传播论》为典型代表。如果把近代新闻事业(以现代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之前的新闻史称为传播史的话,那么此类研究就更多,如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李敬一著《中国传播史论》(2003)等。这类研究通过寻找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和思想中与传播相关的史料,试图总结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结论,如黄星民提出的“风草论”,孙旭培提出的“信息圈与决策圈”、“逆向传播”等,并且尝试着与源自西方的传播学知识、理论勾连起来,如研究框架多为“5W”模式,把“风草

^①论争的具体情况请参见《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第三章第二节《学术界对本土化研究的争论》(虞继光,2005:116-125)。

^②黄旦:《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源于笔者2006年7月10日在复旦的听课笔记。

^③传播学的本土化只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在传播学界的具体体现。包括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对各自本土化的问题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可分别参见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2004)、“正来学堂”网站(<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dex.asp>)“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2001)、郑杭生、王万俊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000)以及邓正来著《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2004b)。

^④包括黄鸣奋著《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谏谏传播》、李国正著《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和郑学檬编著《传在史中——中国传播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论”与“魔弹论”作比较等，^①但两个语境下的“传播”在本质上可能就不是一回事了。^②

二是用量化方法对经典传播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验证和发展。该类研究以张国良及其博士生的研究为主，如李本乾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2002）、丁未著《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2003）、龙耘著《中国大众传媒涵化功能研究》（2003）、王玲宁著《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王昊著《意义的解码——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2005）等。尽管这类研究被认为是在“从事学术加工”，^③最终更加失去本土化，但由于其关注的是本土情境，不少研究结果还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补充意见，^④也不失为一种本土化的努力。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之争与“在地化”^⑤转向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传播研究中曾经的经历。1969-1989年间，台湾传播学者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发展研究的假设，并在本土进行测试，用量化方法和美国经验学派理论展开了集体性的大众传播的功能与效果研究，^⑥这与上述大陆第二类本土化研究类似。1996年之后，部分成员对此开始反思，主张：在本体论上，“应转向以在地的现象为主体，并思考其脉络”；在认识论上，“应转向以在地的研究者为主体，反思自身与在地社会的关系”；^⑦在目的论上，“应协助在地社会的沟通与解放”。^⑧在上述预设的基础上，台湾传播研究实现了“向在地文化转”。当然，并非所有研究都实现了这种“转向”，但它打破了“功能—效果”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多元研究范式共存生态的出现。台湾传播研究关注本土情境的学术转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引进传播学提升新闻学理论的初衷已经初步实现^⑨的前提下，关注中国本土和当下情境，回归传播的本来面目乃是我国传播研究的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和互动途径，传播及其方式、功能的变迁都隐藏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人的交往——“个人如何藉由信息传播形成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传播研究

^①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12-15。

^②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总第71期（2002年4月）：1-16。

^③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08页；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

^④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载于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6页。

^⑤“在地化”为台湾用语，与本土化意思一致。为了尊重原著起见，本书在引用时采用原著中的用法。不过，我认为，早期倡导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对应的是整个华人社群；一旦转向本土化或在地化，大陆、香港、台湾三个不同的在地情境（如传媒制度），必然有不同的语境。基于此，我认为大陆新闻传播学者也应该注意不被港台学者牵着鼻子走。

^⑥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42页。

^⑦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⑧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49页。

^⑨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载于张国良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的新的生长点，并以此作为传播学者观照中国社会转型的切入点。如果用传播学视角来关注它，不仅能突破现有传播研究的藩篱，还可以把传播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对接起来，彰显传播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况且，中国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新闻改革，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身处此中的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新闻传播学者更有理由对活生生的“新闻传播实践”做出合理的阐释；同时，如果能掌握通用的方法，遵循普遍规范^①，也可以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4.2.7 其他研究

在本章所分析的对象中，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广告研究和公共关系研究都较少。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探讨新闻传播事业的也是最多的，占 41.67%。由于教育界与业务界关系紧密，所以后者的些许变化都会引发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如何应对的探讨。因此，围绕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有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何适应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需求。这就导致，对策性研究——如培养目标如何调整、课程如何设置、实践实验环节怎么处理、成功经验的介绍等——是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主流。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以李建新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陈昌凤著《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2006）为代表。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还非常注重国外（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经验、模式的引介。教育是学术再生产的基本途径，它直接影响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学术操守，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

以上我们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新时期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特点，包括横向上的构成和纵向上的变化，着重论述了我国新闻传播各领域的研究指向。

新闻事业概念的不断缩小导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囿于“事业、机构和组织”的狭小视野，而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新闻传播论述不够。

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起步最早、成就最突出的一块。也正是

^①李金铨认为只有“入乎霸权”，才能“出乎霸权”，但是“接受学科纪律和标准的检验，这些都是不待赘言的”；祝建华主张“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本土化理论”。分别参见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第 77 期（2003 年 10 月）：1-21；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 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

因为学术自身积累的充分性，迫使研究者不断反思。如何体现新闻史的主体性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新闻业务研究一直占据较大份额，但多为经验总结，无法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这是学界积极寻求突破的重点。

同新闻业务研究一样，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也多是对策性研究。但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具备相关经验，导致此类研究要么空发议论，要么生搬硬套。从新闻传播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给予理论观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广播电视研究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最佳切入点。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一，西方理论能否观照本土情境；二，如何做出体现新闻传播学科主体意识的研究。

我国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引介阶段，且囿于大众传播层次。本土化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其途径有二：一是用本土情境检验现有传播理论，二是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但上述两种努力都缺乏对本土情境的关怀。

综观这些热点问题的出现与不断切换，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力量：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业界的发展变化总是能迅速引起学界“围攻式”关注，而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总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二是新闻传播学术的不断积累。由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低，积累有限，所以各个领域的研究虽都有涉及，但总令人觉得不够深入；三是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意识的张扬，反对盲目借用，甚至套用西方理论，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理论和概念出发的研究方式。

5 研究方法论

研究方法在认识问题、科学研究、知识发现和学科建构中的重要地位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随意性较大,不讲究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所以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一次细致梳理和充分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显得相当重要和迫切。“对于研究方法不甚讲究,也是新闻学滞后的一个原因。”^①这既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状态的一种表现,又是新闻传播学长期受外围因素干扰较大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正常的学术研究制度得以重建,而且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新闻传播研究也是如此。一旦有此转向,研究方法问题必然被提上日程。对于理论体系孱弱、正积极推进学科建设的新闻传播学更是如此。为了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有个清晰的认识,有必要先对目前尚存在模糊认识的方法论、方法、定量、定性等基本概念作个必要的澄清,然后梳理新时期以来新闻传播学者关于领域内研究方法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就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呈现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5.1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含义亟待澄清

当本书试图梳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应用的历史时,却发现不少研究对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等概念本身尚存在混乱或模糊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先作一简单交代。

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回答“研究什么”(what research),认识论回答“如何研究”(how research),目的论回答“为什么研究”(why research)。②研究方法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是一门古老而深奥的学问,而且新的研究方法一直在不断提出中,对其条分缕析显然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也没有必要。因此,本书只能以新闻传播领域比较权威的研究为基本依据,对方法论、研究方法等概念作一个明确阐述,以利于接下来的讨论。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对传播研究方法作过系统阐述,且以规范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本书在论述研究方法

^①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

时以她提出的观点为主要依据。

为了阐述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必须做一些铺垫论述：一是知识来源的途径与研究方法，二是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区别联系，三是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

首先要明确的是知识的来源（也可看作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途径）。人类知识的来源有多种，科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克林格（Fred N. Kerlinger）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方法有四种：传统（tenacity）、直觉(intuition)、权威(authority)以及科学(science)。^①传统法的逻辑是“某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一直如此”；直觉法则坚持“显然如此”、“不证自明”的原则；权威法则认为某件事情可信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可信的来源；科学方法则“把认知看作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过程”。^②社会学者风笑天认为人类知识来源的途径还有“常识”（common sense）和“经验”（experience）。“常识”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累积的经验、所形成的认识的一种聚合体，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对事物和现象之间那些“不证自明的、直接的、简单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经验”主要指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具有直接、具体等特点，它是“常识”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知识的来源之一。^③

之所以要首先说明获得知识的方法，既因为它们是研究方法的前概念，又因为这些方法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还有一定程度的应用，甚至有的还是主要方法之一，如权威法。不少研究将某种说法——这种说法往往出自革命导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等——作为立论的根据，甚至唯一根据，而不是作为论证的材料之一。本书下面要讨论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在“科学方法”这一范畴内来进行的。其他方法，尽管在一定情境下仍有用武之地，但毕竟不是今天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讲，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研究方法从非科学到科学的历史。

其次要明确的是方法论(methodology)与具体方法(method)之间的关系。当然，一般来讲，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把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或者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可以用研究方式(approach)^④来表达”。^⑤这里我们先暂时撇开具体问题，只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方法论与具体方法的关系。沙莲香认为，“方法论与方法不同，它是科学研究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和学说，属于哲学范

^①[美]罗杰 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②[美]罗杰 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0 页。

^③风笑天主编：《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页。

^④本书把 research approach 翻译为研究途径。

^⑤李喜根：《“美国式的研究”才是高质量的研究？——浅谈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方式》，《国际新闻界》，2006(7)：45-49。

畴，而方法则是指研究的技术及搜集资料的工具”。^① 卜卫在《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三种意义上的方法论：

[1]方法论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具有某种逻辑结构并经过一定实验检验的概念系统，从中已产生一系列既定结论，如应用于传播学研究的信
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2]方法论作为成份构成体系，即方法论由哪些基本问题组成。一般来说，其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怎样设计一个回答问题的研究计划？用什么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怎样从资料中提出对问题的解释？怎样阐明自己的发现并把它表述给其它研究者和大众社会等；[3]方法论作为方法类型体系。这个体系将说明各种方法如思辨方法、实证方法等的特征、作用及对理论研究的可能贡献。^②

从第三种意义上来讨论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方法范式和人文主义方法范式^③。实证主义方法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收集、加工和整理事实，而收集事实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取向。人文主义方法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抽象概念获得理论性结论的方法。与实证方法相比，它没有收集事实的问题，因此也没有用什么方法来收集的问题。人文主义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当人文社会科学家对概念进行操作时，其主要方法是直觉、想象、抽象和理想化、比较、归纳和演绎等。^④这两大方法范式区别如下：

表 5.1 人文、实证方法范式的区别

方法典范	定义	分类	研究传统	研究方法
人文的	操作概念	---	哲学思辨	直觉、想象、抽象和理想化、比较、归纳和演绎等
实证的 (社会科学的)	操作事实	定性	文化人类	观察和个案研究；文化批判
			政治学	文献分析
			文学	文学批评（文本解读）
		定量	社会学	社会调查
			心理学	控制实验

除了一般思辨法外，马克思主义方法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最重要的思辨方法。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尽

^①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1 页。

^②卜卫：《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8-15 转 7。

^③学界对传播学方法范式说法不一。台湾学者刘骏州（1994）有实证、诠释、批判三大范式的提法。卜卫（1996a）认为，批判范式“更像一种类似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像用于某种研究的工具”，但在某项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它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以，仍属实证范畴。而诠释范式强调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直接操作的对象也是事实（文本），而非概念，因此，它亦为实证方法范式。本书以卜卫的说法为准。

^④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引言》，《国际新闻界》，1996(4)：32-38。

管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①5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统治性地位,以后被教条化、异化,直至80年代以后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方法不应该也无力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方法^③的基本内容包括:①唯物史观。强调了解、研究社会意识、文化现象时必须从社会存在开始;②阶级分析方法。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突出竞争或斗争的一面;③唯物辩证法则。包括矛盾分析(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普遍联系、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征有:①在研究起点上,注重研究对象的物质性、经济性、社会性因素的分析;②在分析方式上,强调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态度;③在研究目标上,注重必然性、规律性、本质性问题的把握;④在研究结论上,坚持立场、观点的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方法教条化的首要表现是机械地、刻板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其次是对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完全排斥。这种教条化带来的后果,首先是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肤浅简单化;其次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批判与学术斗争;最后是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空白。

以上我们谈论的都是相对规范的研究。但由于学术积累有限,新闻传播研究长期以来不甚规范,因此,还需要根据实际研究状况来分析。本书本打算采取与上一章同样的思路,从三大学术期刊抽取样本透视我国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但发现“没有明显的研究方法”和所谓“定性研究”^④占据了绝大多数。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新闻传播研究才开始强调研究方法,方法才开始科学化、规范化和多样化。

最后,本书通过对89篇博士论文的分析来大概勾画一下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并确定接下来要论述的问题。这些博士论文分别来自中国期刊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其中属于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分别有44篇和45篇,完成时间在2003—2006年间。一般来说,博士论文要求明确交代所用研究方法,甚至要用一整章,结合研究问题来讨论方法论、具体方法和研究

^①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②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③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但本书是在“方法类型体系”意义上来使用方法论概念的,在此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方法仍是有很大区别的”(李承贵,2001:8-9)。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内容、特征、教条化的表现及后果,本书均引自李承贵先生在《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一书中的论述,详见该书第120-129页、第376-383页。

^④这里的“定性研究”有特指,但为了避免注释过长和叙述上的连贯性,本书将其具体含义放在本章第六部分即“实证主义方法论及具体方法”部分来揭示。但要说明的是,它与下文不加引号的定性研究含义不同。

方案。著作,尤其是专著,一般也在前面说明研究方法,但不如博士论文论述的那样详细。另外,著作并不遵循同行评价的原则,而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对其评价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分析博士论文以透视目前学界研究方法现状是有说服力的。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在分析方法上采取以作者在文中关于所用研究的论述为准,没有明确说明的则不计入在内,但这并不能判定其没有或没用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研究方法外延非常宽泛(这从 89 篇博士论文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来),也有可能是作者认为不需要说明,或者是本身是不言自明的。

整体上看,论文中关于研究方法的阐述所占篇幅较小,一般都是在“导言”、“绪论”、“前言”中用一段文字来说明。有 17 篇论文(占 19.10%)没有明确阐明所用研究方法。文中阐明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思维方式。如“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的方法”、“从具象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概念分析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整体和局部结合的方法”、“会通方法”、“注意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等。

二是指一种完整的理论,即用某种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如“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理论”、“多学科(新闻学、传播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符号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交叉的方法”、“以叙事学为主的多学科(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方法”、“文化身份分析”等。

三是方法典范及具体方法。属于人文典范的有“运用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方法”、“逻辑归纳与演绎法”、“理想类型模式”、“演绎、实证和模型推理相结合的方法”、“思辨法”等;属于实证典范中定性方法的有“文献分析”、“文献分析、深度访谈”、“采取文献研究为主的定性研究,辅以观察法、访谈法”、“民族志、焦点访谈、话语分析”等;属于实证典范中定量方法的如“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等。更多的是定量定性研究相结合,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试图结合定性定量方法;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传播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和修辞学相关理论”、“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内容分析”、“综合采用了实地访谈、主题群组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人物采访等研究方法”等。在人文典范中,思辨法、比较方法、归纳法应用较多;在定性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历史文献法、案例法、访谈法;在定量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整体上看,如果把没有明确说明研究方法的包括在内,思辨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比较来看,

传播学论文关于研究方法的阐述更规范,更讲究研究方法的应用。

根据上述学界研究方法应用的现实状况,本书接下来围绕研究方法的梳理和论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二是研究规范问题;三是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四是人文、实证两大典范及其具体研究方法。

5.2 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834-1917):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

从1834年《新闻纸略论》发表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被称为前新闻学时期或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新闻学研究除了专门的论说文章外,多通过发刊词、报刊缘起、序文、启事等形式呈现出来,学术研究尚没有专门化,“更谈不上科学的专门化的新闻学研究方法”,^①“往往是随感式的,没有系统的考察,也没有严格的论证,只是感情色彩很重的价值判断”。^②这种以政论文呈现出来的新闻学研究文章,方法论上可归属到人文典范中,较多地使用直觉、想象(比喻就是一种想象,如“耳目喉舌论”),几乎等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这种传统直接导致了新闻学与文学长期的“不分家”,再加上新闻传播学者大多出自文学之门,致使这种思维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新闻学研究“仍未走出‘有感而发’的阶段”。^③

(2) 第二阶段(1918-1937):开始提出新闻学研究方法问题

学会的设立、新闻教育的发端以及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新闻学的确立。关于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也开始成为学者的必修课。李公凡在《基础新闻学》一书中用专节论述了新闻学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新闻学不能依靠单纯的兴趣,“须先求得正确的研究方法”,没有方法或方法不对,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或无正确的结果。^④他提出的方法包括历史法、观察法、比较法和实际的研究法(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四种。他之所以强调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其对新闻的定义直接相关:“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与其作用,及因新闻而发生的种种关系的现象的原则的科学”。^⑤不仅如此,他还辨析了新闻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这表明,新闻学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黄

^①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②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③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2): 44-47。

^④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22-23页。

^⑤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5页。

天鹏认为新闻学研究必须从科学方法着手,“同时也要并重实际的试验、分析的研究法”。^①黄还认为新闻学不应附属于文学类或社会学,而应独立,它虽然是社会科学,同时和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②这些研究方法得以提出主要受西学的影响。黄天鹏提出分析的研究,就源于他在日本听一位德国教授关于分析方法的介绍。^③不管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具体应用都比较稚嫩,但它超越了“文学作品创作法”,甚至出现了定量研究,^④体现出学科研究的程序化、科学化等特征,这在我国新闻学研究方法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930年代是我国新闻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新闻学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研究方法的提出与这一背景是相辅相成的。

(3) 第三阶段(1938-1948): 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主导研究方法

1938年以后我国新闻学进入“分化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左右下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话语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包括指导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引入新闻学研究始于1922年2月12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⑤成熟于1943年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之后,在整个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层面的方法论以及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具体方法影响新闻传播研究。这种两级化思维方式对新闻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

(4) 第四阶段(1949—1978):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异化

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导方法,甚至唯一方法。经过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种本身含义丰富、科学严谨的方法论被严重教条化,变成了一条条万能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教条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新闻学,拒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新闻学简化为一些口号、文件或工作指示;其二,采取黑白二分的方法,学术研究为意识形态所绑架,完全排斥国内外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成果;其三,不注重历史分析和材料的充分占有,而是妄下判断,曲解、误解,甚至加工、篡改材料以服务于观点,而这些所谓观点几乎都是马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②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4-5页。

^③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④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⑤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报纸是其政党的吹鼓手等。应该说，这些结论本身可能并没有错，但了无新意，对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把握未来并无太大意义。

如果说上述教条化还局限在认识论的范畴，那么学术研究内“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完全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迫使研究者可以不去顾忌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必须在两大对立的阶级立场中选择其一。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成了一个标签、一种整人的工具，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王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如“报纸的‘两重性’”、“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遭到批判。这些贯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新闻学理论都被贴上“反动”、“资产阶级新闻学”、“右派”的标签。吊诡的是，批判者同样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被异化的程度可见一斑。于是，报纸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关于新闻的论述也沦落为如何证明语录的正确性及意义。因此，新时期之初，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既要反对教条化的、异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又要重新挖掘历史上曾经提出的方法，还要积极借鉴、引进和吸收西方不断涌现的新的研究方法。

5.3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

5.3.1 1978-1982：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此阶段首要的问题是批判文革期间被严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哲学体系，但它不能代替其他具体学科，新闻学有其自己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方法论，但它并不能取代或拒绝其他研究方法。如孙振斌（1983）认为，新闻学研究表面上虽然强调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地位，但过去的某些结论和方法实质上是对它的“玩弄和背弃”，种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现象是造成新闻无学、新闻学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主要症结。因此，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不从研究方法上来一番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影响较大的是此阶段一些代表性著作、学者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论述。

新闻理论方面。甘惜分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绪论”中阐明了“怎样研究新闻学”：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将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和阐述新闻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问题，并且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新闻学理论进行批判。……

我们并不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代替新闻学，不能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新闻现象。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新闻事业有它的具体的规律性。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南，对新闻事业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探索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尽管我们还不能做得很好。^①

这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同时，反对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闻学，而是承认新闻事业有其具体的规律，必须具体分析，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取代新闻学；对资产阶级新闻学也“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②

王中在这一阶段对如何开展新闻学研究也曾有过论述，如《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等。王中认为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③

新闻史方面。方汉奇认为，要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首先要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新闻史研究中“左”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的面过于狭窄，对革命报刊、报刊在阶级斗争中的工具作用研究地比较充分，其他较少；二是为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禁区；三是按照政治形势评价历史人物，习惯于以一时的荣辱定毁誉，学术失去了其科学性。^④宁树藩从研究方法角度论述了如何揭示新闻史这门学科的特殊规则，即如何突出新闻史的主体意识。他的意见包括：要把“怎么宣传”的研究放到重要位置；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研究的范围应该广阔些；要把政治观点、办报思想和新闻实践统一起来研究；要注意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约。^⑤

新闻业务方面。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所做的努

^①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②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③王中：《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战线》，1980（1）：24-26。

^④方汉奇：《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新闻战线》，1981（11）：13-15。

^⑤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1（19），载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6页。

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运用于采访学的研究，分析采访活动中所包含的矛盾，并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他在肯定作为手段的新闻有阶级性的同时，又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有它特有的规律，“新闻规律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可以借鉴资产阶级记者的采访方法。^①

传播学方面。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简介）》在“前言”里写道：

...对于这门国外新兴学科，我们既不应视之为异物，拒之于门外，也不应盲目地照抄照搬；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一要了解，二要研究。只有在详尽占有资料、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剖析和研究之后，才能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②

显示出对待国外新兴学科的正确态度，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认真剖析和研究。如果联系到 1990 年代初对传播学的批判，无疑更能说明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总之，在新时期之初，新闻传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应用也实现了“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及其具体方法，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这种拨乱反正无疑为其以后的正确应用定下了基调。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担心政治风云的反复与不定，因此，思想上是有所顾虑的，对新事物、新观点和新方法的论述显得异常谨慎。与整个社会思潮一致，宣扬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不失为一种风险最小的改革途径。相应地，整个新闻界都在倡导恢复和继承我党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的优良作风。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无疑是推进和改革新闻学研究的一种稳妥而明智的选择。

必须指出，由于当时思想解放的有限性，此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和应用是初步的，恢复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研究者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还有不少思想束缚的痕迹”、^③是“两只半解放的脚”。^④但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考虑到文革期间新闻事业及新闻学研究的遭遇，这种有限的恢复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①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78-379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3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60 页。

^④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8 页。

5.3.2 1983-1995：新闻调查风起云涌，系统科学全面渗透，传播学作为方法论导入

1)受众调查风起云涌

新时期伊始，受众调查勃兴。尽管这些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新闻改革服务，但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量化研究方法仍然构成了1983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发展的亮点。

早在1981年，毛用雄等5人就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阅览室作过对审讯“四人帮”消息的传播渠道的实地调查。^①这次调查本身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其绘制的“消息扩散速率曲线表”与“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理论中创新过程呈“S”曲线的结论非常一致。不过，从发表的调查结果来看，并没有提到这一理论。

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受众调查”，^②还是1982年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开展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其目的是“了解读者、听众和观众的需要，为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改革提供依据”。^③调查严格按照随机原则，由计算机分层抽取样本。调查规模为2423人。测量工具为问卷，包括54个问题。后期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数据。这次调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且“推动了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实证研究”。^④

当然，引起关注的不仅仅是调查本身，更在于它透露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日本书教大学传播系岸田功教授评价道：“采用科学方法实施社会调查并将其公开发表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国正在恢复正常的客观主义路线”。^⑤1980年代初，在整个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外受关注。受众调查被认为是“新闻改革的好帮手”、^⑥“新闻改革的基础”。^⑦另外，新闻调查还是间接的民意调查。由于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是一个容易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忌讳的名词。为了减少干扰，当有人打电话至社科院新闻所问及此事时，

^①尹德刚等执笔：《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新闻大学》，1982(2)：125-127。

^②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③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工人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1页。

^④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当代传播》，2001(1)：12-14。

^⑤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研究资料》，1989(2)，总第46集：1-18。

^⑥安岗：《新闻改革的好帮手（1983年6月15日在北京新闻学会读者调查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于《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201-205页。

^⑦钟沛璋：《调查研究是新闻改革的基础》，载于《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206-209页。钟沛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时任所长的安岗回答说“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新闻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的调查”。^①1988年的两次调查：“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名之曰“民意调查”了。

来自高层的认可无疑是对受众调查在新闻改革中功能与作用的最好肯定。这也直接刺激了接下来的受众调查^②。这种以新闻改革、民意调查为主要取向的受众调查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停止。

1989-1994年被认为是受众调查的第二个阶段。浓厚的学术性是其重要特点。^③尤其是“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课题的实施，把新闻调查推向“发展传播学”的范畴，致力于探讨大众传播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人发展、乡村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新闻和社会改革不再是研究的焦点。从学术史意义上看，调查开始深入到受众的认知层面，并提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理论模型。这一阶段开展的大型受众调查有：1990年10月“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调查”，柯惠新等提出了“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的模型”；1991年4月浙江省受众抽样调查，发现了影响浙江受众现代观念的4项显著关联因素；1992年10月“北京地区受众抽样调查”，旨在检测北京受众社会意识现代化程度现状以及与媒介接触的关系。^④

此后的受众调查进入市场化、规范化阶段。调查主体主要是专业化的调查机构，包括媒体自己成立的调查中心。调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媒介经营管理、如何取得更好的市场表现上。^⑤

总之，新闻调查法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直接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新闻改革，也是传播学方法在我国初步发展和应用的结果。

2) 系统科学方法全面渗入新闻传播研究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被称为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⑥之后又出现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一般把老三论、新三论都统称为系统科学）。这些理论被提出时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的方法论意义。如维纳（Wiener, N.）提出控制论的目的之一是“寻找新的途径、新的综合的概念和方法，用来研究机体和构成的巨大整体”；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 L.）创立系统论时曾明确指出：

^①钱辛波：《新闻民主的催化剂(代序)》，载于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②据《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0年代共进行大规模调查19次（不包括1982年“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

^③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④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下)》，《当代传播》，2001(3)：21-24。

^⑤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⑥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发现》，《哲学研究》，1982(6)：21-24。

系统论思想的提出最初就是反对在生物学的理论和研究中存在着的“当时流行的机械论方法”。^①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提出以及在工程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它再不仅仅是一种具体学科和方法,而成了“处于哲学与具体科学联系中间的”、^②对诸多学科都有影响、被广泛应用的横断科学和方法。确实如胡翼青所言:“怎么来评估早期系统科学对战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都不为过”。^③一旦扩大化到如此地步,所谓的系统科学方法也超越了原来主要用于工程学中的具体方法,变得丰富、多层次和多样化。魏宏森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基本概念。时间、序列、熵、信息、控制、反馈、系统、结构、要素、功能、等级秩序、同构、同态、分解、协调……等;(2)基本原则。整体性、综合性、最优化、分解——协调性、人——机交互性、稳定性、等级有序性、定量化……原则;(3)基本方法。功能模拟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系统方法、模型化方法、符号法、形式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等;(4)基本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哲学意义。^④

1980年初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其方法更是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非常显著,且一直持续到今天。^⑤新闻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毋宁说,作为学科的传播学之所以能出现,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受系统科学的影响。很多概念、模式和理论更是直接来源于系统科学。系统科学领域的不少书目,如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至今仍被新闻传播学者奉为必读书目之一。考虑到新时期之初传播学就已经引入到新闻学界以及产生的一系列效应,如新闻定义之争中的“信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之争、新闻学研究转向大众传播学的呼声等,系统科学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巨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系统科学方法论内容中的前三项,即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法都已广泛应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尤其是基本概念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如整体性原则、反馈方法、模型化方法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者

^①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②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③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④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⑤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于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要分析这部分的研究是徒劳的。本书要分析的是系统理论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专门研究。

1988年11月出版的《新闻学论集》(总第13辑)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是学界第一次集中探讨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其中,《编者的话》中谈到了编辑这期专辑的初衷:

突破旧的思维模式,丰富、发展新闻学理论,是当前新闻改革对新闻理论界提出的迫切要求。运用系统科学(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新闻现象,回答新闻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该专辑共收录了20篇相关研究,讨论的话题包括系统科学之于新闻学及传播学的关系、对提高信息量的启发、新闻采写编新模式和新思维、受众工作等。就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来看,徐培汀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也最全面。他认为“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对新闻学研究的意义有:(1)有助于改变新闻研究思维模式,变静止、单一、封闭、狭窄的思维方式为动态、立体、开放、广阔的思维方式;(2)有助于新闻改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行。系统方法告诉我们新闻改革是复杂的;功能模拟法有助于寻找新闻改革的有效途径;正负反馈原理有助于我们把握新闻改革的两种状态;(3)有助于开拓新闻研究的视野。变单向、客体、封闭研究向多向、主体、开放研究发展。^①

徐只是该专辑诸多作者中的一个代表。他们对系统科学之于新闻传播研究总体上是寄予很高期望的。这种期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认识思维方式的转变,包括对新闻现象、新闻业务、受众、新闻改革和新闻研究的认识;第二是具体研究方法(如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法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第三是对提高报纸信息量有启发和指导意义,这与当时新闻改革的主流是相一致的。不过,多数研究尚停留在简单化匹配的层次:从系统科学中找一个概念、原理或方法,然后对应地在新闻传播中找一个与其匹配起来,既无现成的研究成果作支撑,又缺乏严密的逻辑推导。

不过,这种局面很快被突破。1988年,刘卫东著《信息论与新闻》一书出版。它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新闻,被称为是“中国内地最早用信息

^①徐培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新闻学研究》,《新闻学论集》,第13辑(1988年11月):21-28。

论的基本理论研究新闻传播的专著之一”。^①该书的框架也是按照信息来源（信宿）、传递、度量来安排的。从学术史上看，这种深入探讨给新闻定义的“信息说”以强力支持，并且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着力点：如何提高新闻的信息量。这与当时新闻改革的实践是相呼应的。

1989 年王益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出版。该书“特别注意了以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思想作指导”，^②构建出一个“系统性较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框架，而“论新闻”、“论新闻事业”、“论新闻工作的规范”、“论新闻工作”是其四个子系统。江柳著《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1991）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不仅用到了“老三论”，还把“新三论”试图引入到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如“从自组织理论来看，说新闻事业影响社会兴衰这个命题是正确的”。^③与上述所有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学的目的——一样，江也是抱着“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让同行们了解一下新闻学是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方法来研究的”。^④足见包括系统科学方法在内的新方法的引入在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作用。正如孙振斌所说：

（其他学科方法移植到新闻学研究中）不仅表明我们的研究冲破了人为制造的藩篱，扩大了科学探索的视野，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而且意味着我们的新闻学不再是随意拼凑、变化不定的七巧板，而是开始着手建立逻辑规范、度量标准、方法体系的一种具有实际科学价值的部门学科。^⑤

这些研究奠定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稳固地位，今天我们倒不觉得有什么新鲜感了，也就是说，系统科学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发展已经“飞入花丛皆不见”。

3)传播学作为方法论导入传统新闻学研究

在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传播学作为方法论的导入。由于方法是传播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先天性特征随着传播学传入中国而一起导入新闻学界，并引起了相当关注。参加 1982 年全国“首次传播学座谈会”的大部分专家认为传播学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等“有很大的先进性”，同时“有些是唯心主义的、烦琐的”。^⑥由此可见，

^①白润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评刘卫东的学术专著〈新闻传播学概论〉》，《新闻战线》，2002（3）：36-37。

^②王益民：《系统理论新闻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③江柳：《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④江柳：《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⑤孙振斌：《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现代传播》，1983（3）：1-11。

^⑥戴元光：《20 世纪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中国新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 页。

作为方法的传播学一开始就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此后，风起云涌的新闻调查以及其在我国新闻传播发展中的巨大影响更是初步彰显了传播学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1984年，传播学因被贴上“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标签而暂缓发展。不过，随着“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很快结束，传播学研究方法再次引起关注和讨论，并于1980年代中后期达到第一个高潮。“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①祝建华在1985和1986年的《新闻大学》上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的三大量化研究方法——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和控制实验。王志兴和郭建就“传播学方法论”问题开展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争论。二者争论的焦点是传播学方法论的缺陷，但对传播学方法论本身和其意义并无异意。王志兴认为，传播学把各领域里种种个别现象作为一类共同现象——传播现象，揭示其共性和内在联系，是一种高度抽象和有力综合。这种研究问题的总的方式及其具体方法，对于新闻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必将引起概念、范畴、体系上的一系列变化。首先，将新闻传播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研究；其次，将研究领域从以报刊为主扩展到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等；再次，将新闻扩展为信息；最后，增加定量研究。^②当然，此阶段传播学主要处于引介阶段，不管是方法论还是具体方法，都是介绍多，除了新闻调查外，真正付诸研究实践的少。

在1986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有研究者提出，在我国新闻学向传播学发展过程中要经过新闻传播学这个阶段，当前应组织力量，建立新闻传播学^③。在这一倡议下，新闻传播学建设成为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探讨的主要议题，也开始尝试用传播学的原理、框架和方法去分析一些现象或媒介产品，更有“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的呼声。^④

传播学作为方法论不仅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科建构上，它对新闻史的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尹韵公在谈及《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

传播学的崛起，使新闻学的研究摆脱了以往那种光是直勾勾地盯着报纸本身的源流和沿革，而忽视了对古代社会其它新闻传播现象给予必要关注的困境，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的视野，给新闻学研究灌注了新的强有力的活力。经过传播学

^①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新闻大学》，2002(1)：25-28。

^②王志兴：《传播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局限性》，《新闻战线》，1986(6)：13-16。

^③《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见《国际新闻界》，1986年第4期，第20页。

^④屠忠俊：《关于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浅见》，《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7(夏)：1-4转21；李良荣：《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大学》，1998(秋)：17-20。

的洗礼，新闻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①

传播学方法，尤其是“5W”分析架构，也为部分近现代史研究者所采用，如阎小波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所提出的‘5W’模式”，^②成为新闻传播学仅有的、向外“输出”的方法。

总之，传播学的方法论的意义已经在新闻学研究中得到全面认可，基本方法得到初步应用，价值得到初步彰显。

5.3.3 1996 年至今：重视并讨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

随着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日益深入、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以及新闻传播学术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方法之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并对此展开了反思和讨论。

1) 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

(1) 黄旦关于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述。黄旦深感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不尽人意，并试图在“研究态势”上寻求解决之道，主要有：①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架。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有两种现象：一是研究者醉心于一些热门话题，论题十分集中，就像记者抢热点；二是只述不作，有“理”无“论”。黄旦将之称之为“记者式”研究。^③这种研究态势的实质是“把学问作为一种经世致用的一种直接手段”，“宣传”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致使研究者的视野受到禁锢，创造力受到抑制，阻碍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入。黄旦认为，要突破这种态势，有两项基础工作要做：一是要澄清认识上的偏差，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来看待新闻学的应用性，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有其历史的积累和继承过程，因此要走向历史，去“熟悉新闻传播史和新闻学说史”；二是要端正学术研究的风气，静下心来，耐得寂寞，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②“回到历史去”。包括三方面意思：一是要了解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基本历史；二是要了解新闻思想变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三是要在懂“史”知“史”的基础上，从动态的、联系的、发展的过程去研究新闻理论。黄旦的这些提法实际上是统一的，即提倡新闻理论研究者贯彻科学研究“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要有历史意识，做增量意义上的研究。

^①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前言》，第 3 页。

^②阎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③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杭州大学学报》，1994(2)：155-161。

(2) 孙旭培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孙旭培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提倡和论述可能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最多的一位。主要包括：①讲究学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在新闻学研究中却迟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孙旭培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深度不够，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对学术规范不够重视。他在《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一文中总结的不规范现象有：(a) 大而不新；(b) 没有定义、随感式地表达对研究对象的认识；(c) 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d) 不充分占有资料而断然下结论；(e) 轻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f) 粗疏浮躁；(g) 不核对原始资料，以讹传讹；(h) 不重视引证注释。这些总结都是非常切中肯綮的。^①②讲究研究方法。孙旭培认为，搞好原创性研究，一要强化规范，二要讲究方法。^②他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要有论证，而不能写成“随感录”或“夹叙夹议的散文”。例如运用思辨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要加以定义，而不能让概念的含义像“游蛇般地走动”。总之，不管是什么具体方法，都必须是按照科学方法来操作，而不能随意而为或“有感而发”。

(3) 卜卫关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系统介绍与评述。1994-1997 年间，卜卫先后发表 8 篇有关传播研究方法的论文，系统介绍和评述了传播学研究方法问题，内容涉及传播学方法论、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控制实验、社会调查和内容分析等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做了说明，如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关系、定性与定量的关系、思辨研究等。

此外，陈力丹、陈崇山等对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也有过论述。^③

如果说上述几位研究者的论述只是个别行为，那么面向在校博士生和青年教师的“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的连续举办以及 2007 年由《新闻大学》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就是学界关于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的集体反思和讨论。另外，关于研究方法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在 2000 年以后相继出版，如《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戴元光、苗正民，2000)、《传播学研究方法》(王锡苓，2002)、《电视传播研究方法》(刘燕南，2003)、《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戴元光，2003)、《大众媒介研究导论》(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2005)、“新闻

^①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兼与喻权域先生商榷》，《新闻大学》，1999(春)：13-20。

^②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12-15。

^③分别参见：陈力丹：《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中的九大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3)：35-36；陈崇山：《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文的一点看法》，《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9)：37-40。

与传播学译丛·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共4册,喻国明、展江主编,2005)等,这表明整个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问题。

2) 多种研究方法的初步应用

(1) 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报刊的四种理论》(施拉姆等,1956)、《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就是新闻传播比较研究的经典文献。在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早期,如徐宝璜著《新闻学》、邵飘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已经开始“有目的地介绍欧美、日本的新闻学理论和报业状况,可说是开了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的先河”,^①甚至出现了比较研究的专文^②,但毕竟没有作系统的比较研究。更准确一点说,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对西方新闻理论和实务的引介,并没有作时间或空间上的对比。这种引介研究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在引进的源头上先后经历了“欧、美、日—前苏联—美、欧”几个阶段。

比较研究真正开始并渐成气候还得从1980年代中期算起。起初的比较研究较多地是把新闻作品与其他作品作比较,如与文学作品的比较;之后转为新闻理论、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制度等领域的比较,并在2000年以后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来看,有时间跨度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都可称之为比较研究,而历史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开始较早、成果较丰富的研究。但本书这里要分析的比较研究不包括这一部分,而是专门的比较研究。

从研究内容上看,理论、业务、历史、教育方面的比较研究均有;从内容涉及的范围上看,既有新闻传播多方面的对比,如钟大年主编《香港内地传媒比较》(2002)、顾潜著《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融》(2003)、郝明工著《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2003)、薛中军著《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2005);又有某一方面的对比,如张西明著《张力与限制:新闻法制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2)、姚里军著《中西新闻写作比较》(2002)、徐琴媛著《中外新闻发布制度比较》(2005年)等。在比较方的选择上,多为中外之比,立足点是中國大陸,“外”则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国香港、台湾,但主要是美国。

在上述比较研究中,关于比较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成果最为丰富。1994年社科院

^①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②指《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一文,作者杜超彬,写于1931年。参见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新闻所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填补了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①虽然冠之以“学”，但该书并没有阐明比较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学科性质等，而是直接比较了理论、法制、所有权、管理等几个方面。

同年出版的、由武汉大学樊凡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初步阐述了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包括新闻基本理论、新闻政策与新闻体制、新闻自由与新闻控制、新闻道德与新闻法制、新闻媒介功能与新闻实务、新闻装备与新闻管理、新闻消费与新闻审美、新闻记者的成才道路、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漫画、新闻教育、新闻事业史、新闻写作发展史的比较等等。^②作者认为，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常用的方法有：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阐发研究^③、关系研究、整体研究、多学科多侧面的交叉研究等等。该书的研究方法是在“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的方法论旗帜下”的文化哲学角度，^④内容偏重于新闻传播哲学。此后还出版了《比较新闻学》（刘夏塘，1997）、《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1999），虽然内容和形式有所扩展，但仍没有从学科角度论述何为“比较新闻学”。

2002年出版的童兵著《比较新闻传播学》在第一章简略地论述了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但在内容上与《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无太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包鹏程、朱普明）也以新闻传播学为题。比之更早的2001年，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认为“比较大众传播学”是介于“比较新闻学”与“比较传播学”之间的一个层次的学科，其涵盖范围比“比较新闻学”要宽，比“比较传播学”要窄，可以说是对“比较新闻学”的一种学科层次的提升，更符合比较新闻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蔡尚伟、黄顺铭，2001）。比较新闻传播学有向比较大众传播学、比较传播学迈进的趋势。

最终完成比较新闻学学科界定的是张威。他在2003年出版了《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一书。该书上编为“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方法、难题及其他因素”，分四章阐述了比较新闻学的界定、依据、内容、研究方法、历史、现状和难题等。最具学术价值的地方在于，他思考了比较新闻学的“可比性问题”，这关乎比较新闻学的合法性，也关乎比较研究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没有比较研究之前就能说出其不

^①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说明》。

^②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③上述三种方法均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由法国学派建立，其特点是：以法国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中心或辐射源，来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平行研究”由美国学派建立，侧重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型和比较诗学。“阐发研究”一般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阐明本土的文学创造（张威，2003：57-58）。

^④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同之处，这样的研究还有进行的必要吗？而这一点其他著作都没有论述过，甚至没有考虑过，就想当然地比较起来。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里描述的，悉尼大学一位相关领域的泰斗对其研究计划说：“比较什么呢？有什么可比的呢？你在拿一个苹果和一个香蕉相比，能有什么结果？中西新闻完全是两回事”。^①当然，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但并不是所有的比较都是有意义的。^②那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比较呢？比较的事物之间需具有共同属性和有机联系，这是前提。满足这一前提的可供比较的方面也是很多的，但要注重比较对象之间具有阐发意义的、重要的、本质意义的属性，着眼点是察优观劣，改善不足。^③这也许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学术社群开展比较研究的普遍心态。我国新闻传播比较研究尤其如此。

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悉尼大学泰斗所质疑或担心的恰恰是中西新闻比较的意义有无或大小。考虑到意识形态、中外新闻制度、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或现实，这样的质疑的确不无道理。它起码告诉我们，比较新闻学必须建立的一定的条件上。张威认为，“比较作为认知的一般方法和在新闻学中的特殊运用一起构成了比较新闻学的内在依据”；外在依据则包括“各国的新闻实践发展到一定的成熟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成熟的国际化条件”以及“国际诸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④从新闻传播学术史上来看，这种对合法性的反思以及对一门学科存在条件的追寻，无疑是不可小视的。新闻传播学综合性强，新闻传播研究自然与多个学科有交叉、互涉关系，但并不意味着都能发展出一门学科。我们在创立新学科，提出新理论时，不妨质问一下其存在的合法性，或者它的成立需要哪些条件，而不能一味地“向前冲”。

（2）人文主义范式及思辨研究。人文主义思辨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体现在多是以操作概念而不是事实为主要研究思路；多属于“应该如何”的规范性研究，而不是探究“是什么”的描述性研究和“为什么”的解释性研究。至于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以人文思辨为主，新闻学研究自然以人文思辨为主；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以实证研究为主，传播学研究自然以实证研究为主；二是新闻学长期归属于文学门类之下，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有中文学科背景，他们习惯于人文思辨的方法；三是人文思辨在我国学术研究中拥

^①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②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1页。

^④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5页。

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使然。这些原因的确会影响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但我们尚需深入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部，去探究这种一般被泛泛地称之为人文思辨的研究究竟是怎样一种研究思路。在此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我对“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式充其量只是我国学者的一种划分方法，或者是根据现有研究状态反过来的一种追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年版）中，新闻学被划入到“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学”大类下，与信息科学合在一起，名之曰“新闻学和信息（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包括“新闻学、图书馆学、博物学、文献学和档案科学”），与“社会及行为科学”并列。这说明，把新闻学列为人文学科并不具备必然性或普遍性。况且，传播学的导入冲淡了传统新闻学的人文气质，由此形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一复合意味极强的名称本身就说明很难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依据来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还是泛泛地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合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992）根本不区分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而是称之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另外，人文学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如计量史学。所以，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并不是必然的，我们一味地认为其属于人文学科这种预设和主观定向，反而导致了新闻传播研究多以人文思辨研究为主的态势。这种认识长期导致新闻传播学与文学不分，中文背景学科的学者挟“近水楼台”之优势进入新闻传播学术场域，更助长了人文思辨研究。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新闻传播学系归口在文学院下，中文背景的学者依然占据不小比例，这是值得深思的。

一般认为，人文思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这正是导致新闻传播研究以思辨研究为主的关键因素。我认为，对这一判断尚有细致分析的必要。虽然我国拥有悠久的人文学科传统，但“人文学科”这一名称，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①因此应区分我国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方法。“传统方法”主要包括注释、考据、训诂、校勘、神秘觉悟、阐释义理等在内的研究方法系统。^②19、20世纪之交，传统研究方法虽然面临西学方法的冲击，内部又有汉学、宋学之争，但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仍较为正常，传统研究方法与西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呈现出互补态势。但知识本身的实用化、专业化、“科学化”^③对传统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④

^①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②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③斯时所谓“科学”包含要用科学方法如归纳、演绎、实证等进行研究；要符合科学精神，即求真求实；要符合科学的程序，从个别

20 世纪上半叶输入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方法是一种以人的意志自由、信念、需要、情感、希望等“人性”为核心，以宇宙人生一体为视角对象进行理解、体验、解释，以获得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把握的方法，根据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发展、演变情况，主要包括现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发生学方法、传播学方法^②、解释学方法、接受学方法、直觉方法等。^③其应用领域局限在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但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其影响是巨大的。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方法与西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成为 20 世纪前半叶我国学术研究方法的主要形态，不妨称之为“新传统方法”，以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初，在人文主义引入的同时，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作为方法论和社会思潮引入国内。而这时恰恰是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新闻学在中国诞生之时。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学受三大思潮的影响几乎是共时、同等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导致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以思辨研究为主的主要因素。甚至，从徐宝璜开辟的“新闻本位”研究路线来看，科学主义方法更有理由成为中国新闻学科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因此，必须转换视角，从新闻传播研究内容和目的上来寻找原因。

黄旦通过细致的研究发现“政治需要”式的研究是百年中国新闻思潮中的主流，它由梁启超开其端绪，并由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④审视这一研究主流，会发现对媒介在变革、革命中的功能期望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期望的新闻实践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流内容。也就是说，规范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目的，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居次要地位。如果把这一点放到中国近现代以来变革、革命、救亡的宏大背景下来理解，其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而遵循此目的的关于媒介性质、功能的研究只能采用思辨的方法。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是受人文主义引入之后所形成的“新传统方法”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具体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导方法而发生了变化。

1978 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人文思辨研究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具体方法。前面我们提到，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同步引入到中国的，但它们被引入以后的命运却差异巨大。其斗争的过程自是复杂异常，但最后的结果

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或合理的逻辑推论；要以探讨事物的规律、本质为任务等等几层含义（李承贵，2001：59）。

^①李承贵：《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7-59 页。

^②李承贵没有详细解释传播学方法，我认为这里的“传播学方法”显然应属于批判典范的方法，而不是实证典范的方法。

^③李承贵：《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④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8 年 5 月。

却十分明朗。195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方法开始主要以“意识形态”的身份参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借助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独尊地位。^①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确是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使用,无疑会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教条化,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极大限制。^②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长期围绕着几个现成结论打转转,停滞不前,以至于出现“新闻无学”的谬论,不能不说是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教条化、甚至异化有直接关系。好在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到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和应用,开始逐步摆脱教条化的枷锁。

2000 年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方法逐渐被引入到新闻传播研究中,在积极翻译国外相关著作的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解释学方法方面有屠忠俊、蔡尚伟、彭焕萍等的介绍和应用;^③符号学方法方面有李彬围绕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符号理论的探索;^④现象学方法方面有陈作平尝试将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引入到新闻理论研究中,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和“媒体形态”三个基本概念(也是逻辑起点)来重建新闻理论的基本范式;^⑤胡翼青借鉴人文主义方法(解释学、现象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批判的方法)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新人本主义范式”;^⑥发生学方法方面有吴燕用此方法探讨新新闻主义产生的条件。^⑦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新闻传播学界对人文主义方法的运用基本上还处于引介阶段,但已经开始了尝试性运用,既包括微观上具体问题的分析,又有宏观理论体系的建构。应用的方面要么注重对已有问题或现象作出新的解读,要么侧重突破现有研究范式。不管结果如何,这些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3) 实证主义范式及定性、定量研究。定性、定量研究都属于实证主义范式的范畴。而我们关于“定性研究”的印象似乎与上文所述人文思辨研究更加“神似”。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定性研究作进一步的说明,然后简要说明定性、定量研究的区别,最后结合具体研究成果,分析实证主义范式及定量、定性研究的各种具体方法在新闻

^①李承贵:《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8 页。

^②李承贵:《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7 页。

^③ 分别参见屠忠俊:《必须重视解释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当代传播》,1999(5): 28-31;蔡尚伟:《哲学解释学与新闻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68-72;彭焕萍等:《从解释学视角看新闻文本的特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122-125。

^④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⑦吴燕:《新新闻主义的发生学探微》,《学海》,2000(5): 145-148。

传播研究中的运用。

陈向明对我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所谓“定性研究”作了恰当描述：

通过我个人平时的观察以及与有关学者交谈，我感觉“定性研究”的所指似乎比较宽泛，几乎所有非定量的东西均可纳入“定性”的范畴，如哲学思辨、个人见解、政策宣传和解释，甚至包括在定量研究之前对问题的界定以及之后对数据的分析。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①。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②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定性研究”与本书前面在“研究规范”部分讨论的“随感而发”有几分相似，又与人文思辨方法部分略同。另外，虽然定性研究和“质的研究”都译自“qualitative research”一词，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明显差异，前者坚守实证主义立场，而后者则超越了惟实证主义。^③

正如卜卫所言，定性与定量既是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又是作为“工具”的方法，所以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④

表 5.2 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区别

项 目 \ 研 究 方 法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研究观点	理解/当事人的视角	建立通则/客观
研究环境	自然环境	人工控制环境
研究策略	以归纳分析为主	以假设演绎为主
研究类型	体验式观察、访谈	非体验式调查、实验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关系	接受二者的互动	排除二者互动

尽管存在上面诸多区别，但由于二者都以事实为基本操作对象，所以注重围绕事实而不是概念展开研究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①定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具体方法包括观察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它们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均有运用。

^①景天魁：《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48 页。该引注为陈向明书中所引。

^②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23 页。

^③陈向明认为定性研究与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后者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而前者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显然，陈这里所指的定性研究乃我竭力区分的加引号的“定性研究”。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24 页。我认为，实证主义范式范畴下的定性研究，即本书所用不加引号的定性研究，与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不同。

^④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5)：49-54。

a.观察法。根据文献检索的结果,笔者发现新闻传播研究中所应用的“观察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等同于日常观察,这类研究以对研究对象(往往是某种热门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为基本样式。相对于下面几个层次,这种类型的研究最多。如《新闻界“炒”起来?——对若干新闻现象的观察思考》(吕一氓,1993)、《媒体要从“媚俗”泥潭走出来——对新闻娱乐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于都、胡舜文,2005)等。“炒”新闻、媒体“媚俗”现象在当年都是热门话题,作为一种可以称其为“现象”的事物,其发生、发展的历程是观察的重点,然后据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包括对发展趋势的估计、预测。这里,观察作为收集资料的工具,自发性大,随意性强,系统性不够。

二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途径(approach),如《新闻场逻辑:“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事件的传播学观察》、《新加坡新闻媒介所有权特征分析——法律角度的观察》等。与上一个层次相比,它在通过观察收集资料时依据一定的理论,如传播学、法学理论等。

三是实地观察,通过进入现场而不是通过文本来收集资料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蔡雯两篇关于美国“公共新闻”的研究文章很能说明这一点。^①当然,在上述实地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现场参与程度很低,深度参与的实地观察法在“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高参与度的实地观察是“民族志”研究的内核。“民族志”(也译为“人种志”、“方志学”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肇始于 20 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志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开始于 1958 年代,是文化与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类型,取得了丰厚的成果,^②也受到了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并得到了初步运用。代表性研究成果是两篇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郭建斌)和《电视与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李春霞)。^③这两篇论文均以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为基本落脚点,为个案研究。

b.个案法。Merriam认为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根本特征是:其一,针对性。“因此它是研究实际问题非常好的方法”;其二,描述性;其三,启发性;其四,

^①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与分析》,分别载于《国际新闻界》,2005(1):12-16,2005(2):27-31。

^②郭建斌:《民族志法:一种传播研究值得借鉴的方法》,《新闻大学》,2003(夏):42-45。

^③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 4 月;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 10 月。

归纳性。^①

必须指出, 个案研究与议论文写作中常用的“举例论证”是不同的。个案研究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 举例论证只是论证过程展开的方法。个案研究中的“案例”是整个研究的基本对象, 对它的描述要尽可能地详细。在数量上, 往往只是一个(所谓“个案”), 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过, 我认为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容易得出有普适性结论), 甚至它是独一无二的。举例子作为学术研究中一种常用的论证方式, 最忌讳之处在于只选择与我有利的例子, 而对反例置若罔闻, 甚至例子与结论互相矛盾。个案研究最应该避免的是为研究个案而研究个案、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

追求结论的普适性, 是所有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个案研究也不例外。个案本身有大与小、复杂与简单之分, 但研究都遵循“由个案折射整体”的路线。潘忠党谈的一个例子也许对理解个案研究的“大”与“小”很有帮助:

我的一个学生考察了中国一家本土广告公司, 并以此项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他考察的是一个个案, 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个案。表面上看, 他提的问题是: 本土广告公司如何应对 4A 广告公司的强有力竞争? 但实际上, 他远远超出了这种描述性或经验总结式的问题, 他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 本土广告公司如何“本土化”? 4A 广告公司的专业运作程序, 如何利用传统国营体制的内部资源, 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组织内部空间, 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这个问题可大了, 虽然考察的对象仍然是一家广告公司。它分析的关注点是具有一定启发和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 涉及中国改革过程中新与旧、内与外之间的互动, 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这种“大”与“小”的有机结合也许就是所谓“不大不小”的精髓。^②

研究对象是“个案”, 研究问题又不囿于个案本身, 而是提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问题, 这是个案研究的理想境界。退一步说, 即使得出的结论暂时无普适意义, 也同样具有学术价值, 起码我们对个案的把握是精到的。随着越来越多个案研究的积累, 我们就可以对超越于个案之上的同类现象有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这是科学抽象的必然路径。这正如美国传播学, 一开始是诸多先驱在各个领域提出一个个理论、观点, 后来由施拉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理论体系。遗憾的是,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似乎刚好相反。不管是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还是传播学, 概论类研

^① Merriam. S. B.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② 潘忠党:《学为问, 学而知不足》, 载于《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 第 275-286 页。

究都是最多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太多,但大多是整合性研究,了无新意,造成研究不够深入、细致。针对这一现状,不少学者阐述了他们的看法。方汉奇在1982年就主张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解放后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 we 继续去做”。时隔25年的今天,他仍主张“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①可见新时期以来报刊史个案研究仍有巨大空缺。宁树藩认为新闻史研究深度不够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有关,表现之一就是“面上的总体研究多,点上的个案研究少”。^②丁淦林认为新闻史研究“就是要多作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③何志武、孙旭培认为“我国学者热衷于宏大叙事,追求普遍的价值,常常在宏观的层面探寻‘绝对真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微观层面,却常常难以回答清楚‘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发出“多一些个案的定性研究”的呼唤。^④

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新闻传播个案研究中的“个案”,可以是一家媒体(如大公报、南方周末、北京交通广播电台)、一个栏目或现象(如“新闻调查”、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一个新闻界人物(如史量才、张季鸾)、一个事件(如“91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一则新闻报道或媒介产品(如广告、电视剧)等。个案本身有大与小、复杂与简单之分,但研究都遵循“由个案折射整体”的路线。

整体来看,1978年以来的个案研究除了一些时间性特别强的事件个案研究外,以对历史上重要报刊史的研究最多,如《新华日报史》(韩辛茹,1987)、《新记<大公报>史稿》(吴廷俊,1994)、《申报兴衰史》(宋军等,1997)等。其他报刊史也正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蜜蜂华报>研究》(程曼丽,1998)、《<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饶立华,2003)等。另外,由于个案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新闻传播法、新闻自由、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领域内的研究中个案研究也较多。如《“停止采访资格”事件评析》、《从美国媒体“华盛顿枪击案”报道看犯罪报道中的新闻道德问题》、《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孙志刚事件”舆论监督分析》、《足协的“封杀令”与媒体的采访权》等。

c.访谈法(interview)。访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

^①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 32-37。

^②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 29-32。

^③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133-140。

^④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2): 44-47。

（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①以使研究者“能够理解并解释被研究对象的行为或看法”。^②陈向明特意使用“建构”一词，旨在强调访谈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的行为”、“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事实’和‘行为’的过程”，而不是研究者向被研究者“客观”地了解情况的过程。^③

访谈法又有很多类型，但据笔者的系统分析发现，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是深度访谈法（in-depth interview）和焦点组访谈法（focus group interview）。深度访谈要求事先部分准备好问题，大量的问题是在访谈过程来生成的。所谓“深度”，一是指要了解更多的细节信息；二是要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 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④焦点组访谈法是一种以了解小组成员态度和行为的方法。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默顿（R.Merton）进行的战争宣传效果研究，之后就消失了，1980年代又重新进入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研究者视野，受到关注和应用。^⑤

目前所见到的成果中，运用深度访谈法的研究主要是新闻传播博士论文和课题研究。前者如《两岸进入WTO后的都市有线电视经营——以高雄与上海为例》（林崇能），它通过对电视台主管深度访谈“实际了解两地有线电视产业之经营现况与策略，以验证分析内容的正确性”；^⑥再如《意义的解码：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王昊）通过焦点群体访谈“了解被访家庭对《新闻报道》节目的内容，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优势意义’是否理解，怎样理解”。^⑦上面提到的两篇民族志研究则使用了民族志访谈法（ethnographic interviews）：“发生在参与性观察中的情境对话，是一种非正式的、对话性的和自发的访谈形式”。^⑧后者如丁柏铨主持的“十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它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具有在不同国度接触新闻传媒的受众进行结构性访谈”，^⑨“了解入世以后受众将如何看待目前我国新闻传播业的现状”以及“对于新闻传媒的心理期待”。^⑩

严格意义上使用访谈法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访谈法，是一

^①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②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③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④转引自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5)：53-68。

^⑤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⑥林崇能：《两岸进入WTO后的都市有线电视经营——以高雄与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4月。

^⑦王昊：《意义的解码：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

^⑧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⑨丁柏铨等：《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页。

^⑩丁柏铨等：《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种了解情况, 征求访问对象意见的途径, 与新闻采访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比较相似, 目的性、系统性不强。如《大众传媒新闻信息资源增值研究》一文通过对“以新闻单位相关的负责人, 传媒研究专家为主”的访谈, “除了请相关人士提供他们的专业智慧、经验及意见, 以凝聚对特定议题的共识, 还可以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激发自己的思考”。^①在本书所分析的 89 篇博士论文中, 访谈法出现 9 次, 除两篇^②是比较严格的访谈外, 其他基本上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访谈法。

d. 文本分析法 (text analysis)。它是一种探讨讯息内容的性质的一种有力方法,^③多用于对媒介产品 (新闻、电视剧、广告、电影、歌词) 内容的分析, 但不同于定量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还有一种与之相似的方法——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至于二者的区别, 丁和根认为西方很少有人将本书 (text) 与话语 (discourse)、本书理论与话语分析这两组概念之间作非常严格的区分,^④因此可以统称为文本、话语分析。

文本分析包括两类: 一类强调文本本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 通过研究者的解构, 将其揭示出来; 一类关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 研究者通过文本分析解释何种因素 (如文本结构特色、社会结构、观众的身份等) 使得某种特定意义最具社会显著性。^⑤前者如《全球性媒介事件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奥运的视角》(李凯) 通过对北京 2008 年申奥宣传片的文本分析, 考察其是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 后者如《透视电视娱乐的文化“母题”与叙述策略——〈超级女声〉的叙事话语分析》(刘自雄) 通过分析发现, 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书写 (意识上的和行为上的) 进一步转变为更加真实的书写, 并且其书写本身成为决定文本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文本主角的命运取决于“读者”的书写行为 (各种途径的投票), 而不是“作者”; 甚至读者就是作者 (通过投票操纵比赛进程), 而作者却变成了读者 (主办方、裁判必须顾及网络表征的民意, 舍弃自己的独断意志)。^⑥

倪林发现“符号话语分析、传受主体分析和媒介理论”在 2004 年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取向中位列榜首 (共 26 篇, 占 23%), 标志着我国开始把新闻文本从作为新闻实务的编辑、加工、校对、采写等的研究, 转到“从文本内在结构分析文本制作者

^①吴海荣:《大众传媒新闻信息资源增值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2005 年 5 月。

^②作者分别是林崇能、王昊。

^③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 1996(6): 46-51。

^④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1): 37-42。

^⑤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1): 37-42。

^⑥刘自雄:《透视电视娱乐的文化“母题”与叙述策略——〈超级女声〉的叙事话语分析》,《新闻大学》, 2005(冬): 66-72

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论证社会强势权力关系”。^①倪林没有在文中说明“符号话语分析、传受主体分析和媒介理论”是如何界定的，因此也无法核实结果是否如此。从其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对文本、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较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本书、话语分析法已经开始逐步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

②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新闻传播定量研究是指“根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新闻观点，运用科学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②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调查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2000)，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法，前文已做过论述；第二个阶段(2000年至今)，采用定量研究的一般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和社会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主要用于研究媒介形象和某一问题(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除了受众调查外，社会调查法主要应用在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验证性研究中。

祝建华认为目前大陆学者开展的定量研究多为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描述性研究虽然可以作为研究某一问题或者现象的起点，但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理论检验缺少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站在量化研究的起点上，需要向“理论化”努力。“精确化只是科学化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是理论化”，“科学化的真谛是理论化”。定量研究追求精确化，资料的数据化呈现的确使研究结果做到了精确化，但必须通过变量之间的检验分析提出“理论”，不仅能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而且更能说明“为什么发生？”和“是否还会发生？”^③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术的重要构成，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充分讨论之时，也是新闻传播学术大发展之时。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2)，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由于思想解放的有限性，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和应用都是初步的，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①倪林：《平淡的中国传媒理论——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取向分析》，载于 http://bbs.mediachina.net/index_bbs_show.php?b_id=4&s_id=233343

^②强月新、宋兵：《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现代传播》，2003(4)：40-43。

^③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有限的恢复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二阶段（1983-1995），调查研究风起云涌，系统科学方法全面渗透，传播学作为方法论导入。受众调查虽是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但其直接的推动力量和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新闻改革。系统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二者之间相交叉出现的新学科表明其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渗透是全面的。传播学则肩负着改造传统新闻学的使命，在方法论、具体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对传统新闻学影响最大，这是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三阶段（1996 至今），学界普遍开始重视并讨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研究规范和方法在学界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是新闻传播学术成熟的标志之一。比较研究、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观察法、个案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定量研究中的社会调查、内容分析）等多样研究方法的应用则促使新闻传播研究朝多元化发展。

6 研究效果论

1978 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各个领域辛勤耕耘,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它们产生的效果如何?这是本章所要问答的问题。

按照辞海的解释,“效果”在哲学上与“动机”是辩证法的一组范畴,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①。新闻传播学里的“效果”或曰“传播效果”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受众接受信息以后在认知、态度、行为上产生的变化。本书所谓效果显然与此不同。研究效果与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直接相关,但对目的、动机的考察只有通过研究者的访问才能得到,由于研究不甚规范,研究成果透露出的动机、目的往往不是直接的。另外,动机、目的是一回事,是否达到或实现是另一回事。还有,研究目的、动机偏向于微观,体现的是个体化研究的目的和动机。本书所要考察的效果则偏向于宏观,体现的是新闻传播学界这个整体在新时期所产生的效力。因此,用“效果”一词更合适。

概括起来说,本书所指的“研究效果”是笔者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整体、主流的一种宏观评判,而不是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综合得到的,虽然二者有直接的关系。研究效果深受研究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前者只是后者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但研究主体的主观努力仍是研究效果的最直接决定因素,只不过,其所处的环境可能已经转化为其能动意识的一部分。因此,本书尽管用研究效果一词,但其包含研究动机、研究内容的部分意涵。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获取知识。结构化的知识即是学科以及学科体系;知识作用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不断完善。笔者认为,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两条主线,前者对应于理论,后者对应于实践。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中国新闻学更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再加上文革的破坏和影响,新时期之始我们实际上是从“新闻无学”开始的。经过 30 年的努力,新闻传播学不仅在建制上取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而且初步描绘了一幅由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图景。因此,构建学科体系无疑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最明显的主线之一。这是理论研究方面。在实践方面,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75 页。

动力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这个系统的构成之一，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记录者、反映者和促进者。可以说，新闻改革是 1978 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最大实践。因此，关注新闻改革、研究新闻改革、推动新闻改革必然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另一条主线。

6.1 建构学科体系

诸多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新闻传播学”，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一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泛泛地称为新闻传播学，以区别于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特的研究对象，对应于高等教育建制化的专业；二是狭义上的新闻传播学，主要指理论新闻学，以概论类教材或专著为典型代表，主要是一种知识分界的概念，要系统阐述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体系性较强；三是广义上的由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每个分支也称为学科，如新闻采访学、传播社会学、电视新闻学等，主要是在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内互相区别，与教学上的科目相对应。

新闻传播能否作为一个学科还有待讨论，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独立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它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因此，本章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讨论新闻传播学科。

研究领域的相对独立对于建构学科倍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和高等教育体制来说显然不够。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新闻学”，一开始就是以学科的标准来衡量的。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徐宝璜《新闻学》（1919）、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著的出版，被认为是我国新闻学诞生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新闻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得以建制化；（2）出版了有代表性的著作；（3）明确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并大概勾画了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而这正是学科出现的诸多条件中的一部分。以此为时间起点，我国新闻学已经走过了近 90 年的发展、变化历程。积极构建学科更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的“主旋律”。

既然要从学科的视角来讨论新闻传播学，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学科”。“学科”既与高等教育相对应，又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还是知识分类中的一个概念，因

而是高等教育学中一个复杂而关键的概念。高等教育研究者王建华经过对学科（discipline）进行词源学上的考证和学科制度化历史的梳理发现：“学科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一种制度，一种建制、一种规训^①的方式”、“学科应包括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两个层面”，“学科制度（学科内在制度）主要指学科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学科建制（学科外在制度）主要指大学内部机构层面的东西”。^②万力维认为“学科”一词有五个要义：其一，相对独立；其二，专门化；其三，属于历史的范畴，是一定历史时空中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其四，延伸为由规范化、专门化知识群体结成的学术组织；其五，隐含规训和控制研究对象和门徒的权力技术的组合。^③简言之，它在内部表现为独立、专门化的知识，外部表现为一定的组织，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具有规训功能。

学科是历史的范畴，它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王建华总结出一套判断一个研究领域能否成为一个学科的大致的、经验性标准：

（1）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2）学科代表人物；（3）学科经典著作（4）大学里相应的建制；（5）学科专业出版物；（6）研究基金；（7）专业研究者；（8）培养研究生的相关课程组合（9）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④

另外，费孝通还提出“学会”是学科机构部门之一的观点。^⑤我认为可以将其合并到标准（7）中，即专业研究者及专业学会、研究会，或学术共同体。

我认为上述标准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1）和（9），用于衡量学科的独立性和专门化程度；第二类包括（2）和（3），用于衡量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三类包括（4）和（8），用于衡量与学科对应的教育建制；第四类包括（5）、（6）和（7），用于衡量学科发展的支撑状况。第一类注重知识本身的构成和体系，可称为内在标准。研究对象及领域的独立性、稳定性以及体系的完整、严谨程度在根本上决定了一门学科发展的状况。第二、三、四类注重学科发展的外在表现，可称为外在标准。学科知识内在发展的状况通过外在标准呈现出来，二者整体上是一致的，但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①“规训”是英语“discipline”一词的汉译。这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创用的一个新术语。在西文中，这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福柯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 1999 年版，《译后记》，第 375 页。

^②王建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2004（1）：69-74。

^③万力维：《学科：原指、延指、隐指》，《现代大学教育》，2005（2）：16-19。

^④王建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研究》，2004（1）：69-74。

^⑤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高等教育研究》，1993（4）：1-7。

6.1.1 从内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 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及理论体系

虽然每一部冠之以“学”的著作基本上都会阐述其定义和研究对象,但从整体上讨论新闻传播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显然是就狭义新闻学,即理论新闻学(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概论类著述和教材上)而言的。因此,实际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新闻学,或者是什么样的新闻学?它研究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新闻学就谈不上成熟,甚至谈不上存在。

实际上,围绕新闻无学、有学、有什么学的争论从新闻学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2007年仍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学名存实亡”,因为“新闻学研究核心缺失”。^①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说法,甚至嗤之以鼻。作为一种声音存在,它起码提醒我们在构建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热潮中还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而不能仅凭热情。不过,今天新闻无学的论调比起新时期之初及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驳斥“新闻无学论”恰恰是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起点。1983年5月,劳动人事部在讨论记者、编辑应否评职称时,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者是“凭借经验常识和技术技巧的生产者,或较低层次理论知识的再现者”,^②不应该纳入职称系列,遂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新闻有学无学的大讨论。徐培汀认为“新闻无学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首先,我国新闻学自身比较年轻,且屡受政治运动干扰和“左”的思想束缚,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其次,新闻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受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影响大;最后,新闻知识面广,包含内容多,不是专、深、窄的学问,在心理上容易给人无学的印象。^③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以为,易受政治运动干扰以及新闻学研究中直接的实用主义倾向是“新闻无学论”产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我们提出的新闻规律在实践中往往为政治因素所破坏。不少主要领导长官意识严重,随意指挥、干预新闻实践,导致新闻界独立性荡然无存,给民众以不良印象,进而连带到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科本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者意识到寻找新闻传播规律(因为规律是客观的,

^①曾晓渊:《新闻学名存实亡——从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二版)看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缺失》,《中国图书评论》,2007(2):40-43。

^②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不容随意破坏)、提高新闻理论性(使其朝高深方向发展,以区别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建构新闻学科体系(追求概念、研究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以系统化、体系化)的重要性,积极引入传播学、开创新学科、采用量化方法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艾丰称《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新闻无学论”的“发愤之作”: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①

当然,驳斥“新闻无学论”最好的武器是具有严谨逻辑体系的“新闻学”的建构。

如前所述,新闻学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概论专著、教材上。沈莉通过分析 1979 年 1 月-1996 年 12 月 18 年间 30 部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发现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经历了“‘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新闻’本位”三个阶段,也是三种范式:

“党报”本位建构是指以党的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在政党事业的规定下说明新闻事业运作及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新闻事业”本位建构是指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定和特定社会系统的外在需求下,说明新闻事业运作及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新闻本位”建构是指以新闻传播活动或新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说明其运作规律和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②

当然,这三种范式“相互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性和内在的延续性,实际上是逐渐尝试着渐次呈现并渐次回归‘新闻’和新闻学科本位的三种思路”。^③沈莉的这种实证研究方法,以及通过新闻学概论类教材看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是可行的,得出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可信的。尤其是对三种范式关系的判断非常符合我国当下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实际状况,即今天新闻学理论虽一直在不断努力超越旧范式,但在建构实践中总是滑向旧范式,超越和创新的难度超乎我们的预料。

从 1997 年至今,10 年过去了,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否有新的发展?如果有,它又是怎样的面貌?这是本书要着重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并方便与沈莉的研究相比较,本书采取相同的方法和思路,即通过全面收集 1997 年 1 月至 2006 年

^①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

^②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 年 5 月。

^③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 年 5 月。

12月期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类教材,从“逻辑起点、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理论框架”等指标入手对其进行宏观考察。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以“新闻学”、“新闻理论”、“理论新闻”为关键词检索大陆学者在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目,结合《中国新闻年鉴》(1998-2007)提供的“新闻传播学书目”,以得到分析的书目(见附录四)。另外,对于此间内再版的著述、教材,如果没有明显变化,则只考察第一版;自考、远程教育类教材不在此考察范围内。在分析程序上,首先粗略扫描,然后以沈莉提出的三种范式及其基本特征为参照系,看有无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新框架、新体系出现。

必须指出,由于此类著述大多是专著、教材“一身二任”^①,重复度极高,些许创新性的观点往往淹没在瞻前顾后的全面呈现中,给确定资料来源和分析考察都带来不小的麻烦。这也决定了研究的视角只能是“宏观考察”,即注重对由章节内容所构成的体系的分析。

总体上看,理论新闻学在最近10年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更新上。所谓内容更新,是指在保持基本框架、范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根据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将一些新的知识及时补充、融入到新闻学理论体系中,如媒介经济、媒介经营、网络新闻传播、WTO对我国新闻传播的影响等。正如李良荣所言,20年来,“《新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未变,但每年总有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考充实进去。这是从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也是从不断深化着的新闻学研究中借鉴过来的”。^②丁柏铨也认为“将新鲜的时代内容摄入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体系,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充实、调整新闻理论,淘汰某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内容,这应当是当前和未来理论新闻学建设和研究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③

笔者注意到,“媒介”(或“大众传媒”、“媒体”、“传媒”等)正逐渐成为新闻学理论中一个关键概念,它也许能涵盖最近10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建构的新变化。

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认为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④凸显了新闻本位意识,

^①但二者要求不同,后者重在介绍基础知识,应包容多种观点和材料;前者重在论述独到见解,评价特有材料。参见丁淦林:《丁淦林教授序》,载于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②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③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但第八、十、十一章论述的却是“媒介”（大众传媒与社会、新闻媒介的运行体制与管理模式、新闻媒介的受众）。

刘建明著《当代新闻学原理》甚至以“媒介”为中心概念。他认为“作为探索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则及其功能的学科，新闻学原理揭示新闻媒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相互联系，旨在建立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①有趣的是，刘建明 1999 年著《现代新闻理论》则采用的是“新闻本位”体系，全书先后讨论了新闻起源、本源、新闻形态、新闻特征及报道规律、报道方式、新闻传播（制约因素与动力）、新闻媒介、新闻观念、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产业、党报理论、西方新闻报道与体制。

丁柏铨著《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也以“新闻传媒”为中心。第二、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章分别论述了新闻传媒属性、新闻传媒功能、制约新闻传媒的规律、传媒走向市场与党性原则、新闻传媒的经营、新闻传媒的管理、第四媒体的崛起与新闻业、加入WTO与传媒业。丁在该书的《导论》中谈到，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理论部分，涉及的是关于新闻的最基本方面的理论概括，如新闻的本质，新闻的功能和作用，新闻价值，新闻的内在规律等；二是面对新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②从该书框架来看，着力点显然在后者，是对市场化、新媒体、“入世”挑战下新闻实践问题的思考等。

从“党报”到“新闻事业”，从“新闻”再到“传媒”，新闻理论核心概念的变化，是新闻传播载体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新闻传播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关系不断调整、自主独立的结果。“传媒”中心的变化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官方建制提出了要求。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认为，目前把新闻传播学置于文学门下、新闻传播学分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状况“与新闻媒体的巨大社会影响、信息传播在当今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相称”。他建议应把新闻传播作为独立的一个学门，下设三个一级学科：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传播学（传播学理论、广告与公关传播、出版传播）；媒介经济学（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管理）。^③其中，单独设立媒介经济学的建议也说明“传媒”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虽然有此趋势，但我认为据此就作出新闻学出现一个所谓“传媒本位”范式的结

^①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第 1 页。

^②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 页。

^③郭庆光：《从教育部全国评估谈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新闻战线》，2005(8)：57-58。

论为时尚早。传媒，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它主要是归属于产业范畴的概念，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学的规律来考量它。但在当下中国谈论媒介产业、媒介经济仍然无法逾越制度性障碍（如跨地域经营、资本运作、人事制度等）。另外，上述倾向只是部分著述所透露出的信号，更多的则呈现出“新闻事业”本位、“新闻”本位并存的局面。

杨保军著《新闻理论教程》是这种融合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理论新闻学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其一是围绕“新闻是什么”而建构的“新闻本体理论”；其二是围绕“新闻业是什么”而建构的“新闻业态理论”；其三是新闻传播业与社会大系统及各主要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可称之为“新闻关系理论”。^①李良荣著《新闻学导论》（1999），第一~五章论述的中心是“新闻”，第六~十四章是“新闻事业”，第十五~十八章则是“大众传媒”。此外，《新闻理论教程（修订本）》（胡正荣，2001）、《当代新闻理论》（郑保卫，2003）等都兼具“新闻本位”和“新闻事业本位”。

可以归属到“新闻事业”本位的是《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主编，1999）；“新闻本位”突显的有《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2000）、《新闻学原理》（彭菊华，2006）、《新闻理论基础》（刘九洲，2006）等。

上述著述在研究方法上仍沿用传统思辨方法。陈作平在研究方法创新上作了尝试。他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建立那种能够统摄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而现象学中‘本质还原方法’可以有效地把握事物的共相”。^②他提出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三个基本概念（逻辑起点）来重建新闻理论基本范式的设想并架构《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一书。

上面我们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讨论的。不管稳定、严谨程度如何，新闻学总算还有一个大概的理论体系，传播学则几无体系可言，多数传播学概论类著述主要是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在框架上，以传播层次（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架构为主，大众传播层次则以“5W”架构为主。退一步说，传播学本身也许并不追求理论的体系化，这也是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现状，但这并不影响它不断产生出一些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研究。

总之，从“党报”到“新闻事业”，从“新闻”再到“传媒”，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虽有从前至后的偏移，但时至今日仍处于“杂陈”状态。重心的不定必然导

^①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②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致体系不严。新闻传播学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但缺乏严密的体系结构。

2) 边缘、交叉学科发展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断衍生出一些新学科。作为以信息传播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新闻传播学自然需要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科技、心理、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研究自身问题。新时期之前，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基本上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办报活动这一狭小范围内，新闻学研究也相应地只与文学、政治等几个有限学科关系紧密，交叉学科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新闻学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越来越复杂，需要从更多学科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另外，科学自身的不断进步，也使得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既是必然，又有可能。

“交叉学科是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相互结合，彼此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①根据刘仲林等学者的研究，“跨学科”（或“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于1926年在美国首先出现，30年代风靡学术界。1970年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会议，1976年第一份国际跨学科学术杂志问世。1985年4月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召开，^②掀起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热潮。

新闻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只是我国整个学术界交叉学科热的一部分。1988年“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掀起新闻边缘、交叉学科建设的高潮。四十多篇会议交流论文涉及近30门边缘学科。所谓“新”学科，是相对于建国以来形成的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新闻史学这个传统的新闻学体系而言的。新闻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新闻事业、新闻活动实践的需要是新闻学新学科出现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而为新闻改革服务、加强新闻理论体系则是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目的。^③周泰颐认为“既促进新闻学的确立和成熟，又为自身尽快确立和成熟开辟道路”是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双重使命。^④也就是说，虽然新学科本身不成熟、尚在发展中，但它可以促进整个新闻学的确立和成熟。因此，建构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学界积极发展边缘、交叉学科的目的之一。这与新闻传播学界以科学性追求独立性、排除外界干扰的努力是一致的。

^①刘仲林主编：《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②刘仲林主编：《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③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年11月，第1-4页。

^④周泰颐：《试论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特殊使命》，载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年11月。

当然，一些学科并非是在上述会议才提出来的，但它的确促进了新闻边缘学科的建设。武汉会议之后，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新闻学边缘学科丛书”，但只有两本：《记者心理学》（沈俊法、汪新源，1993）、《报业经营管理》（屠忠俊，1992）。这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的确与其他学科有交叉，但要把这交叉的部分形成理论体系、提出一个新学科来仍需艰苦探索。

1996年，黄道弘出版了《新闻边缘学科概论》。但非常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阐述什么是新闻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什么等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是从学科的视角来观照新闻边缘学科，或是创建一门“新闻边缘学科学”，而是直接就新闻政治学、新闻美学、新闻法学、新闻语言学分别作了论述。

2001年“新闻新学科高级教材”丛书出版，包括《新闻传播学》（李元授、陈扬明）、《新闻文化学》（刘智）、《新闻心理学》（虞达文）、《新闻美学》（季水河）、《新闻语言学》（李元授、白丁）、《新闻伦理学》（黄瑚）。它们不但全冠以“学”之名，而且都界定或阐述了其研究对象、内容、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学科的严谨和完善程度大大提高了。

之后，尽管再没有新闻传播类交叉或新学科丛书出版，但其数量一直在增多。时至今日，具体有多少新闻传播的交叉边缘学科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了。还有一类，如《心态新闻学》、《媒介诗学》、《新闻色彩学》、《城市新闻学》、《幽默新闻学》等，既不是分支学科，也算不上很严谨的理论。倘若新闻传播与其他事物一有交叉，就能衍生出一门“学”，那么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另外，大多数所谓“学”往往都成了“孤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学”除了制造点噱头外，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意义不大。因为，学科毕竟是“一种累积的知识传统”。^①

徐培汀认为，“较有影响”又“较有发展前景”的交叉、边缘学科有：新闻哲学、新闻（传播、媒介）伦理学、新闻（传播、媒介）法学、新闻（传播、媒介）社会学、新闻（传播）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传播）统计学、媒介经济学、新闻舆论学（或舆论学）、新闻（媒介）文化学^②。很明显，与新闻传播学科交叉的学科和新闻传播实践的关系都非常直接、密切。同时，研究者都不止一人，不同研究者的参与、对话、积累，才能使某学成其为学科。

交叉学科的理想状况是融合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两张皮”，即仅以其他学科的

^① [英] 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② 括号内字为笔者所加。因为这些学科虽名之曰“新闻xx学”，但以“传播”或“媒介”替代之也同样适用。参见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原理、方法来解释新闻传播学的问题。^①这种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科交叉中仍然存在。新闻（传播）心理学是个很好的例证。

新闻心理学、新闻采访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是诸多新闻传播学交叉、边缘学科中研究最早、成果最突出的。但从一个学科的标准来审视它，仍没有完成体系化。或者说，建构体系化本身是不必要的或根本无法实现的。刘晓红、卜卫认为传播心理学（新闻心理学属于传播心理学的范围）尚不能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因为作为“干”的传播学尚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同时，传播心理学也不能作为某一心理学分支存在，因为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所构成的问题的抽象程度不同，涉及到的社会生活种类也不一样，只能归属到心理学不同的领域，如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因此，所谓的“传播心理学”只是对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的研究的统称。^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传播心理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传播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发现一般心理学规律在特定传播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规律。^③

新闻（传播）心理学况且如此，其他分支学科可想而知。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这种“两边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反映出的问题是，如果作为“干”的新闻学、传播学体系不稳定，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分“支”学科。

如果说 1980 年代新闻传播交叉学科的自觉构建是为了追求学科独立性，那么今天则更多的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遵循学术自身的逻辑，不妨先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为学科的创建积累材料，而不是动辄提出一个海市蜃楼式的所谓“学”。

6.1.2 从外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 学科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

学科代表人物和学科经典著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经典著作往往出自学科代表性人物之手，做出经典性研究的学者自然成为代表性人物。本书讨论的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历程及现状，因此，所谓学科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只能限定

^①周泰颐：《试论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特殊使命》，载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1988 年 11 月。

^②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4-345 页。

^③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3 页。

在该时段内新闻传播领域里的大陆学者和著作。

为了寻找学科代表性人物和学科经典著作，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首先是几个学者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列的书目。学生的培养，尤其是硕士、博士的培养，是学术传承的基本途径，阅读有代表性的书目是他们登上学术舞台之前的必修课。当然，所谓有代表性，是取决于开书目的人的。陈力丹、戴元光、李彬、李良荣、刘建明、罗以澄、童兵、尹鸿、喻国明都推荐过书目。^①统计这些书目发现：非新闻传播学著作多，新闻传播学著作少；翻译过来的国外著作多^②，大陆学者自己的著作少；各个学者推荐的书目差异大，重合的少。完全重复的一本没有，重复出现3次及以上的有：《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1993）、《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电视史》（郭镇之，1991）、《大众文化与传媒》（路扬、王毅，2000）、《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1998）、《新闻事实论》（杨保军，2001）和《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主编，1999）。

其次是引证分析^③。徐剑通过对CSSCI^④（1998-2003）引证分析发现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核心作者学术力综合评估排在前十名的分别是：陈力丹、方汉奇、喻国明、郭镇之、张国良、李良荣、胡正荣、刘建明、游苏宁、卜卫；被引15次以上且为国内学者所著的著作分别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学大辞典》、《传播学引论》（李彬，1993）、《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关世杰，1995）、《传播学原理》（张国良，1995）、《传播学总论》（胡正荣，1997）、《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1999）、《传播学导论》（邵培仁，1997）。^⑤

肖燕雄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94-2003）上130位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发表论文的引证分析发现，被引证次数排在前10名的作者分别是：陈力丹、方汉奇、喻国明、肖东发、李良荣、刘建明、张国良、郭庆光、童兵、王振铎。^⑥

^① 依次参见《陈力丹自选集》、《戴元光自选集》、《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李良荣自选集》、《当代新闻学原理》、《罗以澄自选集》、《童兵自选集》、《尹鸿自选集》、《喻国明自选集》。

^② 均占70%以上，某学者推荐的书目中翻译文献占82.35%，但外文文献几乎没有。

^③ 下面三项研究中，新闻传播学包括编辑出版。

^④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⑤ 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9页。

^⑥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6（2）：23-25。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方法与指标工作室”通过引证分析发现^①，各年龄段发表和引文状况中前2位的作者如下：

表 6.1 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各年龄段研究者发表论文和被引情况

	1939 年以前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CNKI 发表篇数	胡文龙 (125) 蓝鸿文 (124)	童兵 (202) 刘建明 (126)	陈力丹 (410) 喻国明 (173)	蔡雯 (125) 杨保军 (60)	赵曙光 (71)
CSSCI 发表篇数	蓝鸿文 (27) 赵玉明 (17)	童兵 (28) 郑保卫 (23)	陈力丹 (63) 喻国明 (28)	尹鸿 (30) 蔡雯 (23)	詹正茂 (14) 夏倩芳 (12)
CNKI 被引篇数	蓝鸿文 (16) 朱羽君 (14)	刘建明 (49) 童兵 (36)	陈力丹 (146) 喻国明 (90)	蔡雯 (53) 尹鸿 (29)	赵曙光 (15) 朱春阳 (14)
CSSCI 被引篇数	方汉奇 (39) 朱羽君 (16)	李良荣 (36) 刘建明 (33)	陈力丹 (86) 喻国明 (80)	陆晔 (34) 尹鸿 (29)	谢 静 (10)
CNKI 被引次数	朱羽君 (50) 方汉奇 (44)	李良荣 (210) 童兵 (146)	陈力丹 (553) 喻国明 (480)	蔡雯 (224) 匡文波 (164)	陈阳 (57) 廖圣清 (48)
CSSCI 被引次数	方汉奇 (177) 甘惜分 (47)	李良荣 (159) 刘建明 (104)	喻国明 (214) 陈力丹 (189)	胡正荣 (89) 陆晔 (72)	

另外，该研究结论表明：CSSCI（2001-2005）单篇最高被引次数的文献依次是：《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学大辞典》、《新闻学概论》（李良荣）、《传播学引论》（李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传播学原理》（张国良）、《传播学总论》（胡正荣）、《媒介的市场定位》（喻国明）、《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郑兴东）、《大众传播学总论》（张隆栋）。

最后是获奖情况。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奖项中，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是“吴玉章奖金”。它是为纪念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先生，于198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主要用于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至今已颁发五次。历届吴玉章奖金获奖成果中，新闻传播学类著作（见附录二）获得一等奖的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报纸编辑学》（郑兴东，1988）、《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2005）。

另外，在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②中（见附录三），新闻传播类唯一的一等奖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获得二等奖的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1994）、《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白润生编著，1994）、《面向新闻界》（蓝鸿文，1995）、《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曾建雄，1996）、

^① 该项研究所分析材料的时间段为：CNKI（1979-2006）、CSSCI（2001-2005）。括号内的数字为发表论文的篇数。参见周俊执笔：《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以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者为观察单元》，《国际新闻界》，2007(5)：17-22。

^② 教育部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1995年为第一届。奖项分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类，按一级学科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调查报告《新闻宣传质量评估标准调研、设计与论证》（曹璐、雷跃捷等，中宣部新闻局采用，1997）、《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郑兴东，1999）、《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殷晓蓉，2000）、《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吕新雨，2003）、《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

就学术评价来说，不管是推荐书目、引证分析还是各类评奖，都有其各自的判断标准，也都有各自局限，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某一成果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管是在整个学术界，还是在新闻传播学界内，新闻史研究都得到了较高评价和认可，尤其是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一是与新闻史背靠历史学这个“大山”有关，二是与新闻史研究离政治稍远有关系，新闻理论、新闻法制，尤其是新闻自由方面的研究由于涉及敏感领域而很少出现在各类奖项中；（2）除新闻史著作外，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经营和管理等领域也都有相应的代表性著作和研究者，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在整体上是有所提升的；（3）从以上不同途径得出的结果来看，它们之间的重合度很小。这表明，在学界具有普遍认可度的经典著作还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不够成熟。

2) 大学里相应的建制与研究生课程组合

1978年,我国新闻传播本科生与硕士生教育同步恢复。1985年,新闻传播学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新闻传播学有了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到661个、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新闻传播学在高等院校的建制已经完成,规模已经相当大,且正在保持高速增长。

研究生课程方面。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我国在事实上执行的是“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模式(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通常注重个别化的指导,强调科研训练(博士生基本上以研究为主),而不是课程训练。各个培养机构关于研究生课程及其组合的设计差异较大,但一般可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下面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三校新闻学博士课程设置情况:

表 6.2 复旦、人大、武大三校新闻学博士专业课程设置^①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新闻传播学总论	方法课 (抽样调查的理论与应用、计量经济分析、经济模型、经济中的优化方法、科学与逻辑方法论、时间序列分析、统计模型及应用)(至少选一)	中外经典新闻著作导读
社会科学前沿		新闻传播与文化研究
比较新闻学研究		国际新闻传播思潮研究
新闻思潮研究	学科前沿课 (法学前沿、经济学前沿、史学前沿、哲学前沿、政治学前沿)(至少选一)	媒介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与媒介生态变迁		当代新闻实务研究
新闻法研究	专题讲座课(新闻传播前沿讲座、新闻传播学研究专题讲座)(至少选一)	
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研究生指导课 (新闻学研究导师指导课(二)、新闻学研究导师指导课(一))	
广播电视专题研究		
视觉文化传播研究		
媒介管理研究		
媒介伦理研究		
西方新闻传播学说史		

由上表可见,三校新闻学博士课程差异较大,同是新闻学专业因研究方向不同也有较大差异,但都注重开设名之为“研究”的课程,注重其他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 专业研究者、专业出版物和研究基金

据统计,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约1万人,其中教授约1000人。^①由于

^①参见: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研究生课程简介, http://www.gs.fudan.edu.cn/cultivate/cultivate4_JOUR.htm;中国人民大学06级博士培养方案, http://xk.ruc.edu.cn/xk/pyfa/fake_b_dy_2006.asp?pyfadm=200513305030110;武汉大学新闻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计划表, <http://www.gs.whu.edu.cn/ziye/teach/peiyfa.htm>。

高等院校在职称评定、晋级时普遍把科研成果当作硬性的标准，所以高等院校的教师基本上都可以视为研究者。另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专职研究人员、大众传媒机构研究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在读博士生等等，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人员在总体规模上也已经很大。

专业出版物方面，有《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界》、《当代传播》等专业学术期刊，还有《中国记者》、《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以业务研究和经验交流为主的专业期刊。

研究基金方面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各类研究资助、各省市社科科学基金、各省市教育部门研究资助等，还有部分大众传媒机构自设或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总的来看，政府是新闻传播研究资助的主要提供者，民间资助一般表现为横向委托项目，但注重应用研究且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除重大基础性研究外，政府导向下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为数不少。

综上所述，从外在标准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外部建制的完善与内部知识体系的孱弱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状态。外部条件的充分实现给我们进一步完善内部知识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它并不能说明内部知识体系本身已经成熟，对此我们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6.2 推进新闻改革

6.2.1 1942 和 1956 年两次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

新时期的历史也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有限开放是加入 WTO（2001 年 12 月）以后的事；改革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主调之一。喻国明的话也许有代表性：

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在的体制到我们的灵魂。改革与时代遭遇，我们与改革同行。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追随改革、投身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人

^① 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新闻记者》，2007（1）：62-64。

生理念和近乎宗教般的研究主题。^①

本书关注的是，新闻改革与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研究者如何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来参与新闻改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回顾一下新时期之前的两次改革，一是 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是 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以考察学术界在其中的作用，并与新时期新闻改革中学术界的参与情况相对比。

从历史背景上看，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与“整风运动”一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结果是解放日报成为“一张真正的、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②经过改版的解放日报在思想、组织上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绝不是一张普通的新闻纸所能比拟的”。^③由于改版之前缺乏对新闻学大规模的研究，改版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而且是“比较集中的、深入的大胆探索”。^④围绕改版而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文章，如社论《致读者》、《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党与党报》以及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等，都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经典文献和理论基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新闻学的论述。“如此集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又转过来指导实践，不但是史无前例，就是在此后 50 年中，也没有再度兴起这样新闻学研究的高潮。”^⑤当时并无专业新闻研究者，宣传战线上的主要领导既是新闻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又是新闻研究的主体，这种“两位一体”的状况带来的是新闻改革与新闻研究高度互动。

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是在由革命到建设、由全面学习苏联到开始独立自主、从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到重新看待、重视知识分子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⑥改版的侧重点是如何做到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以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改版也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由人民日报社主要领导人如胡绩伟、邓拓具体操作落实的。宣传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如胡乔木、陆定一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但三方的意见并非一直是一致的。中央对这次改版开始是支持的，但态度、意见不统一、不稳定。因此改版过程中，具体执行者对中央政策往往

^①喻国明：《境界决定价值》，载于王永亮等编著：《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75-491 页。

^②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50 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 57 辑（1992 年 6 月）：132-154。

^③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④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50 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 57 辑（1992 年 6 月）：132-154。

^⑤王敬：《党报史上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50 周年》，《新闻研究资料》，第 57 辑（1992 年 6 月）：132-154。

^⑥王晓梅：《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 4 月。

要靠揣摩、试探,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双方分歧越来越大。这次改版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在理论上的探索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这些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改版准备阶段所做的读者调查、报送中央的改版报告,以及改版实施阶段的社论《致读者》(195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其中改版报告“是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①即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所形成的“完全党报”模式的突破,探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报纸的功能。与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一样,人民日报的这次改版既是全国报纸改革的一个代表,又带动了全国报纸的竞相改革。^②

这次新闻改革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的关系。这个时期,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最前沿的探索是王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命题,如“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具有宣传工具和商品两重性、报纸发展的几个规律等。实际上在人民日报改版之前,王中已提出报纸的两重性问题:

所以,我说报纸还是两重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决议当中提到,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日报》改版后,也这样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共产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③

余家宏、丁淦林认为,由于教学改革和新闻改革的需要,王中开始研究新闻理论。王中主张,“报社一有动作,新闻系教师就能对它作理论分析,并预见它的发展趋向”。^④王中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集中在1956年初至1957年7月,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是同步的。1956年7-8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回来后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新闻学概论》。^⑤丁淦林认为,王中的新闻观点和主张,“是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新闻改革理论家”。^⑥虽然我们不能从相关文献中直接找出这次改版与王中的新闻观点和理论有直接关系,但从时间、王中的论述、其他学者的研究等侧面来看,仍然可以认为二者有密切关系,包括改版的失败和王中新闻观点被错误批判。专业新闻研究者的研究直接促进新闻改革,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所没有的。虽然“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但一旦把握住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

^①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1988年9月):1-47。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③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④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

^⑤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⑥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理论研究仍可以预测、指导新闻实践。这也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

6.2.2 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三次跨越与新闻传播研究的互动

与上述两次新闻改革相比,新时期的新闻改革特点是,改革是传媒业自发进行的,并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步。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的中心议题是对传媒功能的重新定位,90年代则是对传媒性质的重新定位。^①在时间阶段上,新时期以来的新闻改革除了1990前后有所间断外,几乎是连续的,没有像上述两次改革那样具有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在社会变革影响甚至决定下的新闻改革,在不同阶段新闻改革有不同的诉求,从而呈现出特定的阶段性。

关于新闻改革阶段的划分,李良荣及其指导的博士生李晓林、林晖的划分方法具有代表性。李良荣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改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初-1982),新闻媒介的拨乱反正期;第二阶段(1983-1986),信息概念引进,新闻媒介功能重新定位;第三阶段(1987-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第四阶段(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反思阶段,重新确立党报党性原则的权威;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新闻事业属性的重新界定。^②后来,李良荣提出“三次跨越”的划分方法:第一次跨越为“高扬新闻规律旗帜”(1978-1982);第二次跨越为“引进信息概念”(1983-1991);第三次跨越为“重新认定新闻事业性质”(始于1992年)。^③上述第一种划分方法突出新闻改革在时间上的进程,比较细致;第二种则突出新闻改革的业绩,或累积上的变化,偏于宏观,但两种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按照第二种思路,林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新闻业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特点”的新一轮改革阶段。^④这一阶段以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时间上的标志。如果再细分的话,2002年底加入WTO显然也可以称为我国新闻改革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包括传媒集团成立、入世影响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改革究竟如何发展下去,尚需“再观察”,而不是匆忙地下结论。前面几个阶段的新闻改革目前也并非“完成时”。旧的改革尚没完成,新的改革业已开始,各种诉求混合在一起恰恰是新时期我国新闻改革的特征之一。

^① 李良荣:《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②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春):3-8。

^③ 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6):11-12转18。

^④ 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根据本书关于研究主体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实务场域和政治场域不再像 1942 和 1956 年新闻改革之时结合地如此紧密,前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改革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新闻改革引发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同时新闻传播研究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为其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上、观念和舆论上的支持。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题内容之一,本书已在前面有过叙述,不再赘述。下面我们将考察的是新闻传播研究如何推动新闻改革。

新闻传播研究推进新闻改革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直接的,例如政府或大众传媒机构采纳了某项研究,或委托研究人员开展某项研究并提交报告,或者交由研究人员直接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等。如中国传媒大学曹璐曾完成中宣部新闻局委托课题:“新闻宣传质量评估标准调研、设计与论证”、“四家电子媒介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情况及北京地区受众反馈的调研报告”、“新闻宣传质量评估体系课题研究报告”等^①。再如,中宣部新闻局于 2007 年 2 月 6 日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来感谢信,认为郑保卫教授的论文和发言“见解独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为相关报告的起草“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素材”^②。郑保卫还曾主持完成中宣部委托的三项课题:《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比较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新闻学热点问题研究》^③。三项研究都切中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由此可见,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领导层还是非常愿意听听学术界的意见的。二是间接的,研究成果经过扩散转化为一种“常识”,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进而演化为一种观念,促使政策、法律的出台,最后成为一种制度。

我们不难找出学术研究“直接”推动新闻改革方面的例证,但就学术研究的整体价值和意义而言,“间接”推动却是一种“常态”。笔者认为,关于新闻改革“合法性”的论述是新闻传播研究推动新闻改革的主要表现。合法性论述是任何行动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对新闻改革的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这里的“法”并非完全指向现成的法律法规,而是指向新闻改革的“必要性”、途径以及对新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创造性阐释。

(1) 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主要有四条途径:一

^① 参见 http://www.bjpopss.gov.cn/asp_xxgl_400/ReadEI.asp?ID=3217。

^② 载于 <http://www.rdxwjd.org/displaynews.asp?id=64>。

^③ 参见 <http://www.rdxwjd.org/more.asp?id=18>。

是新闻调查，二是新观念的引入，三是结合法律法规进行理论推演，四是“适应论”。

新闻调查在 1980 年代风起云涌，它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系统收集普通读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民意代表）、社会主流人群、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见，了解他们对新闻事业现状的认识、态度和评价，以回答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其基本假设是“读者需要论”或曰“社会需要论”，新闻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他们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也理应是决定新闻改革的主要因素。因此，新闻调查有将分散的民意集中起来并形成社会舆论的特殊作用。1988 年进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都是民意代表，新闻界则是新闻改革直接涉及到的群体，他们要求改革，表明社会对新闻改革的普遍呼吁和期待。

新观念（往往表现为新概念、新词汇）的引入和普及有利于更新我们对新闻传播事业性质、功能的认识，从而推进新闻改革。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相关概念、原理的引入，如信息、媒介、传播者、受众、反馈、效果^①等。其中，信息概念的引入最为突出。以往新闻媒体较多地属于宣传工具，主要功能是宣教，较多地从党政政治立场和角度出发，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学习。信息，显然是个中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宣教，反而促使媒体向服务工具转向，主要功能是服务。它较多地从受众的立场、需要出发，认为受众是媒体服务的中心，是主动的、有选择权的。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1984 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无疑更刺激了信息热，也鼓舞了以扩大信息量、增强服务功能为主题的新闻改革。它所带来的新闻改革新气象是新闻传播事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多样化以及信息量的增大。相应地，新闻从业人员的观念也从传播本位向受众本位过渡，竞争意识加强，尝试在内部体制、机制和采访、发行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

危机传播研究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是另一个力证。长久以来，在突发“负面”新闻报道中，我们的思路是不报、迟报或报喜不报忧。2003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全国肆虐，北京成了重灾区。后来发现，信息瞒报是导致北京灾情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机传播、信息公开、民众知情权等成为

^① 与此相反的概念（或观念）是：宣传、宣传工具、教育者、被教育者、没有反馈（很少反馈）、想当然地认为是立竿见影的直接的强效果。

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深感媒体报道的不作为，建议从报道观念、机制和制度上进行改进、改善，并立法予以制度上的保证。从 2004 年起，“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介入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研究、培训和评估，许多研究成果得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重视并在政府新闻发布实践中得以运用”。^①学界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200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媒预警研究》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在新华社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同时指示国务院办公厅通过社科管理部门向课题组调阅成果原件。^②2007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制度。从“非典”爆发到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新闻传播研究功不可没。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切入论述新闻改革的必要性，这方面的代表是孙旭培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他“力图从宪法中找到改革的法律依据，从革命导师和领袖的思想中找到新闻改革的法律依据”。^③孙旭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母法”，“自然也是新闻立法和新闻决策必须遵循的依据”，^④而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有关新闻自由、报刊自主以及其他对今天新闻改革有启发的思想观点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⑤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必然趋势。因此，新闻改革、新闻自由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制于并反过来影响社会整体功能的实现。回顾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会发现，经济、教育、文化等各子系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相比较而言，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被戏称为最后一个“国企”、“堡垒”。当然，这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如今，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中国加入“WTO”、社会的急遽转型都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深化改革，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2）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论述。新闻传播事业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在政治体制没有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新闻体制改革随时都有可能陷入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新闻传播学者通过创造性论述，为新闻改革的推进起到了化解疑惑、鼓舞士气的作用。

一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1992 年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

^①李晓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 3 月。

^②邵振纲：《我校“传媒预警研究”课题成果引起中央重视》，<http://www.ccnu.edu.cn/xinxi/display.asp?id=1880>

^③方汉奇：《序一》，载于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④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2 页。

^⑤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7 页。

地视察，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同年12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这轮改革的中心。一直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宣传工具、事业单位的新闻传播业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功能的有效发挥要求它必须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依赖财政拨款的传统事业操作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新闻传播的信息产业属性开始凸显。另一方面，新闻事业又必须确保发挥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如何兼顾这两方面，是这阶段我国新闻改革的突出矛盾。“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性”以及相应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提出无疑是最佳的折中性论述：它在给新闻传播事业定性（事业性）的同时，也指出其在具体运作上可以采用企业化模式。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对已经走向市场的中国传媒业实践的一种追认”，但它“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①另外，由于这一提法本身存在太多“灰色地带”，所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如何把握事业与企业之间的“度”，都不得不由媒体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可依循，主观部门随意性较大，而新闻媒体则小心翼翼。于是，试探性前行、随时调整，甚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成了至此之后新闻改革的显著特点，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正如李良荣所分析的：“中国的传媒业就处在这样一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境地：它有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权利；它有企业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企业的权利”。^②

针对这种理论上模糊不清、容易被误读的情况，李良荣在反思“双重性”提法的基础上，提出“双轨制”的设想，^③即把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党的喉舌的媒体，一类是非党的喉舌的媒体。它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等方面有共同性，但在运作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得到政府的财政津贴，主要功能是宣传，受众主要是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各级主管等有影响的群体，可以进入市场但不能完全市场化。后者不再是党的工作部门，也不是准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主要功能是信息沟通、提供娱乐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财政补贴或经济支持，实行产业化、企业化运作。这一提法显然比“双重性”更进了一步，更具操作性，也有利于规范媒

^①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②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③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4)：1-4。

体市场,防止党的媒体弱化、竞争无序等实践过程中的弊病。中央也有此设想,^①或者说上述提法源自中央的设想。但现实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仍没有得以解决,作为一种设想,尚有待观察。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本身并非一个科学的概念或理论,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为新闻改革,尤其是突破“事业”这个单一视角,在理论上赋予了合法性,促进了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给新闻媒介带来了自身发展的动力”。^②

二是“边缘突破,渐进改革”。“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中心显然是指新闻传播体制。“边缘突破”是指新闻改革往往首先在距离新闻传播体制较远、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③“渐进”是相对于“激进”而言的。“激进改革”可参照1988年前后疾风暴雨式的新闻改革。“渐进改革”是指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必须是逐步推进的,以时间换空间。“渐进”,并非“不进”,也不能偏离“中心”这个目标。“边缘突破,渐进改革”既是对我国新闻改革路径和逻辑的总结,又是学界积极提倡和用心呵护的共识。新闻改革必须走渐进改革的路线是由我国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所决定的。

新闻改革要渐进,但新闻传播研究必须彻底,这是科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理论必须彻底,实践可以渐进”是孙旭培关于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改革实践关系的概括。“不能因为现在实践中间还不能完全做到,于是就把理论给扭曲了来迎合现在的需要,这样做,理论就丧失了科学的品格,就成为实用主义的婢女。”他还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起码应该有一些提前,而当今“我国的新闻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理论,新闻改革呼唤新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④但总体上看,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大众传媒机构,目前对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采纳仍非常有限。艾丰在1989年曾有过如下判断:

就整个新闻学来说,我认为它现在仍处在应该“自吹自擂”的阶段。“新闻无学”的说法,虽已大大减弱,但对新闻学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新闻学的研究,新闻学的基础理论,都还显得相当薄弱;新闻学的普及,普及到决策层,普及到全社会,更是个艰巨的任务^⑤。

近20年过去了,这话似乎仍没有过时,尤其是“普及到决策层”。但这不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学者悲观的理由,而应该成为他们负重前行的动力。尽管理论前进几大

^①李长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3(9):3-9。

^②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③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④孙旭培:《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载于王永亮等主编:《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21页。

^⑤见《新闻采访方法论》《第二版 序言》,第4页。

步，实践只前进一小步，但这仍不失为理论研究的胜利，否则实践可能连一小步也不前进。

总之，新闻改革是新闻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效果的外在体现之一。尽管我们不能“一一对应”式地指出究竟哪些研究促进了哪些改革——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推动社会进展以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上，新闻传播学尽管无法与法律、社会、经济、管理等学科相提并论，但比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我们还是能从中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

积极构建学科和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两大主线。以“媒介”为核心概念构建理论体系是最近 10 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发展变化的最明显特征，但它与以“党报”、“新闻事业”、“新闻”为核心概念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杂存共处。新闻传播边缘、交叉学科的建设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之一，虽然新学科本身不成熟、尚在发展中，但它可以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确立和成熟。

关于新闻改革“合法性”的论述以及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论述是新闻传播研究推动新闻改革的主要表现。对新闻改革必要性的论述主要通过四条途径：一是新闻调查，二是新观念的引入，三是结合法律法规进行理论推演，四是“适应论”。对新闻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的创造性阐释主要表现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提出以及“边缘突破，渐进改革”的倡导。

7 结 语

以上,本书首先分阶段叙述了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接着分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分别展开论述。下面将对 30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作一总结,作为本书的结语。

7.1 主要成就

(1)摘掉了“新闻无学”的帽子。新时期伊始,新闻学被扣上“无学”的帽子。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新闻传播学于 1997 年升为一级学科,成为我国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独立的一员。这既是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又是新闻传播研究者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的结果。

(2)建起了学术梯队。新时期之初,新闻传播研究队伍规模小,知识结构单一,与国外学术交流有限,视野狭窄。时至今日,我国具备了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规模庞大,师资相应增多。教师、硕博研究生、社会科学院系统专职研究人员、大众传媒机构专职研究人员等,都是学术研究队伍的有机构成。他们学科背景合理、视野开阔,有利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初步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尽管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具体名称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但其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看,由新闻学、传播学和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成。

(4)在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不管是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还是在国家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和奖励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体系中,新闻传播学已经拥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 1997 年被提升为一级学科之后。

(5)拥有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术资本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学者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的最重要资本。这种变化和努力的结果,使得我们拥有了《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采访方法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精神交往论》、《新记〈大公报〉史稿》、《华夏传播论》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可。

(6)学术研究效力得以初步显现。比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决策部门和

大众传媒机构的重视，进而对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

7.2 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变化的特征

(1) 阶段性发展特征。我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为摘掉“新闻无学”的帽子而努力。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焦点是新闻改革。不管是新观点的提出，新方法的应用，还是新学科的建构，中心目的只有一个：为新闻改革鼓与呼。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政治风波陡然扭转了学术生态和学术旨趣，从强烈的现实关怀转向知识本身的探寻。正是通过这个阶段的潜心研究，才有了当今一大批代表性研究成果的面世，并为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奠定了基础。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研究队伍扩大，理论与业务研究开始分野，新闻传播研究一时炙手可热。总之，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与我国社会、新闻传播事业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密切相关。

(2) 研究主体的变化。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缺乏独立性，拥有政治资本和实务资本是研究者得以进入学术场域的主要凭借。这种状况至1989年仍没有太大的变化：研究者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实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研究者为主。1989年的政治风波促使1980年代“五四”式启蒙知识分子发生裂变，学术资本成了在知识界立足并拥有影响力的重要资本。随着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不断成长，尤其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更多的新闻学院崛起，研究主体的结构开始多样化，有限资源的争夺使得新闻传播学术行政化色彩渐浓。总的来看，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的最关键的资本。

(3) 研究内容的变化。总体上看，学院内的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慢慢由实用性研究转向理论研究。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有三个：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业界的发展变化总是能迅速引起学界“围攻”式关注，而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总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二是国家的规划和引导。早期表现为对领导人讲话、政府宣传政策“正确性”、“重要性”的论述，后表现为紧跟各项课题项目规划的指引；三是学术自身的积累。研究积累的结果是使研究不断精细化、深化。

(4) 研究方法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新时期之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得以恢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闻传

播研究无法深入的困境使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浮出水面,而此时正是新闻传播学术走向繁荣和成熟之时。这说明,研究方法 with 新闻传播学术自身积累密切相关。总的来看,传播学的导入对带来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更新,但思辨研究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2000 年之后,一大批博士生在论文中开始尝试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开始多元化。

总之,纵向来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在过去 30 年内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回归学术自身”。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有过一段“为学术而学术”、“纯粹新闻学”阶段,^①但由于其知识本身的有限性,学术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开辟新知识、探索新领域。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向学术回归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使得知识本身越来越复杂,开始从零散的研究领域向理论化、体系化和学科化发展,积极构建学科是其显著特点;二是新闻传播研究逐渐从依附于政治话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学术场域开始建立自己的逻辑法则。

7.3 亟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 新闻传播研究如何深入?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取得的进步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把它与我国其他学科^②(如社会学)或者海外新闻传播研究相比时,更能发现这一点。甚至,发展越快越容易促使其把问题和不足主动、加速暴露出来。

(1) 研究主体方面。政治因素依然对新闻传播研究者有很大影响,有限的学术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导致人为制造学术影响力;1990 年代以后,基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建设性的、正常的学术批评缺失;学术期刊操作不够规范,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发挥引导和评价作用;学会呈现出泛行政化色彩,没有起到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的功能。

(2) 研究内容方面。新闻理论方面,新闻传播的事业性存在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核心,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致使视野狭隘,长期围绕性质、属性、本质等概念打转转。新闻史方面,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正寻求突破。新闻

^①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 页。

^②2001 年,在 CSSCI 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排序表》上,排名第 1 的《经济研究》影响因子是 3.0040,而同年在“新闻学科”排名第 1 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影响因子是 0.1553,约为《经济研究》的 1/20,排在第 150 位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影响因子 0.1591)的后面。而该年度的源刊总数是 419 种。根据杜骏飞的研究,1998-2006 年间,在 24 个学科中,“新闻与传播学”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平均值为:0.077761538,在所有 24 个学科只能列入第 19 位,与全部学科的总计平均值(0.168748333)相比,也不足其二分之一。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参见杜骏飞:《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 CSSCI 的次级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07(1):104-124。

传播业务研究多为经验总结,如何理论化仍处于尝试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对策性研究不仅缺乏理论性,也缺乏实践指导意义。以广播电视为核心的媒介文化研究则有陷入双重依附性的危险。传播学研究则需要回答如何在不失本土关怀的前提下又能实现国际化这一问题。

(3) 研究方法方面。直至 1990 年代中期,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充分讨论,但仍存在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强的问题。

(4) 研究效果方面。在理论体系建构上,新闻传播学虽然已发展成为一级学科,但研究不够深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秘密。所谓不够深入,主要表现为:第一,缺乏理论深度的业务研究太多;第二,重复性研究太多;第三,宏观研究太多。至于不够深入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不够,受政治等外围因素干扰依然较多,人为地设置一些学术研究禁区、地雷;第二,在研究目的上过分讲究“直接的”实用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不讲究学术规范,不重视研究方法,随意性较大;第四,在学术评价上,缺乏严格的评审机制,或多或少地参杂着政治标准和长官意志。在实践上,学界虽然对新闻改革有过深入和严谨的论述,但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还仅仅限于新闻观念、报道方式、常用语汇、经营管理方式等外围层面,媒介体制、新闻法、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中心层面尚与学界的期待有相当距离。

从纵向上看成绩巨大,从比较的视野看问题多多。对此,学界表现出相当大的焦虑与不安,甚至有盲动的情绪和行为。这时,我们应认识到知识本身的增长与学术积累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倡导回归学术本身:首先,要尊重学术自身逻辑,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的原则,减少外围因素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干预;其次,要对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有个清晰、准确的认识,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注重学术积累,注重知识增量意义上的研究;再次,要遵守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将学术研究建立在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上;最后,要认识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在为新闻传播实践服务,摆脱过去那种简单化的、直接的、一一对应式的实用性研究学术价值观。这些关系、矛盾、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前提。

当然,“学术史研究不是‘点金术’,也没有提供‘答案’,这只是一个重新寻找立足点的‘过程’”。^②但愿本书能为研究者在寻找新的研究“立足点”时提供些许参考作用,

^①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于《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8 页。

^② 陈平原:《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那将是本书最大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 [1] Berelson. B.(1952).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2] Cooper. Roger、Potter. W.James、Dupagne. Michel(1994). A status report on methods used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Journalism Educator. Columbia: Winter 1994.Vol.48. Iss. 4; pg.54.
- [3] Craig W Trumbo(2004).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81. 2; pg. 417
- [4] Holsti. O.R.(1969).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 [5] Kamhawi. Weaver(2003).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80 to 1999.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Spring 2003; 80. 1; pg. 7
- [6] Kerlinger. F.N.(2000).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7] Lasswell. H.D.(1948).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Edited by L. Bryson).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s
- [8] Lindlof. Thomas R. (2002)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2nd ed.). CA; Sage Publication.
- [9] Merriam. S. B.(1998).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 [10] McQuail. Dennis and Sven. Windahl (2nd. 1993)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Longman Inc..
- [11] Merton. Robert K. and Patricia L. Kendall(1946). The Focus Inter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1(6):541-557
- [12] Rogers. Everett M.(1969).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13] Rogers. Everett M.(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Beverly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Hills. CA: Sage.

- [14] Schramm. Wilbur(1958). Twenty Year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1(Spring. 1957). pp.91-107
- [15] Schramm. Wilbur (1964).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Stempel. G.H.(1952).Sample size for classifying subject matter in dailies.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29 (3): 333-334.
- [1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 November 1997
- [18] Wengraf. Tom (2001).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Biographic Narrative and Semi-structuredv Method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9] Yin. R.(1994).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shing
- [20] [法]布迪厄著, 包亚明译: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21] [法]布迪厄、华康德著, 李猛、李康译: 《实践与反思》,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 [22] [法]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23] E·M·罗杰斯著, 殷晓蓉译: 《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 [24] [美]T. S. 库恩著, 纪树立等译: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25] [美]T. S. 库恩著, 金吾伦、胡新和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26]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著, 顾昕译: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27] [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 辛欣译: 《创新的扩散》,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 [28] [美]华勒斯坦等著, 刘健芝等译: 《学科·知识·权力》,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29] [美]罗伯特·K·默顿著, 鲁旭东译: 《科学社会学散忆》,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 [30] [美]罗杰·D·维曼等著, 金兼斌等译: 《大众媒介研究导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31] [美]迈克尔·埃德里, 埃德温·埃德里著, 展江、殷文主译: 《美国新闻史》, 新华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版社 2000 年版。

- [32] [美] 韦尔伯·施拉姆著, 金燕宁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 [33] [英] K. R. 泊珀著, 查汝强、邱仁宗译:《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34] [英] 贝尔纳著, 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 [35] [英] 丹尼斯·麦奎尔等著, 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 [36]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2 年版。
- [37]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下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
- [38] 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 工人出版社出版 1985 年版。
- [39] 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 [40] 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版。
- [41] 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 沈阳出版社 1989 年版。
- [42] 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43] 陈平原:《学术随感录》,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44]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45]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46] 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年版。
- [47] 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48] 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49] 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50] 戴元光、苗正民:《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51] 戴元光:《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52] 戴元光:《戴元光自选集——传学札记:心灵的诉求》,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53] 戴元光:《中国传播思想史(现当代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5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55]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版社 2004 年版。

- [56]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 [57] 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58] 丁柏铨等著：《加入 WTO 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 [59] 丁学东编著：《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60] 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
- [61] 方汉奇、陈昌凤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62] 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 [63]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64]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6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6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3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67] 风笑天主编：《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 [68] 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69] 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 2005 年版。
- [70]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71] 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 4 月。
- [72] 郭星寿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73] 何梓华主编：《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74] 胡黎明：《“焦点现象”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 [75]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76]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编：《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出版，1988 年。
- [77] 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8 年 5 月。
- [78] 黄道弘：《新闻边缘学科概论》，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
- [79] 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80] 金民卿：《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81] 景天魁:《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82]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 [83]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84] 李承贵:《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85] 李承贵:《通向学术真际之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86] 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5 年 10 月。
- [87]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 [88] 李良荣:《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89] 李良荣:《新闻学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90]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91] 李秀云:《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92]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 [93] 林崇能:《两岸进入 WTO 后的都市有线电视经营——以高雄与上海为例》,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4 年 4 月。
- [94] 林德海主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 [95] 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 巨流图书公司 2004 年版。
- [96] 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97]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 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 [98] 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99]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100] 刘卫东:《信息论与新闻》,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 [101] 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102] 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
- [103] 刘智:《新闻文化学》, 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 [104] 刘仲林主编:《跨学科学导论》,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105] 陆定一:《陆定一新闻文选》, 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 [106]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107] 阎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8] 罗以澄:《罗以澄自选集——新闻求索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09] 满运来主编:《传媒·思考·新世纪:首届京沪新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
- [110] 宁树藩:《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111] 潘家庆:《大陆新闻学的发展与评估》,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
- [112] 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113]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114] 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 [115] 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116] 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17] 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118] 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年版。
- [119] 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 [120] 童兵:《童兵自选集——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21] 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22] 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123] 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 [124] 屠忠俊:《报业经营管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 [125] 虞继光:《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
- [126] 王全林:《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3月。
- [127] 王任重:《王任重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 [128] 王石番:《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
- [129] 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
- [130] 王益民:《系统理论新闻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131] 王永亮、成思行主编:《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 [132] 王永亮等编:《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 [133] 王永亮等编著:《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4] 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135] 翁秀琪主编：《台湾传播学的想像》，巨流图书公司 2004 年版。
- [136]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37]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138] 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139]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年版。
- [140] 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
- [141] 杨保军：《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142]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43] 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44] 杨玉圣、张保生：《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 [145] 叶继元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46] 尹鸿：《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47]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 [148] 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49] 喻国明：《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人的理论告白》，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50] 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151] 张国良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52] 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153] 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3 年版。
- [154]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155] 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56] 郑西帆：《转型时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4 月。
- [157] 中共中央编译局主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1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9] 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3 年版。

附录 1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大事记(1978-2007)

1978

1 月

同月 我国著名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复旦大学王中在“反右”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理得到改正，对新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启了认真探讨新闻学理论的新风气。

6 月

12 日 经邓小平、李先念同志批复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同时成立的还有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研究所是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在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中起了很好地组织和骨干作用。

9 月

同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整体并入；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也开设开办新闻学课程、专业或学系。在过去的 1977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恢复招生。

同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

12 月

同月 《新闻战线》复刊，它面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和广大新闻爱好者，是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交流的综合性刊物。《新闻战线》1957 年 12 月创刊，1960 年 8 月更名为《新闻业务》，1966 年 5 月停刊。

1979

3 月

8 日 本日至 21 日，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自 1957 年 3 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二十年后召开的一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鉴于“文革”期间基本的新闻学理论被搞乱了，不少同志提出要“改变二十年来新闻理论的混乱状态”。

5 月

同月 《国际新闻界》复刊，它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注重报道国际新闻界动态、研究国际新闻界问题，后经过改版逐步发展为一份学术刊物。

6 月

同月 《新闻战线》第 3 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开展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阐明了新闻学的定义、开展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和我国建国 30 年以来新闻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等。

7 月

同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发表文章《重新评价王中新闻理论》（朱光明）。1950 年代中期，王中提出“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产物，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报纸两重性”、“读者需要论”等观点。后被贴上“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封条，他本人也被打为“右派”。随着王中的平反，他提出的上述观点得到重新评价。文章指出，“新闻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认为“没有学术民主就没有新闻学的繁荣”。

8 月

同月 《新闻研究资料》创办，它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前 5 辑不定期出版，1981 年起改为季刊，以新闻资料收集和研究为主。1990 年起增加新闻理论、传播学等理论研究论文。1993 年 9 月终刊，共出版 61 辑。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月

同月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由北京广播学院主办，创办之初是内刊，是综合性、学术性和业务性期刊，1983年2月起公开发行，以后逐步发展为以广播电视业务和理论研究为主的大型学术期刊。

10月

6日 本日至13日，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举行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新闻学组的会议上，与会人员批判了陈伯达、康生否认新闻学是科学，甚至取消大学新闻系的荒谬主张，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应大力开展新闻学研究。

1980

1月

同月 新华社党组决定成立新闻研究部。

2月

6日 北京新闻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包括首都新闻界老前辈、著名学者和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等400多人与会。胡乔木作了长篇讲话。会议选举胡绩伟为会长。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新闻学会，是“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由于北京市新闻学会的成立，该学会于1984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

3月

20日 《新闻学会通讯》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北京新闻学会主办，全国性新闻学术期刊。1983年由不定期出版改为半月刊，1984年1月改为月刊，1989年下半年停办。

31日 北京新闻学会举行学术座谈会，学习和研究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论述。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历史证明，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论述是正确的。

4月

15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召开的编写新闻史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萨空了、方汉奇等参加。会议就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编写中国新闻史的指导思想、新闻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分期问题等举行了探讨。

5月

5日 本日至12日，由《陕西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和《甘肃日报》共同举办的新闻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来自40个单位的8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十年文革之后我国新闻界规模较大的一次学术盛会。会议围绕报纸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的真实性，报纸的指导性，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等举行了深入探讨。这次会议拉开了新时期新闻学术研究的帷幕。

同月 《新闻学论集》创刊。该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新闻学学术丛刊，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富有见地的学术性论文。

8月

8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恢复活动。

9月

10日 北京新闻学会新闻理论研究组就新闻价值问题举行学术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郑兴东宣读了《论新闻价值》一文。

同月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

12月

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举行全国新闻理论讨论会。讨论会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所著《新闻学理论基础（初稿）》一书，结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关系、媒体是阶级舆论工具还是社会舆论工具以及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等作了热烈讨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1 日 黑龙江首次新闻理论学术讨论会举行，中心题目是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

1981

1 月

28 日 北京新闻学会在《北京日报》社举行报纸经营管理座谈会，目的在于探讨首都各报管理情况和问题，交流经营管理经验，研究新闻经济学。时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发表了《我们能不能建立一门新闻经济学》的长篇讲话。

5 月

同月 《新闻大学》创办，它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是一份侧重理论研究的新闻学术刊物，王中任主编。

6 月

同月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学术界称为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中国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通史专著。

7 月

23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共同召开的全国新闻史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在方汉奇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等书的基础上，就如何研究和编写中国新闻史举行了座谈，方汉奇、宁树藩、钟紫、戴邦、赵玉明等与会并作专题发言。

12 月

7 日 本日至 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目的是“交流情况、加强协作、促进科研、早出成果”。据统计，中国大陆已有新闻研究机构 33 个，专业研究人员 300 人。

1982

2 月

同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正式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第一批（81 级）32 人本月入学。与以往三届不同，他们毕业即获硕士学位。第二批（82 级）25 人，同年 9 月入学。

4 月

30 日 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新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施拉姆夫妇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余也鲁的陪同下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并与该所、北京新闻学会举行座谈。

同月 新闻界大型资料性年刊——《中国新闻年鉴》第 1 卷出版。该年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编辑部编辑出版，我国的新闻事业从此有了可靠的系统的历史记载。

5 月

同月 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运用于采访学的研究，分析采访活动所包含的矛盾并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原理研究新闻业务的典范，产生了较大影响。

6 月

8 日 本日至 8 月 6 日，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加的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北京市居民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大型抽样调查。目的是了解读者、听众和观众的需要，为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改革提供依据。这次调查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突破性行动”。

7 月

同月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写于 1980 年 4 月至 7 月，是我国解放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现象的理论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进行的第一次系统化的表述。该书成为当时大多数新闻专业的教材，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在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 多年发行的高峰期，销售 20 多万册。

8 月

20 日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撤销新华社新闻研究部，成立新闻研究所。

11 月

23 日 本日至 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关于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新华社、《新闻战线》编辑部等代表参加。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目前的研究对象、内容、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我们对传播学应采取的态度：“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12 月

本月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加强新闻学研究。

1983

1 月

同月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正式成立，方宣任所长，其前身是新华社新闻研究部。

3 月

10 日 本日至 1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共同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系统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新起点，不仅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认识前进了一步，还有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7 月，会议论文集《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5 月

25 日 本日至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会议。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出台的《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尽快编写出全套新闻学教材”、“教材建设要以科研工作为基础”、“要大力开展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把科研工作和教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同月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传播学（简介）》一书，这是我国关于传播学介绍和研究的第一本著述。

10 月

27 日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正式成立。它是国家级群众性学术团体社团法人，在国内、国际新闻摄影学术活动、学术交往中具有权威性、代表性。

12 月

5 日 本日至 10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七家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90 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部分发言稿收集在 1984 年 8 月出版的《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新闻学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

1 月

13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获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从 1985 年开始招生，首批博士生导师为甘惜分、方汉奇和王中。

3 月

同月 《新闻学简明词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等编写。

9 月

18 日 邓小平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把新闻传播与信息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新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阶段。

11月

2日 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宗旨：交流和探讨我国新闻教育中的经验和规律，提高新闻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温济泽为首任会长。

12月

4日 本日至6日，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山东烟台举行。该会的宗旨是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新闻事业史以及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首任会长为胡绩伟。

1985

2月

1日 首都新闻学会传播学研究组成立。

8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真实性等问题。

3月

1日 中国新闻学会决定3月1日为全国报纸普查日。

5日 中央电视台资料中心研究组主办的电视理论刊物《电视业务》试刊第一期出版。

4月

23日 本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和组织的“关于世界新闻新秩序问题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问题的背景，以及这场争论的性质和意义；世界新闻新秩序问题争论的焦点、所争论的问题和斗争的进展情况以及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前景。

5月

16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安徽日报等发起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学术讨论会”在合肥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新闻真实性的科学含义，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造成新闻失实的原因，批判了“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的错误观点。

6月

20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在中国大陆举行的首次有外国学者参加的传播学讨论会。这次会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传播学的认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已逐渐深入人心。

同月 复旦大学成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设立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研究机构。

7月

同月 《新闻学刊》创刊，它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是全国性新闻学术刊物，钱辛波担任主编。该刊于1989年下半年停办。

1986

4月

21日 本日至26日，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首届学术年会在郑州举行。这是一次新闻学术成果检阅和学术思想交流会。

5月

10日 本日至13日，邓拓学术讨论会在福州举行。

同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等在黄山联合召开首届新闻受众研究学术讨论会。

8月

20日 本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会在黄山举行。会议有两个突出的地方：其一是围绕传播学框架体系展开了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这次会议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会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确定新闻传播学应作为今后主攻方向。

10月

15日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它是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主要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吴冷西当选首任会长。

23日 首都新闻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行新闻学与相邻学科学术讨论会，来自人民大学四个学科（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学科的基本知识，并着重对新闻学如何与这些学科及其他相邻学科加强联系、相互借鉴问题等发表了看法。

同月 大陆第一所舆情与传媒调查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甘惜分任所长。该所于1988年进行了影响广泛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

同年 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面的课题。

1987

1月

1日 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创刊。其前身为该社主办的《新闻业务》、《新闻纵横》和《新闻摄影》。

3月

同月 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之《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

4月

27日 本日至30日，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会在大连召开。

5月

同月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第1卷出版。它是系统、全面、翔实记录、介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和成就的年刊，具有专业综合性、学术性、文献性、资料性和知识性，是权威大型工具书。

6月

6日 人民日报成立新闻研究所。

8日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由中国记协和中国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发展中国家新闻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7月

7日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主办，是广播电视专业全国性较高层次的学术刊物。

10月

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三大报告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根据这些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很快转移到新闻体制改革、舆论监督等问题上。

同月 吴玉章奖金新闻奖第一届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新闻采访方法论》（艾丰）分获一等奖和优秀奖。

同年 国家科委1987年度统计年报工作文件中把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15个学科项目之一，居第11位，并标明了这个学科的具体内容：新闻学总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新闻学流派与学说；新闻法制研究；新闻业务研究；出版业务的应用；电子技术在出版业务中的应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出版事业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史；国外新闻事业史。这被称为在制度上结束了“新闻无学”的局面。

1988

1月

22日 在国家教委组织评选的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郑兴东、陈仁凤、沈史明、包慧等编著的《报纸编辑学》荣获新闻学著作优秀教材一等奖。

4月

24日 中国新闻资料学会在北京成立。

同月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成立。

6月

10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是我国综合大学创办的第一个新闻学院，前身是新闻系。

15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至此，一南一北两个新闻学院的新闻教育和研究格局形成，代表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最高水平，也是两大新闻传播研究重镇。

同月 “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邵培仁、龚炜）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童兵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

7月

22日 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被列为高等教育重点学科点，也是我国首个新闻学重点学科。

9月

5日 本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所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闻改革。

20日 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

29日 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郭镇之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导师是方汉奇教授，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电视史稿》。

10月

16日 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学者萨空了在北京逝世。萨曾于1946年出版《科学的新闻学概论》，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科编委会主任。

27日 本日至31日，“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大会交流的五十多篇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制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等三十门学科。

11月

12日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在贵州省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章程》，孕育四年之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

同月 刘建明著《基础舆论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我国舆论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

12月

16日 本日至18日，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首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目的是开展新闻学研究、培养高级新闻人才。胡绩伟任基金会主席。

同年 “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七五’、‘八五’期间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趋势与对策”被立为“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该课题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组牵头，将联合部分院校和新闻研究机构共同完成，是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科学研究的最大项目。

1989

1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 日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在北京成立，它是我国第一个从交叉学科的角度举行新闻文化研究、教育与开发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首任会长范敬宜，常务副会长艾丰。

2 月

28 日 本日至 3 月 5 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中国记协、中国新闻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新闻传播调查研究方法讲习班在北京举行。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前美国新闻教育协会主席韦弗（David H. Weaver）等任主讲人。

6 月

27 日 “传播媒介上的苏美形象研讨会”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举行，这是美、苏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徐耀魁、刘力群分别撰写了论文并在会上发言。

7 月

同月 《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主编林德海，是对我国新闻学书目的一次系统统计。该书共收录 1903-1987 年 85 年内我国出版发行的新闻学及相关学科方面的书籍 1900 余种。

9 月

2 日 台湾新闻院校大陆访问团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并在该院举行了海峡两岸新闻教育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海峡两岸新闻教育工作者的首次聚会。

11 月

10 日 本日至 30 日，中宣部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机关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研讨班共举办 3 期。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28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1990

1 月

同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主办的《新闻学刊》停刊。

5 月

18 日 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闻书店在北京开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以经销新闻政治时事书籍为主的综合性书店。

8 月

同月 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新闻断代史专著。

9 月

同月 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之初确立的重点课题。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学会集中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 26 位专家、学者，召开了若干次专题研讨会，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完成此书。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11 月

13 日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行建所 10 周年茶话会暨学术研讨会，以后每年举行新闻学术年会。

28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下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为二级学科，但注明可授予文学或法学学位。

1991

5 月

10 日 新闻出版总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公开出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是中国新闻学与出版学的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萨空了担任编委会主任。编写工作起始于 1981 年，历时 10 年。全卷共 1630 个条目、120 万字释文。时间跨度为公元前 3500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日 本日至8日,“全国首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在江苏南通召开。会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印了《全国首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论文集》(1992.4)。

9月

2日 纪念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和张季鸾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国内如此隆重纪念张季鸾尚属首次。

11月

16日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文汇报》报史研究室、《上海新闻志》编委会联合召开抗战时期上海新闻史学术研讨会。

12月

23日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记者、主编、评论家、爱国老报人徐铸成因病在上海逝世。他著有《新闻艺术》、《新闻丛谈》、《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等学术著作和其他一些回忆集子。

同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等人主持的研究课题“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992

3月

同月 广电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常州召开“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全国性的专门会议,全面讨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在我国广播电视史上尚属首次。会议强调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并确定了115个1992-1995年研究课题,其中重点课题22个。

5月

14日 本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浙江广播电视厅、浙江省萧山市3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第二届受众学术研讨会召开。

6月

11日 本日至1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方汉奇任首任会长。

9月

同月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社科课题。全书共3卷25章,约263万字。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是目前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史著作。

11月

同月 吴玉章奖金基金会举行第二届颁奖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兴东等合著《报纸编辑学》(1988年4月出版)获一等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1990年1月出版)获优秀奖。

同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隆栋、傅显明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1988年1月出版)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同月 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六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下属三级学科:新闻理论包括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西方新闻理论、新闻法、舆论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心理学、比较新闻学、新闻理论其他学科;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史、新闻思想史、新闻史其他学科;新闻业务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业务其他学科;广播与电视包括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等)、广播电视播音、广播与电视其他学科;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技术、组织传播学、传播学其他学科。

同月 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的学术专著《报业经营管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为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屠忠俊。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月

21日 北京广播学院苑子熙教授逝世。他曾经编著（包括合著、编）《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1990.2）、《应用传播学》（1991.5）、《漫谈广播电视新闻》（1992.3）。

1993

1月

1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新闻思想与现时代”。

3月

20日 上海市新闻学会组织召开了“市场经济与新闻报道、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199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第一年。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的关系已成为1993年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4月

29日 本日至5月2日，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四川省新闻出版志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同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继续出版，但转为以发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论文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学术期刊。

24日 上海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举行集会，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及80岁寿辰，并就新闻改革问题举行了研讨。

5月

18日 本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无锡日报社和江阴市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研讨会”召开。会后编辑出版了《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论文集。

26日 本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信息传播与改革开放”。

同月 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词典是我国目前收入条目和文字最多的一部新闻学辞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型辞书。

6月

27日 本日至30日，由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一九九三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来自大陆的甘惜分、方汉奇、宁树藩、孙旭培、赵玉明等18位学者与会。这是在台湾召开的首次有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

8月

同月 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1994

1月

24日 本日至2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李鹏、朱镕基、丁关根也到会发表重要讲话。

3月

22日 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举行徐宝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徐宝璜著《新闻学》一书同日再版发行。

4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日 本日至11日,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成都召开。

21日 本日至22日,由中宣部新闻局牵头组织,郑州大学新闻系承办的“新世纪与新闻学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同月 徐培汀、裘正义著作《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专著,被认为是“新闻有学”的最好证明。

5月

25日 本日至26日,中国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新闻心理学的专题学术会议。

10月

8日 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理论家王中逝世。王中(1914.6-1994.10),山东高密人,原名单勛,笔名张德功。曾任《大众日报》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鲁中区《鲁中日报》总编辑、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7年和1958年,他的新闻观点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重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著有《新闻学原理大纲》,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提出“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报纸的两重性”、“新闻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等观点,在我国新闻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2月

同月 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诸多大公报研究中的一部力作,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1995

5月

同月 黄旦著《新闻传播学》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传播学的理论重构新闻理论的著作。

6月

19日 本日至28日,由国家教委高教司主持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新闻教育研讨会,也是一次涉及21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教学方案大致定位的会议。

26日 本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传播与社会发展”。

8月

5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0月

12日 本日至16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华中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95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重庆”的游轮上举行。此后,该研讨会更名为“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第一届研讨会的主题较偏重历史与海外华文传媒,到了第二届则已开始及于传播学各范畴。2001、2003、2005、2007 分别在兰州、厦门、香港、台北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年会,主题分别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研究华夏文明对华人传播的深远影响”、“追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交流探讨世界各地华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发展华文传媒;信守文化多元化原则,传播华夏文明”、“传播伦理问题”。

21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庆祝建院40周年,举行“新闻传播学术报告会”。

11月

6日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传媒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同年 为了表彰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鼓励高校研究人员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教育部设立“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该奖每三年评一次，成为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奖项之一。

1996

3月

同月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专业辞书。郭超人任编委会主任，冯健任总编辑。

4月

23日 中国记协学术部与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闻伦理学纲要》（周鸿书，1995）出版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研讨会。《新闻伦理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现象、规范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为的著作，填补了新闻伦理学专著方面的空白。

5月

29日 广州日报开始进行报业集团的组建工作，成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

12月

9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大众传播消费理论研讨会”召开，首次从信息消费角度研究大众传播。

1997

3月

26日 本日至28日，由中国报业协会举办的“面向21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4月

21日 本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传播与经济发展”。

5月

2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该中心以研究新闻法律问题，促进健全新闻法律，参与新闻法律实务咨询为己任。张西明任主任。

6月

同月 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新增设了一个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对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国家认可。

9月

同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件通知，根据中编办（97）54号文件精神，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10月

同月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在传播学领域中，由海峡两岸的学者合作的首本系统性论著，堪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可喜成果。

11月

5日 中国记协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评选今日揭晓，新闻论文首次列为我国综合性年度新闻评选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项目。初为每两年评一次，从第十三届（2003年）开始，每年一评。

19日 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郑梦熊任主任。

同年 第三届吴玉章奖金颁发，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12，武汉出版社）、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著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应用电视学》(1993.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获优秀奖。

1998

2月

10日 北京新闻界人士今天举行座谈会,缅怀邓小平生前对新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畅谈学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新闻宣传论述的心得体会。与此同时,《邓小平论新闻宣传》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部全面反映邓小平关于新闻宣传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的专著。

3月

同月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教育科研战线以外的、也是全国新闻实务界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5月

4日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985”工程随即启动。

7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王敬、王凤超、岳颂东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召开。该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30日 本日至31日,全国首届新闻专业期刊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宣告中国记协新闻学术委员会新闻专业期刊协作会成立。初步统计,全国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有40多家。

7月

30日 原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商恺在京逝世。他主编、著的有:《采访和记者修养》、《报纸工作谈话录》等。

同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设立新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11月

4日 本日至7日,中国记协在深圳首次召开全国新闻媒体研究所(室)交流研讨会,宣告成立中国记协新闻学术委员会新闻媒体研究所(室)协作会。

同月 “第一届两岸传媒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举办。

12月

24日 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包括每年评选百篇具有创新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同年 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成立,是由全国各地都市报新闻工作者自愿组成的行业团体,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总编辑年会、理论探讨会、经验交流会。

1999

2月

同月 《广东新闻年鉴》创刊,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新闻年鉴。

同月 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正式获批。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完整的教育层次有利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陆地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计划内全脱产新闻学博士后。

4月

6日 我国当代著名报人,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何微(1916-1999)逝世。何曾任记者、新闻社陕西分社、北京分社社长、陕西日报总编辑等职务。他从1946起就开始对新闻理论研究,1962年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管新闻系工作;1982年调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组建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研究》杂志;1984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担任新闻研究所所长,是与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王中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甘惜分先生等齐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名的新闻理论家，著有《新闻科学纲要》、主编《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有“西北何”之称。

10 日 本日至 11 日，由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大众传播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司法与传媒”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0 月

15 日 由北京广播学院中加信息传播研究中心、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的“面向 21 世纪的传播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逝世。温先生曾担任《解放日报》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等职，还在社科院新闻系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

11 月

7 日 本日至 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传播：中国与世界”。

27 日 首届全国传媒伦理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0

2 月

16 日 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成立。“中国传播论坛”是该中心每年一次的制度化学术研讨会，2001 年为第一届。历届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是：“变化中的新世纪广播电视”（2001）、“中国电视剧传播”（2002）、“世界华语播音学术研讨会”（2003）、“新闻学与传播学全球化的研究、教育与实践”（2004）、“中国媒介：转型与趋势”（2005）、“体育与大众媒介”（2006）、“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2007）。

6 月

同月 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召开。中国记协向全国新闻媒体发出创办“中国传媒网络论坛”的建议。

同月 由盛沛林等著《军事新闻学概论》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学系负责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军事学重点项目《军事新闻学概论》研究成果，是一部有学术水平的军事新闻学专著，不仅为军事学增添了新内容，也填补了我国军事新闻传播学科的空白。

8 月

10 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收到国务院批复通知，同意将 11 月 8 日确定为记者节。

9 月

25 日 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第二批入选机构名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同月 方汉奇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展现了从中国第一份报纸诞生到 1997 年 1284 年间我国新闻业发展演变的历史画卷。与去年刚刚出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代表了我国当前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10 月

20 日 本日至 21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新闻传播 100 年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回顾新闻传播沧桑，展望信息流通走势。

同月 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编《新中国晚报 50 年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集资料性、文献性、权威性、指导性于一体，反映了晚报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特色，是晚报大家庭的档案馆，晚报风采的荣誉册，又是中国新闻业史料库的一部分。

12 月

26 日 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第三批入选机构名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同年 武汉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分获新闻学、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北京广播学院为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单位。

2001

3月

22日 本日至25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等共同举办的“新闻创新:迎接WTO的挑战”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5月

同月 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全三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黄鸣奋)、《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李国正)、《传在史中——中国传播社会传播史料选辑》(郑学檬),是继《华夏传播论》之后华夏传播研究的又一批力作。

同月 蔡雯著《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博士论文是首篇新闻传播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并作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一项主要内容。

6月

17日 本日至18日,由解放日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9月

22日 本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

10月

18日 本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新世纪的中国传播研究:创新与发展”。

同月 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共包括《理论新闻学卷》(童兵、林涵)、《新闻史学史卷》(徐培汀)、《应用新闻学卷》(单波)、《传播学卷》(戴元光)、《宣传学与舆论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广告和公共关系卷》(明安香)、《港台新闻学与传播学卷》(李少南、郑贞铭)七卷,展示了过去100年间我国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发展的基本轮廓。

同月 杨保军著《新闻事实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博士论文获得第五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12月

15日 本日至16日,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在上海召开。这是我国首次由高校主办的全国性、连续性的传播学研讨会。本体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

18日 本日至19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该研讨会每年一届,第二、三、四、五、六、七届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是:“新闻舆论监督与十六大后的中国”、“新闻舆论监督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新闻舆论监督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目标与舆论监督使命”、“新闻舆论监督与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共十七大以后的新闻舆论监督”。

2002

6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2 日 中国大陆第一个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第一任会长为张国良教授，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该学会每年举办“中国传播学论坛”。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已于 2001 年 12 月在上海举行。

10 月

26 日 本日至 27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 月

1 日 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举行隆重颁奖仪式，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一等奖，邵华泽著《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1994.4，人民日报出版社）、蓝鸿文著《新闻采访学（第二版）》（2000.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1998.11，澳门基金会）、唐绪军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1999.3，新华出版社）获优秀奖。

同年 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为新闻学重点学科，批准复旦大学为传播学重点学科。

2003

2 月

10 日 教育部下达《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开始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包括重大课题攻关计划、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人才培养和奖励计划、学术精品奖励计划、文科教育改革计划、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计划。

10 月

15 日 本日至 16 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六十周年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17 日 新华社原社长、一代名记者穆青同志逝世。他著有《新闻散论》等。

24 日 本日至 25 日，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在复旦召开，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在校研究生自主发起独立筹备的学术会议。

同年 华中科技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

1 月

5 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出台。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同月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著作，填补了一个空白。

4 月

26 日 本日至 28 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决定重新编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教科书以及包括新闻学在内的 9 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第一批）。

5 月

22 日 本日至 23 日，由南京大学发起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网络传播专题举行全方位深入地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网络传播事业：挑战与对策”。2005、2006、2007 年年会的主题分别是：“网络社会：传播与控制”、“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中华社会及其他地区之经验”、“新媒体发展与个性化传播”。

6 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2 日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22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8 月

同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目标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以世界学科前沿问题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心，超越传统的学科界限和个体分散研究的有限视野，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加大投入，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创新能力和国际学术竞争能力，产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

9 月

7 日 北京广播学院建校 50 周年暨更名中国传媒大学庆祝大会举行。

同月 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主编的《中华百年报刊大系(上下)》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10 月

23 日 本日至 24 日，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传播学研究——融合与创新”。

11 月

26 日 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第五批入选机构名单，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该中心是在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武汉大学台港澳新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海德传播研究院的基础上，经过改制重组于 2002 年 7 月正式成立的。至此，被教育部批准的新闻传播学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已达 4 个。

12 月

21 日 本日至 22 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是为了贯彻和落实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联合举办的。会议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的编写问题。课题组首席专家为何梓华、尹韵公、徐心华。

同月 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教育部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也是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目；是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著作，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同月 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5

5 月

29 日 本日至 30 日，由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穆青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7 月

同月 彭兰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博士论文获得 2006 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8 月

15 日 国内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首个研究生暑期学校——“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开办。讲习班为期 15 天，通过邀请国内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领域的专家学者，讲授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前沿、趋势、方法及其应用，并与学员展开研讨，帮助学员掌握和运用新闻传播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所应具备的宽阔视野、思辨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帮助他们形成一名杰出的理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从而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人才能够逐步地与国际同行对话，成为未来新闻传播领域的高水平学者和学术带头人。授课对象主要是在校的新闻传播博士生和青年教师。

10 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7日 在国务院学位办第十次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学科评审中,新增了8个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新增的新闻学博士点是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增的传播学博士点是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大学。同时,有六家院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再加上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有一个新闻学二级博士点,至此,国内共有15家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11月

21日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甘惜分教授从事新闻教育五十周年暨九十寿辰纪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甘先生1916年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社记者。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甘惜分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30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专著出版,主编了《新闻学大辞典》。

2006

3月

6日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举行揭牌仪式。该基地既是一个跨学科、跨部门、国际性的研究实体,也是一个与相关学术机构资源共享、与相关政府部门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研究平台。基地主任为童兵教授。该基地在启动阶段将开展“复旦传媒和舆情调查中心”建设,同时开展“中国社会发展与新闻教育结构”、“新闻传播研究新发展报告”、“公共卫生事件与大众传媒”、“西藏地区信息传播方式研究”、“新闻传播学大辞典”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也获准设立国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4月

21日 本日至24日,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河北保定召开。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宣告成立,尹韵公任会长。研讨会的主题是“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

5月

16日 本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5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并特别设立了中国专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是全球性传媒经济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前6届均在欧洲和美洲召开。

18日 本日至20日,“邓拓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6月

3日 本日至4日,“中国传媒经济年会(2006)”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主题是“传媒整合力”。

12月

2日 本日至3日,“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6日 由“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电视与新闻学院合办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由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主持。

23日 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从教55周年教学思想研讨会暨庆祝先生80华诞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方先生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教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由他主持编著的两部中国新闻史学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现代 1200 多年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画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国际地位。人们评论这两部巨著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也为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做出了示范，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他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影响了新中国几代新闻工作者，赢得了新闻界与史学界的尊敬。

2007

8 月

29 日 由《现代传播》编辑部与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政府新闻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11 月 29 日，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三方共建的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南京大学成立，这是国内首家政府新闻学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公共危机处理、政府形象管理、公务员媒介素养等内容为主要研究方向。2006 年 9 月，叶皓著《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一书出版。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普遍确立，政府、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成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10 月

31 日 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彭兰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获一等奖；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杨海军著《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姜飞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获优秀奖。

同月 复刊后的第一期《新闻学论集》（第 19 辑）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刊为半年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编辑出版，主编为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该刊创办于 1980 年，1998 年刊出第 18 辑后再未出版。

12 月

8 日 本日至 9 日，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协办。

同年 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为新闻传播学（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重点学科，批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培育学科。

同年 《新闻大学》从 1 期起组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张昆、方汉奇、吴廷俊、程曼丽、宁树藩等著名新闻史研究者先后发表文章，展开讨论。

2008

4 月

15 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恢复成立。时隔近百年后，这个有着优良学风和传统的学术团体得以恢复成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担任会长，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程郁缀、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为民、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卓南生教授等担任副会长。方汉奇、邵华泽、范敬宜担任学术总顾问。宁树藩、丁淦林、童兵、赵玉明、吴廷俊、尹韵公、刘建明、陈力丹、李少南、卓南生为首批受聘的导师。

25 日，本日至 26 日，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召集、《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主办的首届华文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是“华文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的历史、现状、反思与展望”。

26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上海大学影视技术艺术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围绕网络时代的人际传播与人际关系研究主题，就“人际传播本土化个案研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究”、“人际传播理论研究”与“网络人际传播研究”三个分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5月

10日 本日至11日,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在深圳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从历史到未来:传播、对话、共享”的主题,面向中国的传播实践与传播现实,共同反思和探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实与未来发展问题。

6月

14日 本日至15日“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新闻教育界同新闻实务界联手,围绕改革开放30年举办的首次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20多名专家、学者、传媒领军人物出席会议,会议共发表论文63篇。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的8个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召开,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

10月

2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大举行。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商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研讨会期间,“院长茶座”、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丛书展、中国新闻学教育 and 研究90年回顾图展等活动也同期举行。研讨会期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正式挂牌成立。

11月

1日 本日至2日,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使命与责任——媒介批评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15日 本日至16日,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学分会筹备组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学分会成立大会暨新闻学分会首届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郑保卫当选为分会会长。这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继广告学分会、传播学分会和广播电视学分会之后成立的第四个分会。新闻学分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领导的以新闻学教学研究和学术探讨为主要任务的学术团体,旨在为全国各高等院校新闻单位搭建新闻教学和学术研究交流平台,推动我国新闻学的繁荣与发展。新闻学分会理事会和学术年会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成立大会后举行的学术年会的主题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30年”。

12月

13日 本日至14日 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华传播学会、国际中华传播学会、暨南大学共同主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2008中国传播学论坛在暨南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与传播学的开拓创新”。

同月 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一书出版。这是继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林德海主编)之后出版的第二本新闻传播学专科学目。前者是迄今为止较完备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图书目录及概要,它填补了20年来该学科书目出版上的空白,同时也展示了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在教学、科研上的迅猛发展,具有极其深广的意义。

同年 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出现了一批总结30年来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文章。

同年 5月份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引起了学界关于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附录2 历届吴玉章奖获奖成果（新闻传播学）

等级	著作名称	作者	单 位	出 版 单 位	出版 时间
第一届（1992）					
一等奖	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6
优秀奖	新闻采访方法论	艾 丰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2.5
第二届					
一等奖	报纸编辑学	郑兴东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4
优秀奖	中国编辑史	姚福申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1
第三届（1997）					
优秀奖	新记大公报史稿	吴廷俊	华中理工大学	武汉出版社	1994.12
	中国应用电视学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	北京广播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第四届（2002）					
一等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
优秀奖	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	邵华泽	中国记协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4
	新闻采访学（第二版）	蓝鸿文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1
	“蜜蜂华报”研究	程曼丽	中国人民大学	澳门基金会	1998.11
	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	唐绪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华出版社	1999.3
第五届（2007）					
一等奖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7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赵玉明	北京广播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1
优秀奖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郑保卫（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12
	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	杨海军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11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姜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附录3 历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新闻传播学）

第一届（1995）				
级别	成果名称	类型	作者	出版社或期刊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著作	徐培汀 裘正义	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二届（1998）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面向新闻界	著作	蓝鸿文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	著作	曾建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	著作	白润生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新闻宣传质量评估标准调研、设计与论证	报告	曹 璐	中宣部新闻局采用
三等奖	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	著作	崔相哲	韩国庆南大学出版社
	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当代中国西北人的文化价值观	著作	戴元光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	著作	刘明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论文	李良荣	《新闻大学》1995 年春季号
第三届（2003）				
一等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著作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二等奖	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	著作	殷晓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	著作	郑兴东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
三等奖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	论文	陈卫星 韩运荣	《国际新闻界》2000 年 2 期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	论文	单波	《现代传播》1999 年 1 期
	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	论文	金兼斌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年 2 期
第四届（2006）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著作	赵玉明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2004 年
	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著作	吕新雨	三联书店 2003 年
三等奖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	著作	李 彬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
	加入 WTO 与中国新闻传播业	著作	丁柏铨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新闻价值论	著作	杨保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新闻传播学论稿	著作	董天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传播的观念	著作	陈卫星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附录4 近10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类著作、教材（1997-2006）

- 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彭菊华：《新闻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丛春华：《新闻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胡宏文：《新概念新闻学》，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 沈爱国：《新闻学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蔡铭泽：《新闻传播学》，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邵志择：《新闻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 郝雨、王艳玲：《新闻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王益民：《系统理论新闻学(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张小元：《回归与超越：理论新闻学新视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 李希光：《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丁柏铨：《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 张诗蒂：《新编新闻学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本
- 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
- 程世寿、刘洁：《现代新闻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符建湘、郑柏梁编著：《理论新闻学》，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孟繁德主编：《新闻学基础》，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丁柏铨：《新闻理论新探》，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 何梓华主编：《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 蔡铭泽编著：《新闻学概论新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李广增、吴庚振：《新时期新闻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 2009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透视”（批准号：XW0903）研究成果，受 2008 年度“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资助。论文和课题能顺利完成并得以出版，得到了诸多师长、同事、朋友及家人的帮助，特借此宝贵一页，聊作记存，以致谢意。

我要对师父吴廷俊先生和师母说声谢谢。先生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为我创造了很多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对论文和本书的写作更是全程指导。因此，我不仅在学识上受益匪浅，更是能近距离地感受先生的人格魅力，而这将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泉。得悉论文能出版，先生又慨然赐序，以示鼓励。每次见到师母，她总是给于令人倍感温馨的微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我只有加倍努力，才是对师父、师母最好的感谢。

我要感谢宋三平先生、陈志强先生以及参与开题、盲审和答辩的所有老师对我的指教、栽培和关爱。感谢我的朋友、同学以及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以贯之的友好和帮助。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默默的鼓励和有利的支持。

本书能作为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并得到南昌大学社科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无不得益于省教育厅、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处及人文学院、新闻系等相关人员的悉心指导和高效工作。特此致谢。本书的顺利出版，还要感谢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的游道勤副社长和魏如祥编辑，他们辛苦但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为本书增色良多。

常言道，“三十而立”，但我至今仍一事无成，心里常存愧疚，恰恰是来自家人的宽容和理解，让我生活得还算快乐。顾楠华女士一直是我心灵之伴侣，不仅承担了诸多家务，还想方设法让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期待小宝宝的到来能给我们家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拙作得以出版，虽然完成了一桩心愿，却又陡增了不少忐忑和不安。作为“研究之研究”，本书实是向诸多前辈和同行学习的结果，由于自己才疏识浅，难免会有学习不到位、体味不深刻之处，敬请海涵并不吝赐教。当然了，各位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也是促使本书不断完善的最好动力。

张振亭
2009 年仲春
谨识于洪城青山湖畔